

台灣總體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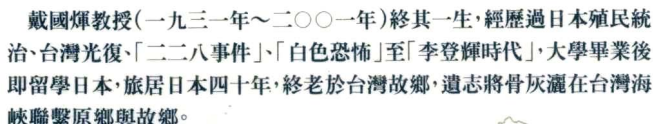
住民·歷史·心性

戴國煇文集

2

戴國煇著
魏廷朝譯





戴國輝教授(一九三一年~二〇〇一年)終其一生,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至「李登輝時代」,大學畢業後即留學日本,旅居日本四十年,終老於台灣故鄉,遺志將骨灰灑在台灣海峽聯繫原鄉與故鄉。

從作為一個「殖民地的孩子」到「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由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到名滿東瀛的台灣史學者,戴國輝是一個台灣近現代史的研究者,也是一個台灣近現代史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他把他的研究和他的生命化為一體,他的生命決定了他的研究,他的研究重塑了他的生命。戴國輝的台灣史研究不同於一般學究,乃至於他的台灣史研究其實就是他生命的追求。所以,他不儘是台灣近現代史的學術研究者,他更是這一段台灣近現代史的代言人。

他曾經引述他二哥的話,說明他台灣史研究和生命的追求:

「我們都是被扭曲的=殖民地的孩子。如今,殖民地傷痕的本身成為我們不得不起步再次出發的原點,做為重新開闢的新道路的基石,我們必須好好地活用這個悲痛的經驗。我們一邊要痊癒殖民地的傷痕,一邊要超越它,必須將殖民地遺制的所有東西加以手段化、相對化,經過克服以變成我們自己能掌握的工具及東西。

對於圍繞著我們的殖民地傷痕糾葛的本質及核心事物:我們只有通過內省和對決,才有可能擴大做為自舊殖民地被統治者身份求生新的內在自由之嶄新境界。」

在旅日四十年間,由於「黑名單」,他長期不得返回自己的故鄉台灣,一個人孤寂的、苦心的、認真的、嚴肅的在日本,擺脫了島內權力的是非恩怨,以「隔離的智慧」,敏銳的眼光,以「內在自由之嶄新境界」,觀察著故鄉歷史的發展,記錄著歷史的發展,陪伴他的只有他的愛妻林彩美女士。

戴國輝的視野遼闊,涉獵廣博,從史學、文學、經濟、政治到國際關係,著述內容從日據時期到李登輝:包括「二二八事件」、「台灣新文學」、「霧社事件」、「原住民研究」、「白色恐怖」。

戴國輝的中日文著述甚豐,在他逝世一周年後,七十冥誕之際,我們把他的中文著述匯編成《戴國輝文集》以紀念這位維護台灣人歷史尊嚴的「殖民地的孩子」和台灣歷史學家。並將這一份真正的有尊嚴的台灣現代史研究的成果奉獻給戴國輝所熱愛的故鄉台灣。

——王曉波

戴

國

煇

文

集

2 台灣總體相
——住民・歷史・心性

戴國輝文集【2】

台灣總體相——住民·歷史·心性

作者——戴國輝

譯者——魏廷朝

總策畫——王曉波

主編——林彩美

執行編輯——陳淑美·李佳穎·洪淑暖

封面設計——唐壽南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人——王榮文(遠流)·魏德文(南天)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電話◎(02)2365-1212 傳真◎(02)2365-7979

郵購劃撥帳號◎ 01894561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14 號 1 樓

電話◎(02)2362-0190 傳真◎(02)2362-3834

郵購劃撥帳號◎ 01080538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四樓 505 室

電話◎ 2508-9048 傳真◎ 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 2000 元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2002 年 4 月 1 日 初版一刷

全套售價◎新台幣 6000 元 (套書不分售)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4586-8 (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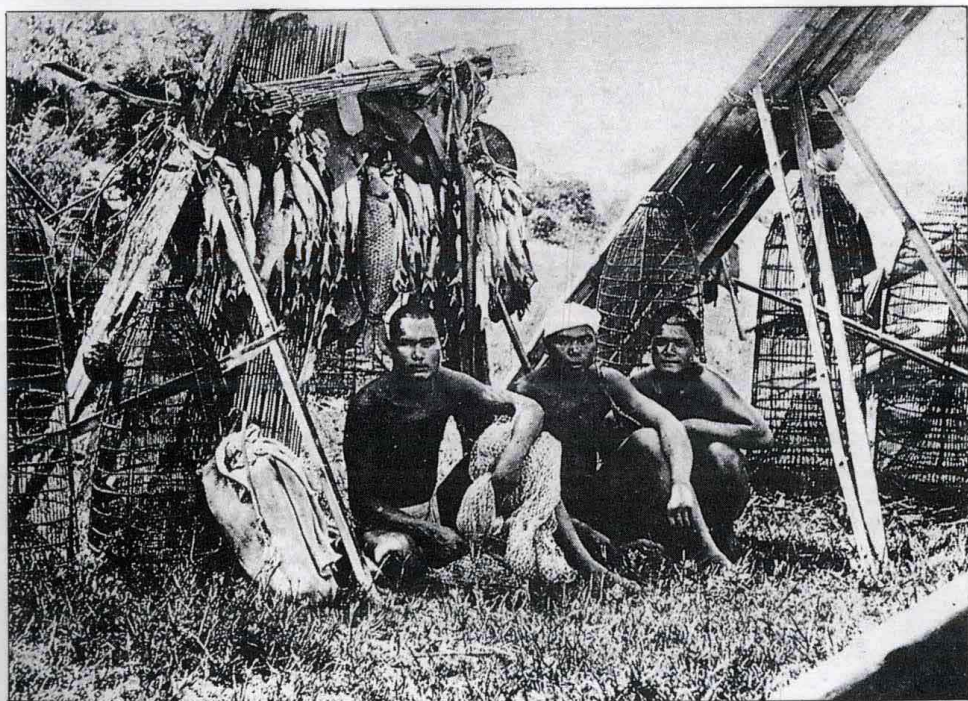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ylib@ylib.com

◎南天書局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weitw@smcbook.com.tw

◎台灣先住少數民族分為泰雅、賽夏、曹、布農、魯凱、排灣、雅美、阿美、卑南九部族。
上圖為泰雅族人，下圖為阿美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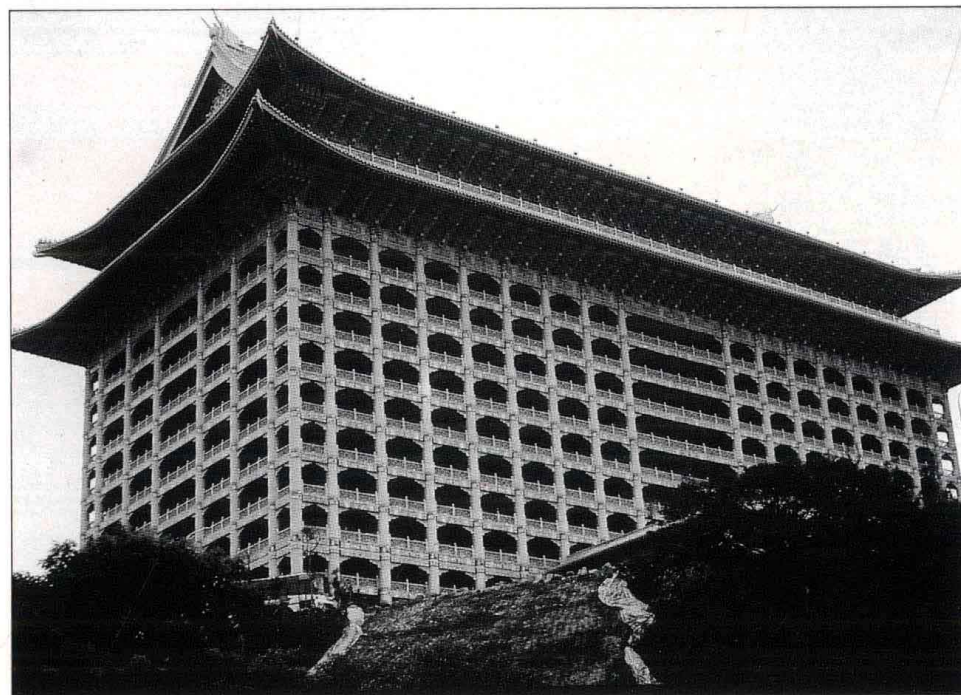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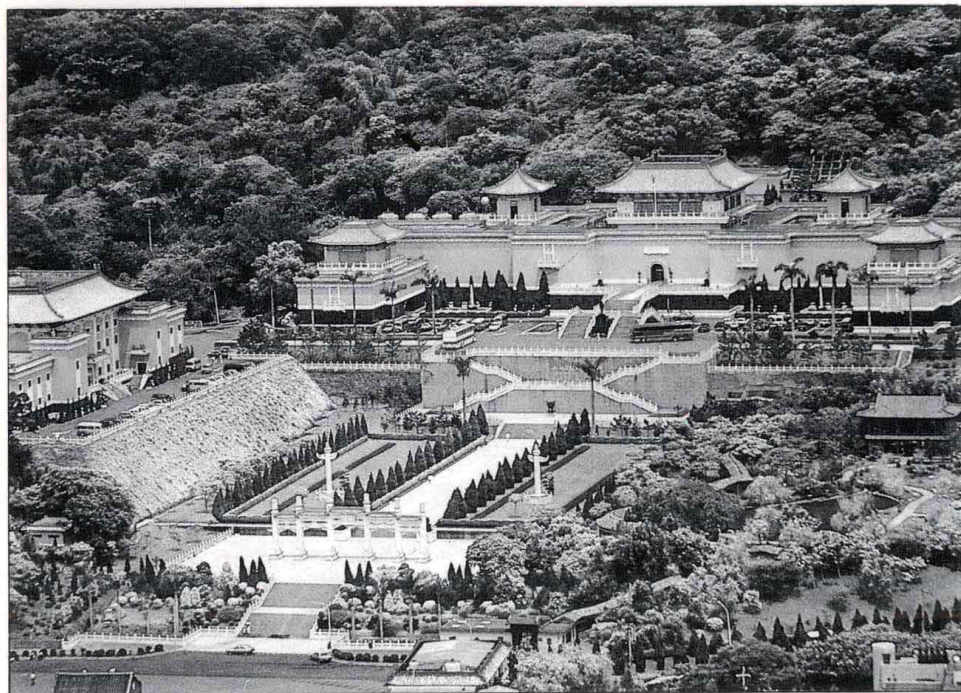
◎隨著外來移民的影響，先住民系台灣人一天天地喪失自我文化；圖中的先住民（持弓箭者）穿著混合兩種文化的服飾正印證這種文化瀕臨滅絕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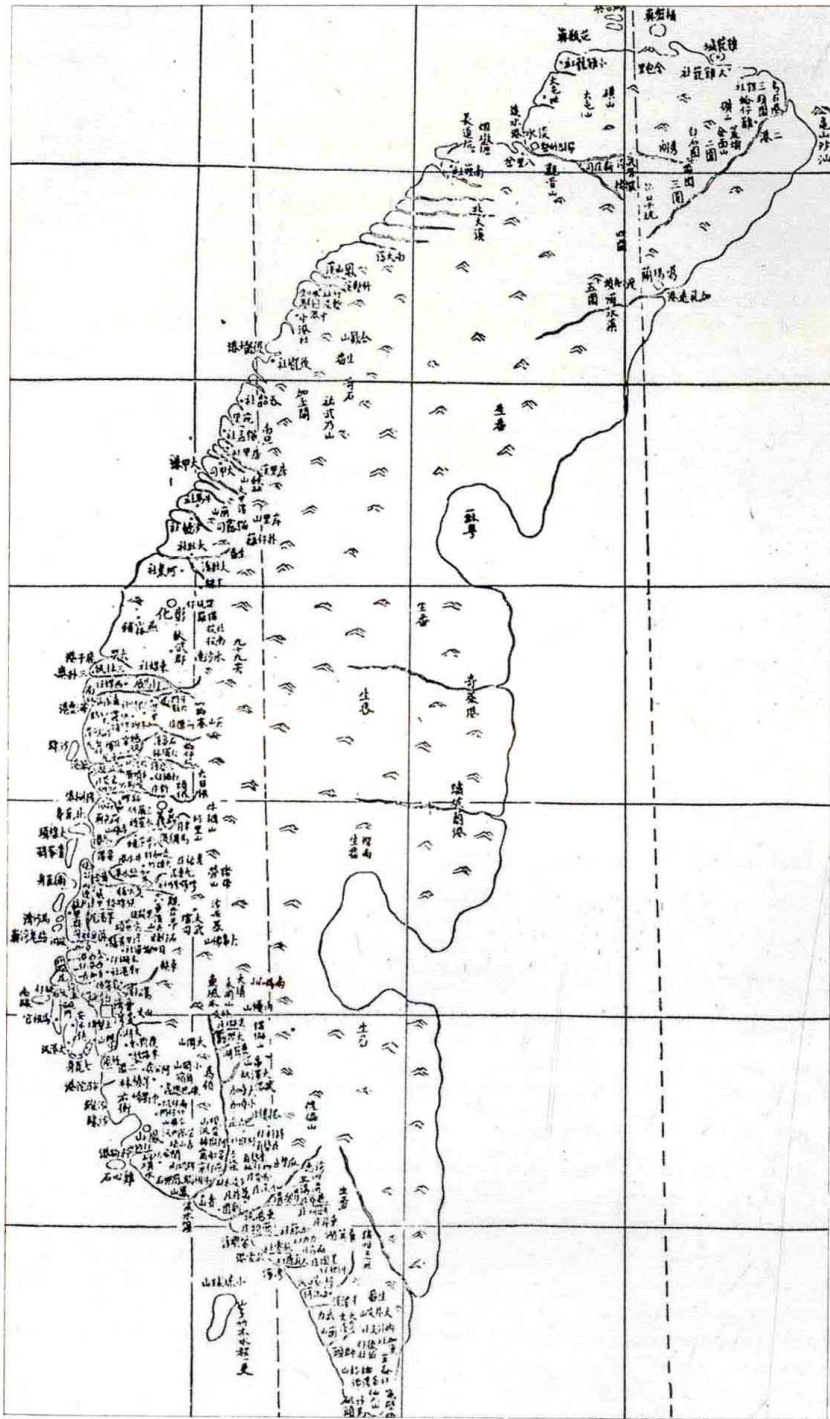
◎由台灣總督府增修而成的總統府，主人雖然換了，但做為支配、統治的權威象徵却依舊不變。(上，胡福財攝)
為紀念蔣介石而建的中正紀念堂是台灣最大的公共建築物。(下)



◎隨著第二期遷台移民而出現在台灣的大陸風格建築。(上：故宮博物院，下：圓山大飯店，林俊宏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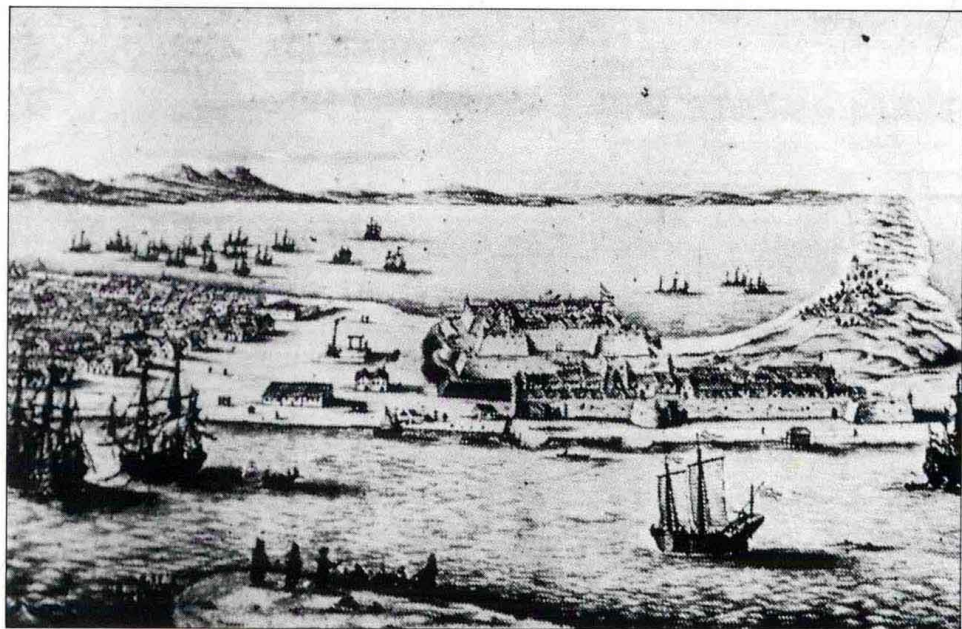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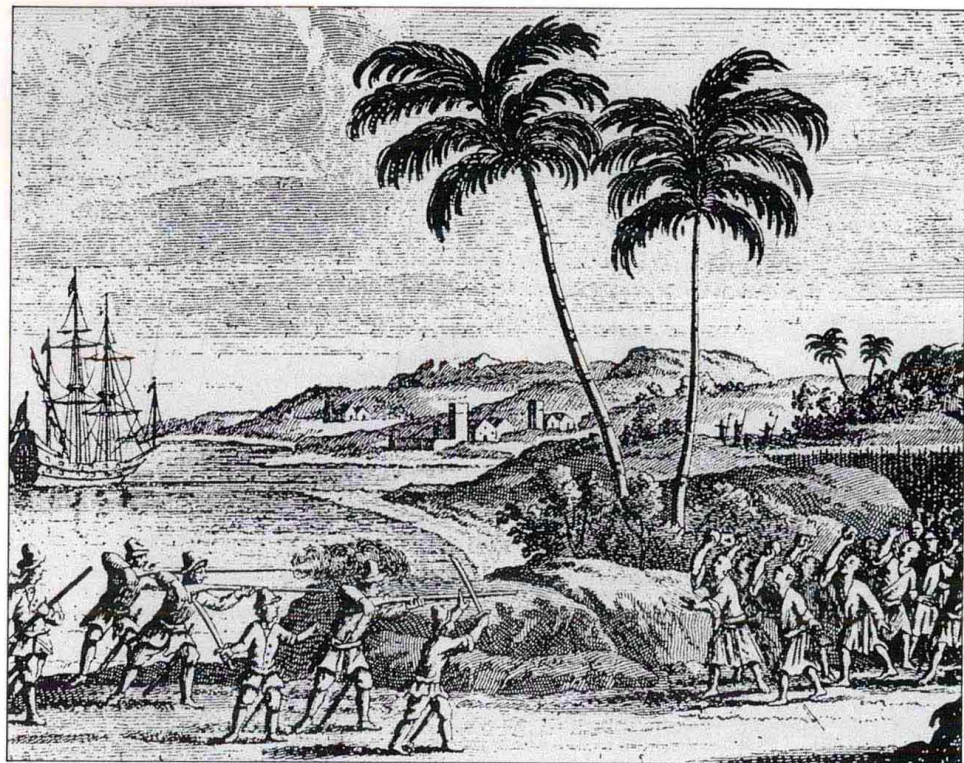


◎清朝時，耶穌會教士所繪之台灣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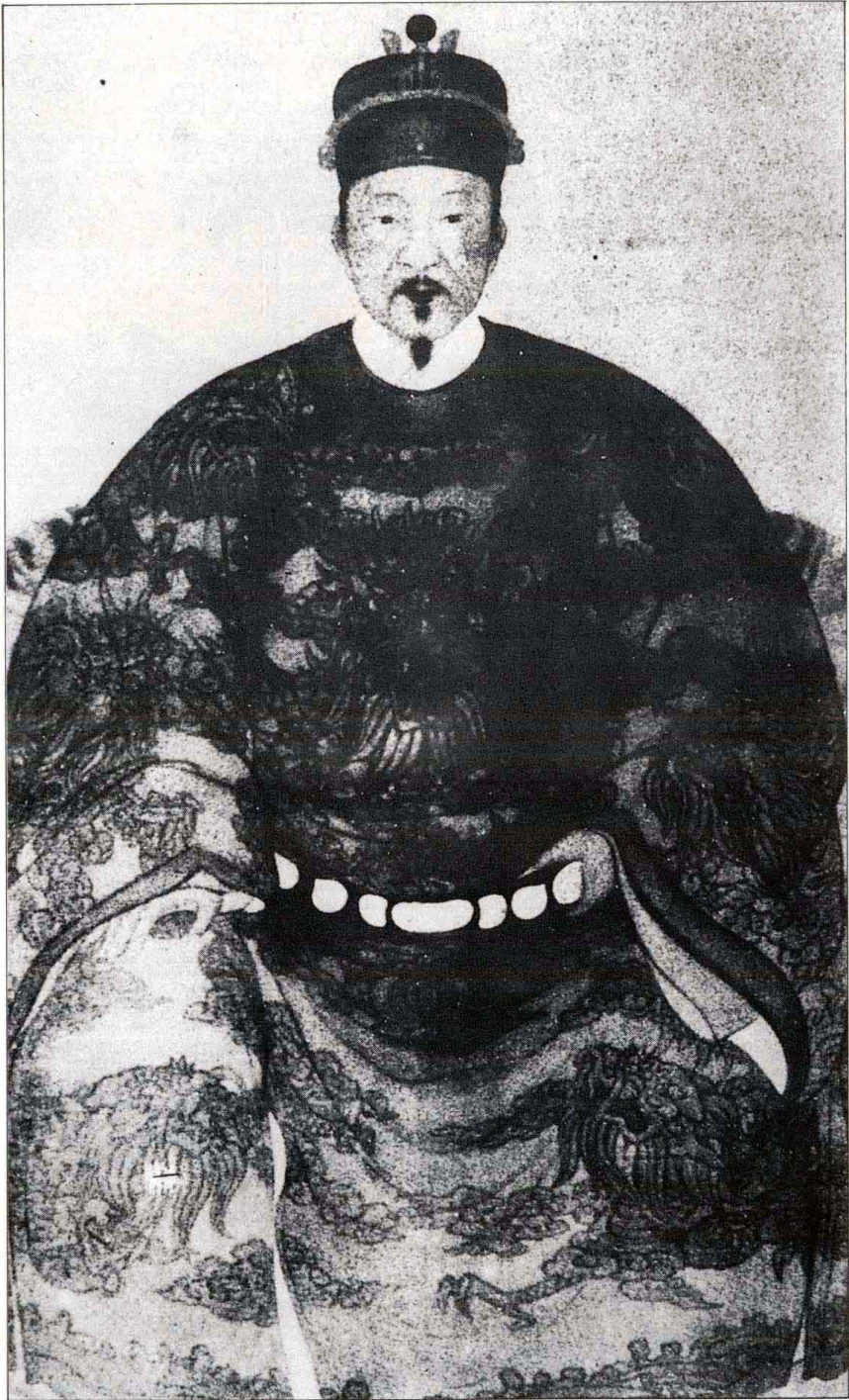


◎1622年荷蘭人再度襲擊澎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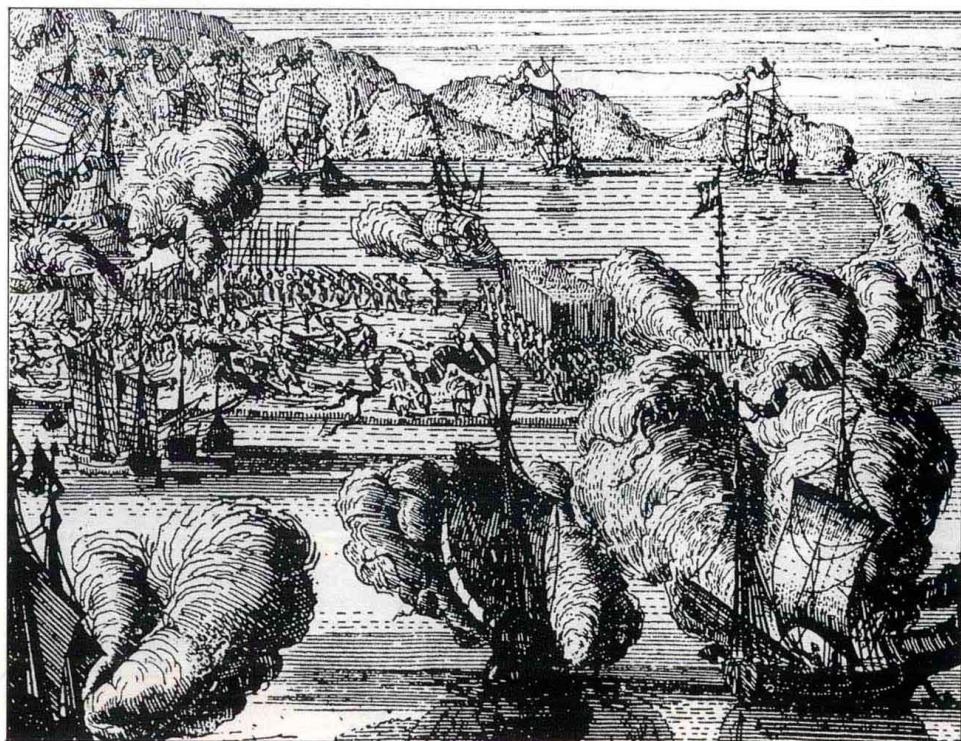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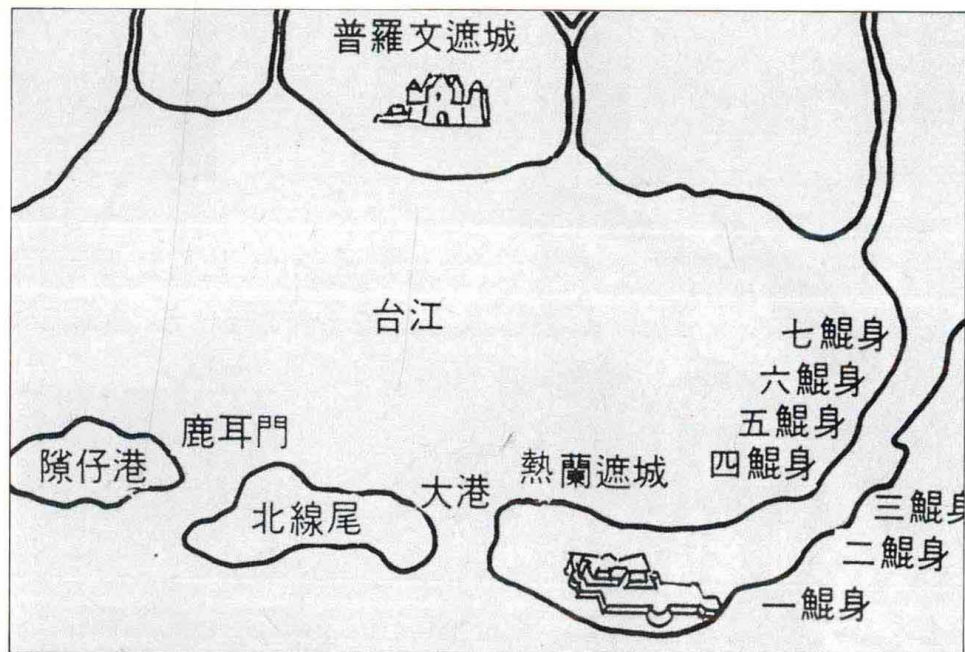
1624年荷蘭人在安平建熱蘭遮城，在赤崁建普洛文西亞城，開始支配台灣。(下)



◎鄭成功在台灣開創的政權是漢族系政權在台灣建立的歷史性創舉。



◎ 熱蘭遮城、普洛文西亞城地形圖。(上)
鄭成功圍攻熱蘭遮城(安平)。(下)



◎台灣洋務運動的先驅沈葆楨於同治年間就積極鋪設電線，開拓台灣東南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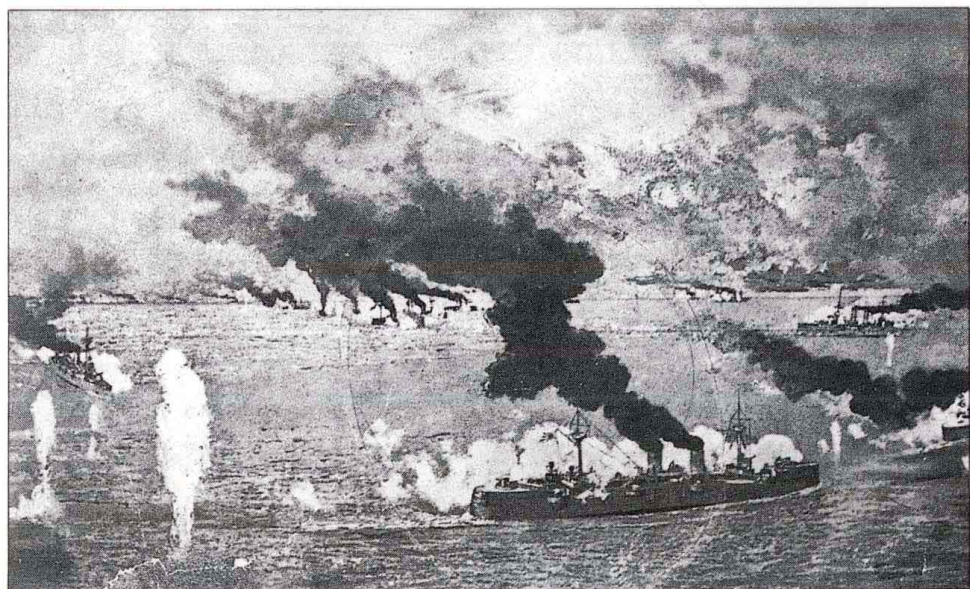


◎1886年劉銘傳就任為台灣建省首任巡撫，他的新政，以「辦防」、「練兵」、「清賦」、「撫蕃」為骨幹。



◎在簽訂馬關條約的談判中，清朝全權大臣李鴻章舉出許多理由，希望日方能放棄佔領台灣，但終徒勞無功。(上)

1894年中、日之間爆發甲午之戰，此為黃海戰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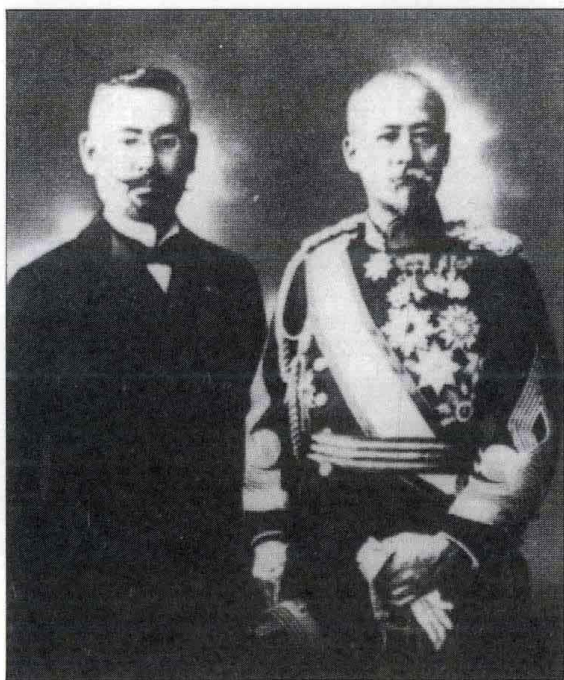


◎1895年5月25日台灣民主國宣佈成立，推舉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副總統兼團練使、林維源為議會議長。(左上圖坐者為唐景崧、右上圖為丘逢甲、右下圖為林維原)



◎1895年5月負責佔領台灣的近衛師團在澳底登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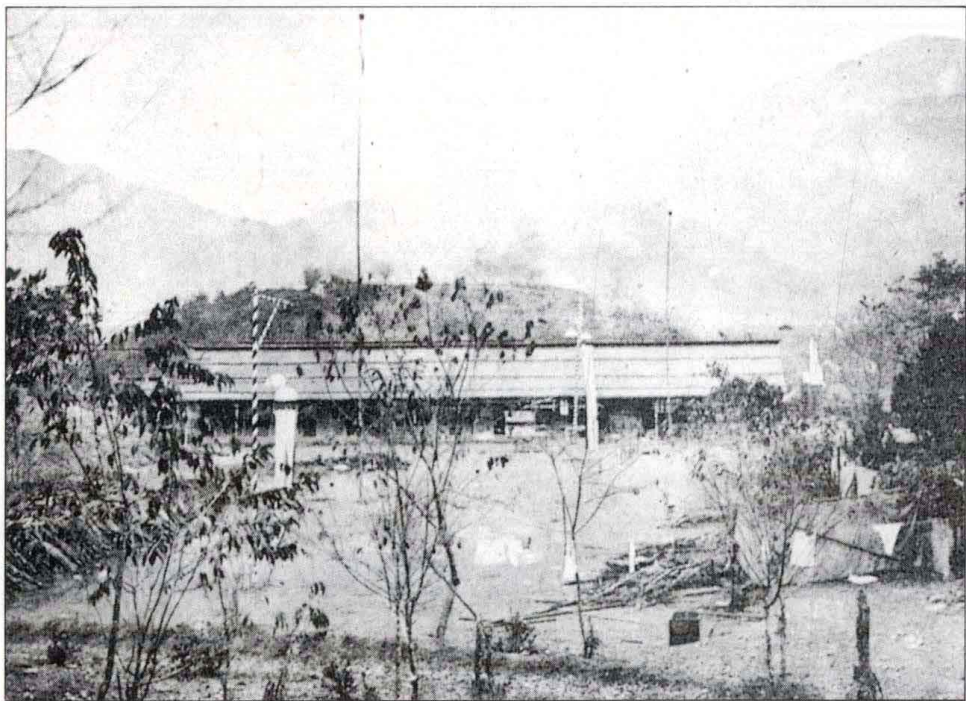
◎1898年兒玉源太郎就任第四任台灣總督，後藤新平就任為民政局長，此後近十年的施政，實施鎮撫並用的政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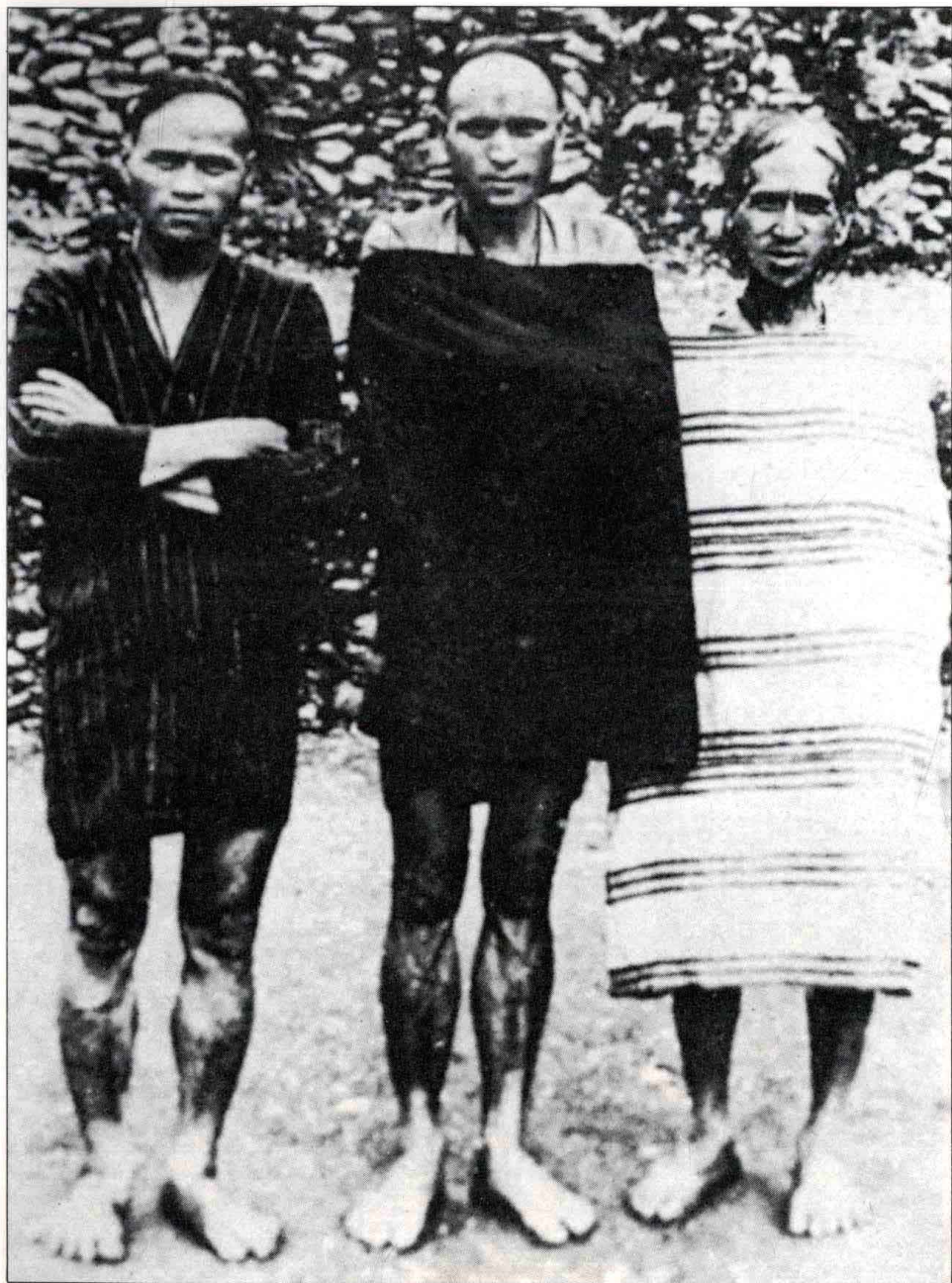
◎日據時代前後發生多次抗日事件，羅福星(上左)、余清芳(上右)、江定(下左)、羅俊(下右)不幸罹難。



◎1930年10月27日在台中州霧社公學校秋季聯合運動會開幕典禮上，泰雅族人襲擊會場上的日本人，是為霧社事件。(上：當年霧社全景，下：事件發生後的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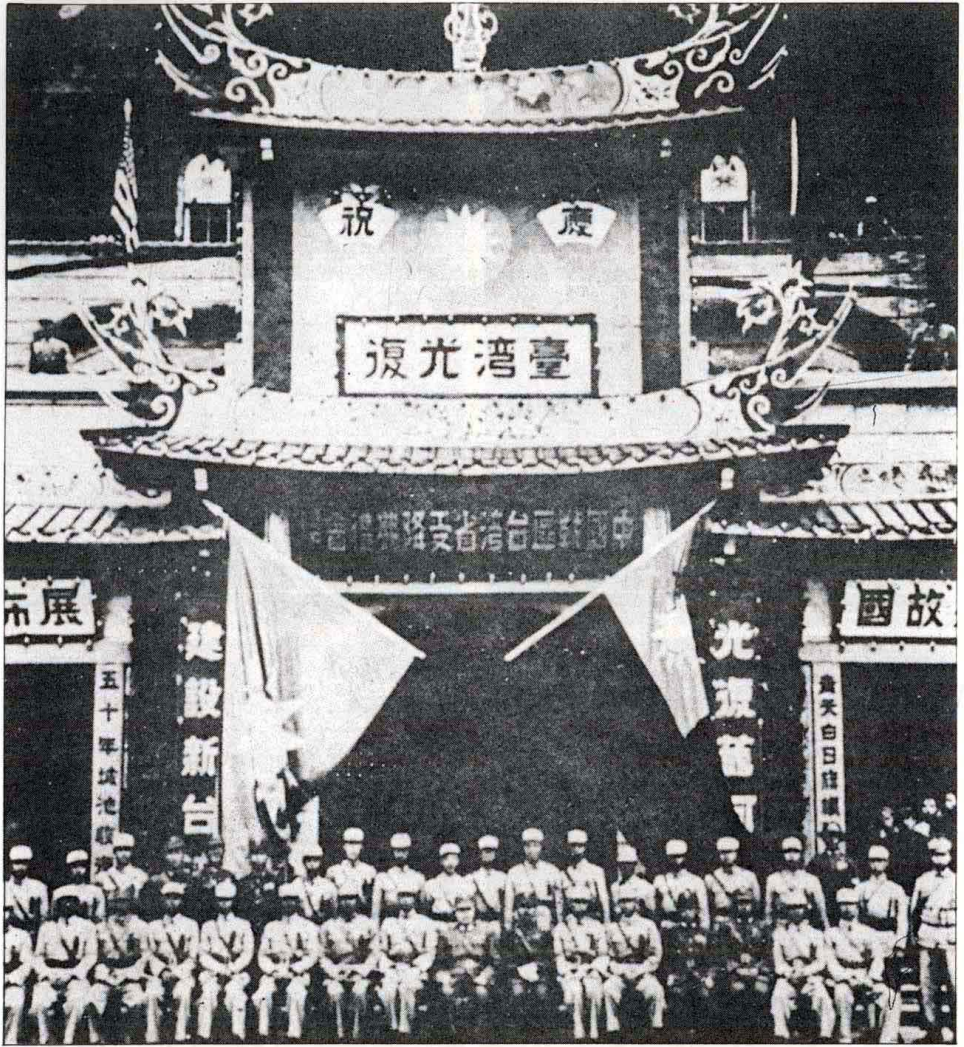
◎霧社事件的發動者莫那·魯道(中)。



◎台灣光復時，台北延平北路的慶祝標語。(上)
光復後，等待遣送回國的日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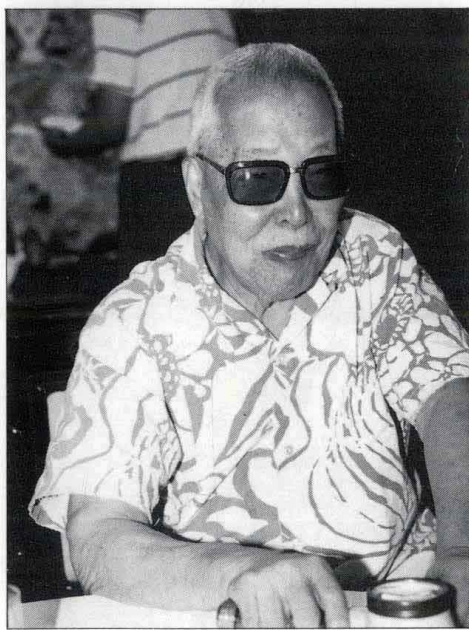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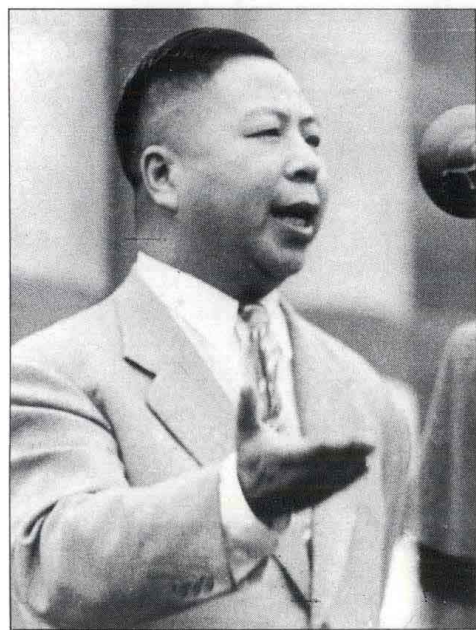
◎1945年10月25日於台北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



◎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重要人物陳儀(左上)、謝雪紅(右上)、王添燈(左下，本圖由王進益先生提供)、林獻堂(右下，本圖由莊永明先生提供)。



◎國民政府遷台前，相繼被重用的陳誠(台灣省主席，左上)、孫立人(台灣防衛司令，右上)、吳國楨(台灣省主席，左下)、俞大維(國防部長，右下)。



◎在六〇年代反體制運動中，「自由中國案」是最受矚目的。（上：雷震，下：《自由中國》中心人物（左起）胡適、夏道平、雷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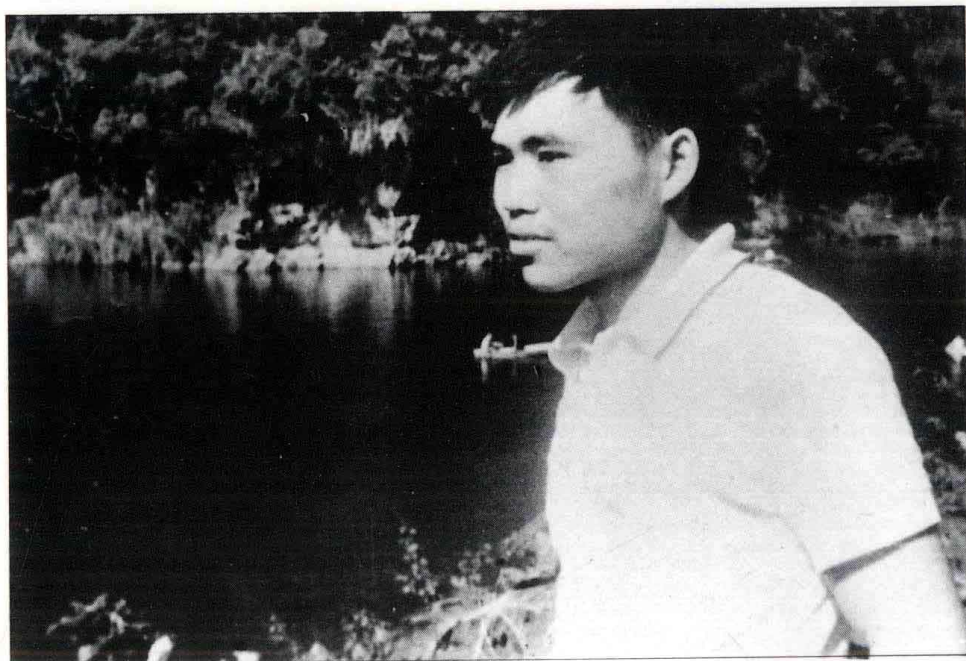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節，美麗島集團在高雄舉辦火炬大遊行，結果演成流血事件，是為美麗島事件。。(上)

◎1980年2月28日爆發林宅血案，因美麗島案入獄的林義雄的母親與學生女兒被害。(圖為林義雄夫婦) (下)



◎1981年7月3日發生「陳文成事件」，返台的美國卡乃基美倫大學助理教授陳文成離奇死亡。
。(此為年輕時的陳文成)(上)

以《蔣經國傳》聞名的美籍華人新聞工作者江南於1984年10月15日，被國府情報局關係者暗殺。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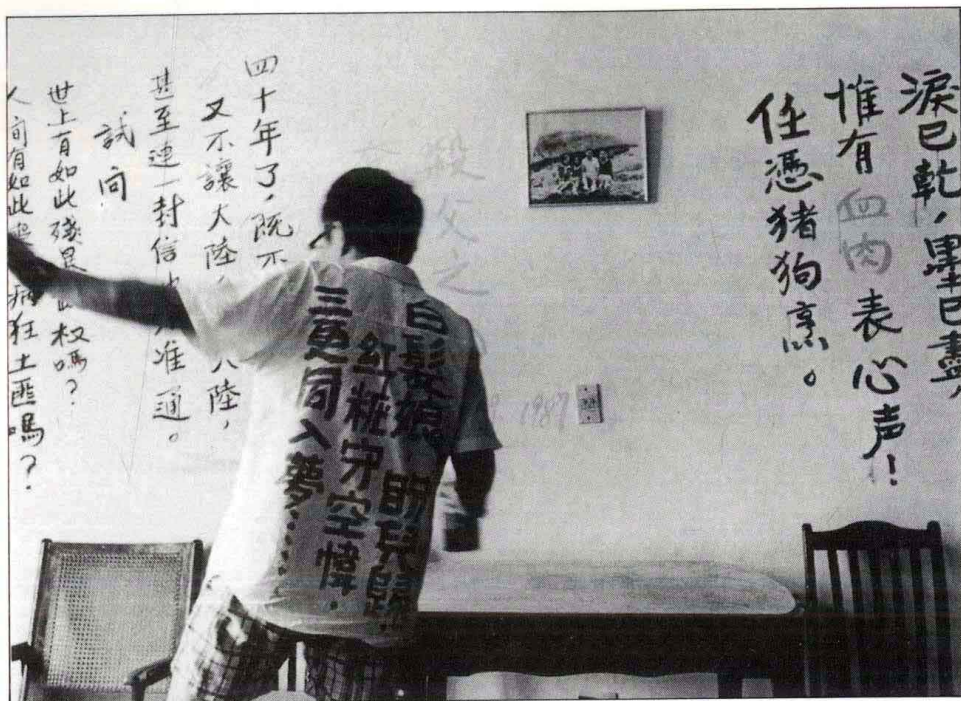
◎進入八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愈趨開放，形形色色的街頭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上：1987年二二八事件紀念，下：歡送林正杰入獄之羣衆）



◎環保意識抬頭，反杜邦運動成功地扼止了杜邦公司在鹿港設廠。(蔡明德攝)



◎赴大陸探親、反對農產品進口亦是街頭運動的訴求重點。(上：林育德攝；下：廖嘉展攝)



◎外匯存底僅次於日本、西德的台灣經濟，已經無法擺脫世界經濟而保持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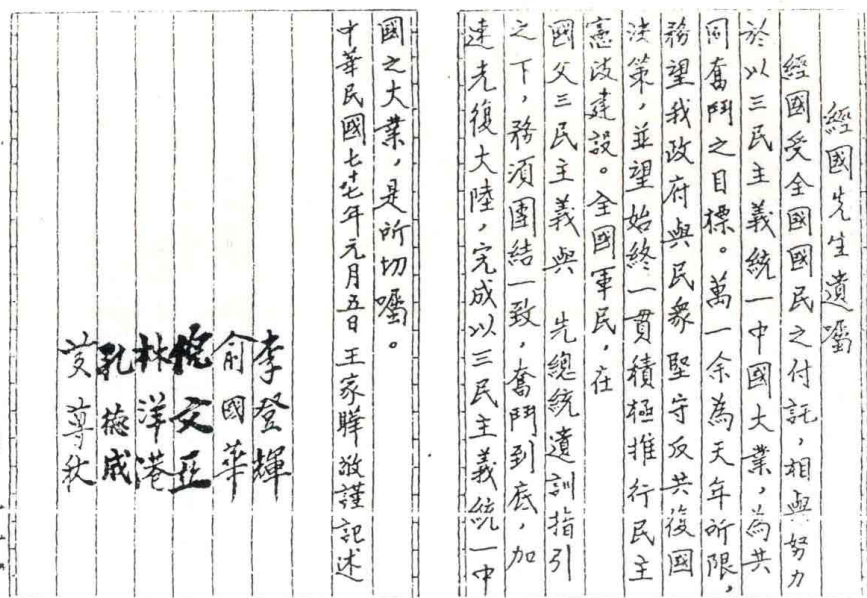


◎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宣布成立，發表建黨宣言。(上)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成立大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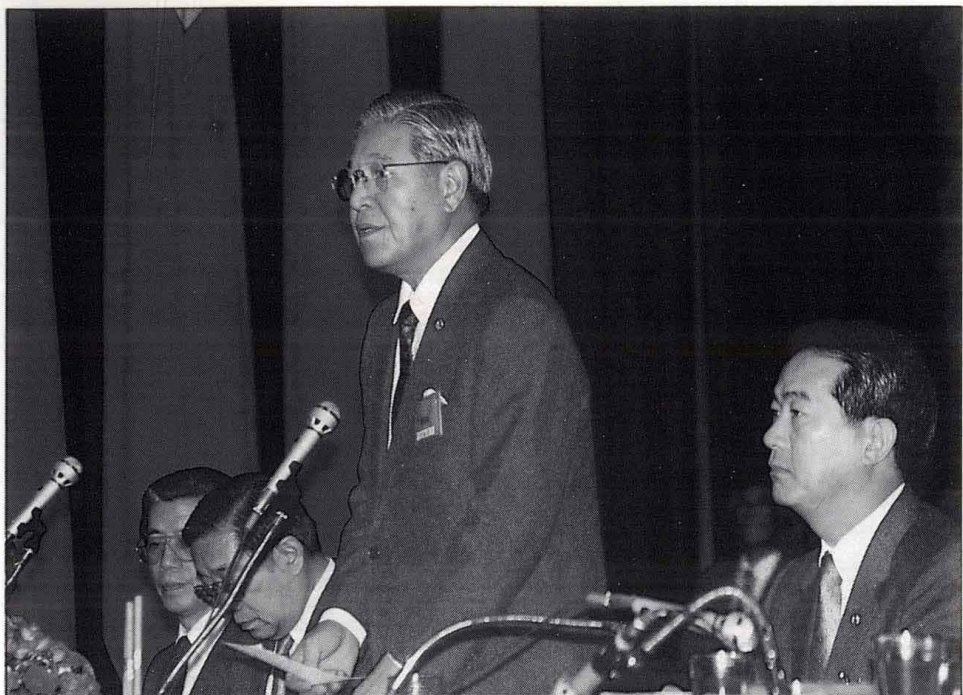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留下了頗受爭議的遺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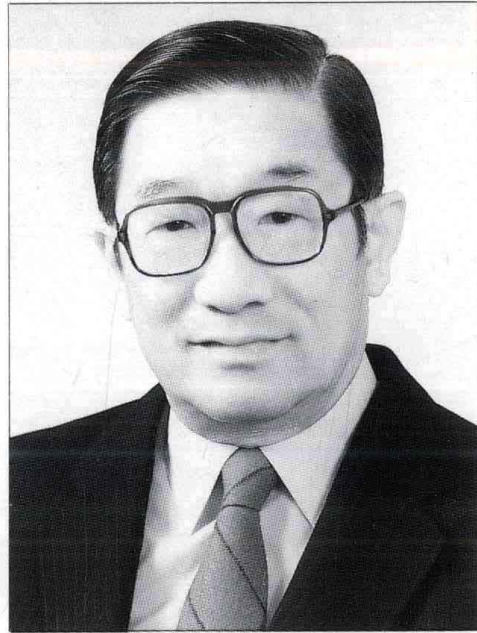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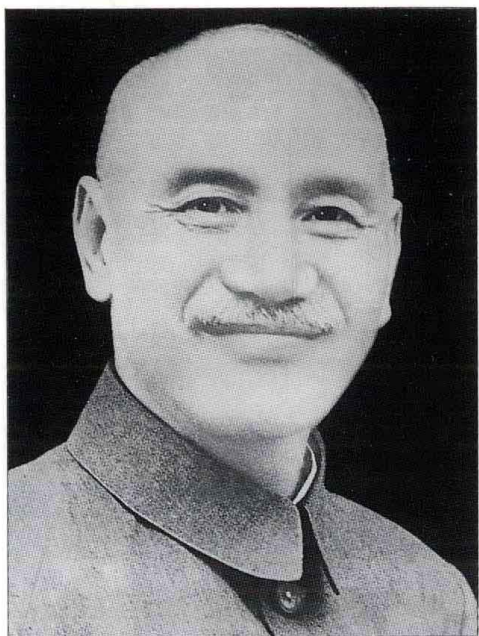
時代的肖像——李登輝宣誓就任總統，畫面中的李登輝、林洋港及孫文遺像象徵著台灣新時代的揭幕。(下)



◎國民黨第十三次黨大會召開之前，李登輝被推選為代理主席，而於十三全時正式成為黨主席。



◎由上而下的強人政治解體，各種政治性、社會性禁忌消失，台灣政局呈現新的開展。
(左上：蔣介石；右上：蔣經國；左下：李登輝；右下：李煥)。



台灣總體相

住民・歷史・心性

戴國輝 著 魏廷朝 譯

目次

中文版自序／七

前言／一三

第一章 臺灣的界說／一五

第二章 臺灣史的原景／三五

第三章 日本的殖民地支配／六三

第四章 光復的明與暗，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八九

第五章 國府中央遷台與國民黨支配的確立／一一七

第六章 「經濟奇蹟」之路和代價／一四五

第七章 激變中的社會／一六九

第八章 強人之死與新時代的開幕／一八七

結語——台灣往何處去？／二一五

跋／二二九

願台灣史研究的水準不斷提升（譯後記）／二三一

附錄：簡明台灣史年表／二四一

台灣總體相
住民・歷史・心性

中文版自序

約莫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當我發表日文稿〈研究霧社蜂起事件的當代意義——台灣少數民族所提示的本質性問題〉（《思想》，一九七三年二月號）不出一周的某一天，日本岩波書店的編輯鈴木稔兄來訪。

鈴木兄原任岩波書店的代表性雜誌《世界》的編輯，斯時改調為岩波新書的編輯。我們已相識多年。

他非常直率的問我，有無意思給岩波寫一本以台灣為主題的「岩波新書」。

我一聽，受寵若驚，甚為高興。熟悉日本學術界及出版界詳情的朋友，都會知道，能在岩波出版的雜誌發表文章已非常難得。還能出版單行本，那可以說是莫大的光榮。

多年來，我雖在岩波的《世界》、《思想》等雜誌寫過些文章，但受邀著書，尚是第一遭。

鈴木兄大概不會料到會聽到如下的回答。「多謝你的念舊和厚愛。我當然願意，但不是現在。希望最近的將來，能不辜負你的期待。」

他好不以為然地即刻反應：「爲甚麼？著書或出書有的場合確確實實需要些時機（time）（配合的）。」

鈴木兄沒有繼續說下去，但我可以窺察他肚子裡所殘藏的一些話。大膽地揣摩，不外可歸結爲①岩波新書一出，大可幫你進一步地確立你在日本學術界的地位；②你爲了蒐集台灣有關資料和史料，花費甚鉅，岩波新書頭版一般都可印上三萬——四萬冊。版稅又高到十五%，藉而可達到「名利雙收」，何樂而不爲呢！?

一九五五年秋天來日迄今，我所積累的有關學術及日文修養主要源泉來自於東京大學、岩波書店（特別是《世界》、《思想》、「岩波文庫」、「岩波新書」）和《朝日新聞》（特別是其「社說」及「天聲人語」欄）。

衆所皆知，岩波新書雖然可列爲啓蒙叢書之類。但其「深入淺出」而所體現的啓蒙性却是出自於深厚的學術研究基礎。我不敢斷言岩波新書本本皆是臻於精良。但我認爲，它的絕大部分是經得起時代及學術上的考驗的。

受邀著書時，我認為有關台灣史及台灣問題之個案學術研究，在我個人的積累上尙欠甚多。距離「春蠶吐絲」般的精織「台灣」為名的一塊「美布」（我理想中的岩波新書）的功力及資源仍然甚遠。所以，我不敢貿然接受鈴木兄早到的青睞。

多年來的學術訓練及在日本學術界的生活，我已經養成一種習慣。比較喜歡苦幹和實幹的作法及多元求索的作風。我堅定不移地著重於「本質性」的、「原理性」的、「邏輯性」的、「思想性」的層次，並就其整體格局來探討問題。必然的歸趨則厭惡虛構的、矯飾的、空洞裝腔的、表像的、末節的、二房東式的、局部性的、羅列式的、一刀切齊的、一言堂式的一類作法或作風。

任何社會、民族及國家都會斷斷續續地出現「狂熱政治之季節」。我希望我們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華僑）的生活圈裡也能共享點真正的學術研究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一天，早日來臨。人人都能享受到「實事求是，互相尊重，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的理想境界，而不會因為看法有異，解釋不同，意見不一致而受到威脅或感到不悅的情況發生。

面臨大轉換期的「陣痛」及「政治性的狂熱」顯現在當今台灣的，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富於彈性而活潑的。仔細觀察，它確實具有正面的活潑景象部分，但亦難免伴隨著負面的

另一半。我們不難發現有一批人忙著在搞「幫風」，藉「批判」一個極端，自己却不知不覺地陷入另一個極端。兩個極端都不屬於正常且能受到有識之士的歡迎和肯定的。學術界及思想界不但不易邁進既彈性又活潑的理想境界，反而大有走進僵化的死胡同裡或高懸在不知天高地厚、夜郎自大、自鳴得意的險崖上的危機。

最省力、最省錢和最方便附和雷同而易獲「安全」的就是喊些口號，講些空言，假藉「自造的民意」對人家貼標籤，或是參與圍剿與己有異議人士的假「批判」。這一種社會風潮的盛行，當然也是給學術界、思想界帶來僵化和破壞最嚴重的時候。

這一本從岩波新書《台灣——住民·歷史·心性》（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第一版第一刷）所譯的中文書，我不至於不識相，會當為完美無缺之自著。我歡迎具有創見性、建設性的批判及指教。但對於圍剿性的中傷或貼標籤式的「壓人之言」，我將不會為這一類無聊之事，消耗我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歷史上曇花一現的角色所在多有，他們雖然常可扮演短暫時期的「新星」，但他們是否能夠爬上世界史、人類史的正常軌道上持續運行，不至殞落，堪為有志之士存疑。我一貫對這類新星不具好感，乃因其極大多數顯係屬於泡沫或渣滓之類故也。

我既愛我出生之地台灣，又深愛我祖先之原鄉——中國大陸，並關懷它的前途。我願為我們及我們祖先的鄉土——海峽兩岸之進步和福祉，奉獻棉力，給它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園地紮實地、持續地添些磚，加些瓦。

這一本小著，在我主觀上也就是添磚加瓦工作的一個小嘗試罷。

本書的翻譯整理和編輯，得到魏廷朝兄和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陳雨航兄之協助，出版之催工則受到莫逆知音陳宏正兄和王榮文社長（遠流出版公司）的強有力支援，他們費了許多精神和工夫，特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本書的圖片乃重新編輯，與岩波版不盡相同，圖片承人間雜誌、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民進周刊等單位提供，特此聲明，並致謝意。）

戴國煒 謹誌於東京梅苑

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



台灣略圖

前言

台灣，正面臨大轉型期，變革的脚步響遍八方。

圍繞著金錢、物慾、選舉……打旋的狂熱，到底表現什麼？這種狂熱，與這一百年來在台灣這個舞台實際演出的歷史劇，應該如何去掌握兩者結構上的有機關聯？又應該如何從根本上追問它「歷史的意義」呢？

有人說：「當一個體制和它的秩序在動搖、崩潰的時候，一切動搖的和崩潰的，都會被甩到街頭。」在歌頌「經濟奇蹟」的主調下，地下出版物的氾濫；選戰中龐大異常的群眾與狂熱；走上街頭的民衆示威遊行隊伍；頻頻發生的持槍犯罪；不斷增加與巨型化的金融犯罪；「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風氣等；也許可為明證。

顯然，跟以往異質的變動，在充滿活力的台灣社會中忽隱忽現。要覺察這種事態，並不怎麼困難，然而，要把握變化的整體形像，卻不甚容易。

變動越是異質，我們越發認為非正確且迅速地把握它的整體形像不可。此無他，只因爲我們確信：假如能夠正確把握正在發生的事象，就不難預見它明日的去向，因而也能夠正確地把握歷史的潛藏巨流。

以「台灣，往何處去？」爲中心的論爭，喧囂紛紜。其中，有瞬發即逝的一時流行；有細微末節的喧騰；有濃厚僵化心情傾向的論點；還有磨損折舊了的傳統式歷史主義說法等等；不一而足。

值得慶幸的是，個人自一九五五年底以來，一直得以確保並堅持以日本・東京爲中心的，也就是，能夠從「外」觀察台灣的立場。儘管能力單薄，速度緩慢，還是替應然的台灣史形象的建構，不斷地堆積了熱情和些微的努力。

個人還認爲自己大致做到了與漩渦隔開相當程度的距離。這個漩渦不外是針對台灣史的解釋與台灣史的寫法，而以台灣爲中心，在它的內外推展中的充滿喧囂的政治性漩渦。

運用這種「有利」的立場與相對的自由度，把判讀圍繞著變革的潛藏巨流及導向做終局目標，試圖勾勒出轉型期台灣的整體形像，是個人決定編寫本書的動機所在。

第一章 台灣的界說

1 台灣的先住少數民族

台灣的位置

台灣位於中國大陸福建省的東南海上。東臨太平洋，東北靠近琉球列島，東岸的廈門和福州相望。台灣全省的位置，在極南點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極北點北緯二十五度五十六分，極東點東經一百二十四度三十四分，極西點東經一百十九度十八分之間。全省面積約為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外國人一聽到台灣這個名詞，也許多半就只想像起台灣本島，充其量也只把包括澎湖島的各島嶼的地理範圍納入想像。可是，光憑這樣，並不足以充分反映政治上的現實狀態。

如果把台灣限定於政治、行政層面的領域來加以瞭解，那麼該是這樣的：

以中國國民黨為執政黨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為了取得中國革命的主導權，從一九二〇年代以來，與中國共產黨抗爭、合作，進而互打內戰。結果，國府中央於一九四九年秋，判定在大陸的形勢不利，撤退到台灣來。於同年十二月七日遷移完畢。在撤退的過程中，勉強能夠在台灣海峽靠近大陸的一端，暫時當做橋頭堡來加以確保的，只有金門、馬祖各島而已。

中國大陸方面，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今天，兩黨所把持的政權，隔著台灣海峽對峙，一面提倡一個中國論，一面仍然尋求中國的統一。由此可見，「台灣」這個通稱所涵蓋的地理上的領域，當然該指國府當局現在仍然有效統治的範圍本身。

它的第一部分，是以曾經被舊日本台灣總督府當做殖民地來統治五十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的台灣本島和澎湖島為中心的各島嶼；第二部分是通稱金門、馬祖的地區。國府在位於國共對峙最前線的該區實施軍政，在民生層面，則形式上建制為中華民國福建省管轄的金門縣和連江縣馬祖，嘗試施政。以往，如果不經過特許，從台灣本島尚且不能夠訪問該地區

，然而爲了觀光，據說預定不久將開放一部分。這可以看成是環繞台灣海峽的情勢更趨安定所引發的新動向，值得注目。對相貌複雜的台灣，好不容易才開始有邁向單純且進步的變化出現，這不能說不是好預兆。

本省人與外省人

初到台灣旅行，或是閱讀戰後出版的有關台灣的文章的外國人，往往會對本省人、外省人等的遣詞用字感到困惑。嚴格地說，「本省人」是指在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就設籍定居在台灣省的住民。相對的，把八月十五日以後，也就是台灣光復後，才從中國大陸各地搬到台灣，然後定居下來的住民，統稱爲「外省人」。

「本省人」本來的概念，多半是自己或父祖的本籍（籍貫）在中國某省，例如台灣省、四川省、湖南省等，而稱呼目前居住在那裡的自己和同伴們時使用。因此，本籍不在某省而從其他省份搬來的，就成了外省人。本省人，是可以特定於一個省的人；但外省人應該解釋爲包括不特定多數省人的統括性概念吧。順道一提，這種用語，不僅在台灣，就是在中國大陸也用得上。

在台灣的本省人中，除了先住少數民族的九部族之外，有佔壓倒性多數的漢族系居民，

漢族系本省人又依他們使用的方言群，而可以分為福佬系，也就是閩南系，與客家系兩大支。讓我們首先從先住少數民族著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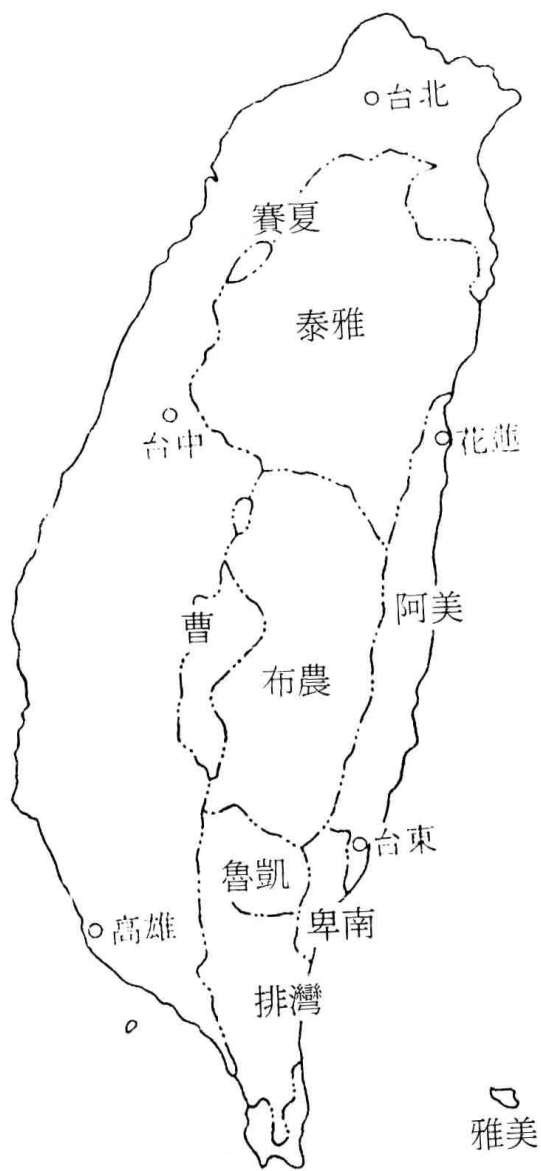
先住台灣人

日本人慣稱台灣的先住少數民族為「高砂族」。然而，所謂高砂族，在狹義上，是日本殖民地統治時代末期，日語對台灣先住少數民族的通稱。

進一步嚴格地說，高砂族的稱呼是從台灣總督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公佈的「戶口調查規定」中開始的，在該次「戶口調查規定」中，修改以往承襲清代對先住少數民族的「生蕃人」和「熟蕃人」這種歧視稱呼，改稱前者為「高砂族」，後者為「平埔族」。在「蕃人」這個侮蔑性通稱之下，「生」「熟」的區別主要是以他們的漢化或「文明」化程度為標準，而由滿清或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者所做的獨斷且傲慢的一種規定。

平埔族有些與漢族系居民雜居，有些分佈在山麓地帶或鄰接的平地，不過現在漢化顯著，幾乎無法與漢族區別。另一方面，當台灣從殖民地解放，重歸中國以後，台灣行政當局仍舊專門只把高砂族當做行政的特別對象，改稱他們為「高山族」。現在，通常稱他們為「山地人民」或「山地同胞」，也簡稱「山胞」。

此外，國府·台灣的行政當局在戶籍上，把本籍設在舊日本統治時代的特別行政區域，



台灣先住少數民族分布圖

(製於1917年4月，日據時期，光復後未有同樣之調查。)

也就是所謂「蕃地」或「蕃界」的高山族及其子孫分類為「山地山胞」，把本籍設在舊的一般行政區域的高山族則分類為「平地山胞」，實施行政和選舉，以迄於今。

然而，儘管統稱高山族，實際上卻分為泰雅、賽夏、曹、布農、魯凱、排灣、雅美（以上為「山地山胞」）、阿美、卑南（多屬於「平地山胞」）九部族。在九部族間，語言、文化、社會組織、生活方式等方面各自不同。若要舉出體質上的共同特徵，則大致是淡褐色的皮膚、大而發亮的眼睛、雙眼皮、矮個子等。

他們的語言，也同樣都被分類、歸屬於馬來·波里尼西亞系，不過除了圖畫文字以外，並沒有自己固有的文字。我們也許應該這樣看待這件事：在獲得自身的文字以前，被迫接納漢族和日本人這些外來的闖入者，因此在文字的尋求上遇挫。壯年以上年齡層的部族間，由於歷史的情境，在日本殖民地時代被迫使用的日語，成為唯一的共同語言。另外，青少年層共同的溝通工具，則為光復後新引進的中國標準話，也就是北京官話（在台灣稱為國語）。

到經濟成長期前夕為止，他們大致的分佈情形，可參照附圖。把住在平地的阿美族，甚至於住在蘭嶼各島、視為海洋民族也絕不過分的雅美族，一概通稱為「高山族」，筆者無法同意。還不如稱為「台灣先住少數民族」，或由 Native Taiwanese 翻譯過來，稱為「先

住台灣人」比較妥當。無論如何，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所居住的面積，約佔台灣省總面積的四四%，截至一九八五年的總人口約為三十二萬。這固有的「分佈」，由於受到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高度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影響，已發生激烈的震盪。

尋求民族意識的抬頭

光復以來，國府·台灣當局的山地政策由兩根支柱所支撐。第一，以預防非山地系的一般人入山所引起的侵蝕為方針，依據「台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推行「保護」政策。

第二，確保山地治安，具體實施以預防中共建立游擊基地為主要目標的「戒嚴時期台灣省區山地管理辦法」，一直管制一般平地居民入山。這種管制的附帶目的，在於保持山地社會的既存秩序，是不指自明的。

日本統治時代「理蕃政策」下的特別行政區，也就是「蕃界」的管理，是同時牽涉先住少數民族與漢族系居民雙方的。相反的，國府一面開放先住民自由下山入山，一面卻對一般平地居民的入山採取許可制——通常是嚴格的限制，迄今依然如此。

隨著六〇年代以來的經濟成長，都市地區的勞力需求增高，山地與平地，尤其是都市區的所得差距持續加大。原住民下山的自由，同時也促成青年們向都市地區遷移的自由。緊接

著，由霓紅燈所代表的都市的虛榮，把先住民的年輕婦女逼進色情行業；先住民就業機會的擴大，把青年們誘入重勞力工作的「最底層」——煤礦工人和遠洋航海的下級船員。而其他的大多數，不是被迫留在人口越來越稀少的山村僻壤，就是在都市地區的最底層尋找居停，藉此躲避風雨。

我們不能不說，隨著台灣經濟的推展而發生的悲劇式惡性循環和社會變遷，如今正把上述的以往先住少數民族的分佈圖，大加塗改了。就算是現代化所必然的副產品，代價仍然太高。先住民系台灣人被迫付出的高價成本，可以說觸目皆是。

在這種逆境下，先住民系台灣人多半一天天被迫喪失自我，喪失故鄉。逢逆頂撞，民謠歌手胡德夫（排灣族出身）等覺醒的先住民系台灣青年們組織了「原住民權利促進委員會」，開始走向少數民族的民族自覺運動、爭權運動。真正且高層次性的自我認同的尋求，是值得注目與關懷的，但願他們能夠早日恢復以往始則迫於外力，繼則從自身的內在也無法找到的自我認同，從而匯入更高層次的認同。

2 本省人與外省人

閩南系本省人

本省系漢族出身的住民，分爲福佬系，也就是閩南系與客家系兩大支。以下打算探究各自的由來。如衆所知，福建省山巒疊嶂，省內交通不便，迄今仍有多種方言存在，是著名的語言錯綜的省份。福建省人通常不把該省出身者的母語方言群單一地統稱爲福建話。慣用於福建省會福州附近的福州話，與通用在福建省的唯一早期的良港廈門的廈門話，差異很大。而這種差異並不僅只是腔調的差異而已。通常並不把福建南部一帶，以廈門爲中心的泉州府、漳州府爲原籍的人的母語群當作福建話，而限定稱謂爲閩南語（南福建的語言）。

在閩南出身者居於優勢的新加坡或菲律賓的華人社會，往往有把閩南話改稱爲廈門話的例子。這不外是由於廈門到今天仍舊具有他們共同發源地的象徵及聲威罷了。附帶說明，在這些地區，原來的華僑大多數已經取得居住國的國籍而定居下來。「僑」既然意指離鄉而暫時寄居他鄉的人，那麼，以後還是稱他們爲「華人」比較妥當。

在東南亞華人社會時常見得到的閩南語群中，除了上述之外，還有潮州話這一支流。儘管多少有語氣上的細微差異，仍把這些語言的統稱——閩南話，也改稱為福佬話，並把說這語言的人們，也統稱為福佬人。因此，在台灣、閩南人和福佬人、閩南話和福佬話是同義詞。

客家人本省人

客家人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在中國大陸，也廣闊地橫跨在廣東、福建、江西、四川、廣西各省。因此，台灣客家在大陸的「原鄉」（父祖在

大陸的故鄉），並不限於廣東，福建也該算是重要的發源地。來自福建省汀州府的客家，尤其

不少。正像閩南語群有四系一樣，台灣的客家語群，有「四縣」、「海陸」、「饒平」三系，在日常生活上可得到確認。四縣主要是隸屬於舊嘉應州的興寧、五華、平遠、蕉嶺四縣，海陸主要是舊惠州府的海豐和陸豐，饒平主要是舊潮州府的饒平出身的人們各自使用的客家話。

此外，有一種通俗見解，認為客家由於比閩南系漢族晚來台灣，才被叫做客家，其實並不正確。因為客家這種自、他稱謂，中國大陸自不必說，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也慣用無阻，並不是限定在台灣、台灣的稱法。



閩南系與客家系住民分布圖

綜上所述，我們闡明了在台灣的本省人，就本來的意義來說，具有先住系本省人和漢族系本省人兩個系統，漢族系本省人又可以粗略二分爲閩南系和客家系。

截至一九八五年底，台灣的總人口約爲一千九百萬（包括少數外國人）。如根據國府前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奇祿針對今昔台灣人口比率所作的發言「本省籍閩南語群七四·五％、客家語群一三·一九％、山胞二·三七％、其他〇·〇八％、外省籍九·八五％」試算，那麼，在本省人中，閩南系佔一千四百十六萬人，客家系佔兩百五十一萬人，先住民系佔四十五萬人。小計一千七百十二萬人。又，外省人佔一百八十七萬人。上述數字，跟一般的感觸或想法比起來，顯得先住民的人口數太大，而客家人和外省人的數字略小，但姑且提示，作爲大致的準據。

外省人

在台灣常用的「外省人」，是包括台灣重歸中國後，新從中國大陸各地遷入台灣，目前定居的人和他們子孫的通稱。雖然一概稱爲外省人，可是既有東北地方各省的人，也有安徽、江蘇、浙江等省的人，又有出身於北京、上海、武漢等大都市的人。此外，也有出身於漢族系本省人在大陸的原鄉——福建省泉州、漳州、廣東省梅縣等地——的人。至於所出身的民族，以漢族佔多數固然是事實，但藏、蒙、新疆維吾兒地區的回族，還

有滿族旗人的後裔也該包括在內。

外省人大部分追隨國府中央遷台而徙入台灣。據說由於事關國防機密，當局從來沒有發表過他們的正確數字。儘管如此，民間一直傳說，連軍隊在內，自光復以來，遷入台灣的外省人口大約是兩百萬。當時國府軍的實際總數，據說是六十萬。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在五〇年代初，本省人絕少加入軍籍。

外省人遷台時期

外省人遷台時期可粗分為二：第一期是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勝利，也就是光復，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前後。他們以接收要員的相關人員爲主力。由於語言因素，會講閩南話或客家話的人，或具留日經驗者，懂得日語的人成爲核心。因爲在光復當時，除了少數半山之外，會講標準話——北京官話——的本省人，幾乎等於零。

第一期遷入台灣的外省人，不但在「地緣」和「語緣」的層面上具有獨特的性質，而且在人事關係上也特異。受命爲接收台灣的領袖的，是陳儀將軍。他屬於政學系，日本陸軍軍官學校與陸軍大學雙料畢業，娶日婦爲妻。陳氏受命爲台灣省長官公署首任長官的主要理由，似有以下三項：

①曾任佔有漢族系本省人大半的閩南系人的原鄉——福建省——的省主席。

②屬於知日派，曾在第二次大戰前擔任福建省主席期間，主持過日據時期台灣的視察與台灣研究的計畫。

③在福建主政期間所培養的中上級幹部中，有熟諳日語、閩南話的一群，能運用這項人事關係。

有了上述緣由，就可想見應邀襄助陳氏的台灣施政的中上級幹部，多半是在他主持福建省政時代，具有淵源的人物，或跟這些人有關的人們。

另外，也有企圖開拓台灣貿易的商人，逃避大陸上的漢奸整肅（追究對日合作者的責任）而混入台灣的逃法之徒。由於戰後的混亂，與對大陸的關係斷絕達五十年，容許隱姓埋名的空間較大，這似乎提供了他們緊急的避風港。

第二期是從大陸上的國共內戰顯然正不利於國府的一九四八年底起，到國府中央全面遷台的一九四九年底前後為頂峰。

第一期的遷台人數，合計最多不過幾萬人程度。因此，這只能說是移民的小波。相形之下，第二期應該稱為大浪。光復當初，台灣、澎湖地區的總人口數約為五百六十萬。這等於

是說，在叫做台灣的這個熔爐中，僅僅不到一年，居然發生了約兩百萬人，也就是現存人口的三六%弱的短期性社會性人口大增加。

外省人的生態

本來，中國話所說的外省人，是不限定於台灣省人與他省出身者的用語，好比是人類學上的概念那麼單純的東西，然而，在目前的台灣，它已變成政治學上的概念而獨行其道了。在從內側分析、說明成年層的本省人或台灣人的憂鬱與他們反外省人的感情之前，先據實介紹外省人的生態：

第一，追隨國府中央遷台而移入台灣的外省人的大浪潮，本於國府政權當時的性格，是地緣性的牽連極濃的集團。成爲地緣的核心的，是浙江、江蘇兩省。

第二，黃埔軍校出身的將領們所統率的軍方人員，與軍方高級幹部的家屬。蔣介石擔任過該校校長，企圖透過該校鞏固自己的軍方勢力。

第三，是特務機關，也就是「軍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中統」（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俗稱C·C）以及警察機關的上層人員。

第四，是民意代表與高級官僚集團及其家屬。

第五，是積極支持國民黨的財界、經濟界、企業界的領袖們。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士，當

國府政權在台灣尚未穩定以前，居留香港、澳門、東南亞，甚至北美洲等地觀察情勢，等到進入六〇年代之後，才以華僑投資方式，重新遷入台灣。

第六個值得注意的集團，是技術官僚圈的人士。他們多半與政治沒有直接的牽連，只因爲厭惡在大陸困於國共內戰而無從就業，或無法工作，才遷入台灣。他們主要是想在一九四八年以後，從事戰後復興而開始運作的台灣近代公共事業與各項工業，尤其是鐵路、電力、製糖業、石油（以台灣中北部所生產的天然瓦斯爲中心），還有肥料廠中，尋求高級技師和經營者的職位。

第七個可以舉出的集團，是以初中、高中以上的中高等教育機關的教職員身分遷入台灣的人士。由於殖民地時代的愚民政策，台灣人合於條件者絕少。何況，又沒有設定便於改制的過渡期，而在光復後馬上開始以中國標準語爲核心媒體的學校教育。因此，自然不得不全面仰賴外省人爲主要成員。唯一的例外，是與醫學相關的專門教育。

上述人士可以說是得天獨厚的移民，是「逃亡者」。由於中國人的習性，金額多少固然有別，但逃亡者的中上階層仍舊隨身攜帶「黃金」或美鈔進入台灣。

然而，隨大浪入台的將近六十萬的外省籍軍人，倒是以下級士兵爲主。他們可以說是歷

經抗日戰爭，浴過國共內戰的砲火，然後在具有強制性的軍紀下被帶進台灣的。他們多半未婚，或隻身入台。他們學歷既低，地位且卑，因此多半條件不好，實在值得同情。據說其中文盲佔多數。直到現在，仍然常見到無法結婚，被思鄉病折磨的老「榮民」，在擔任台灣最底層的勞動的身影。入台時年齡稍輕的軍人中的幸運者，據傳還是娶台灣最底層（貧窮的先住系台灣人和極貧窮階層的漢族系台灣人）的婦女，靠擺攤子餬口，躲避雨露。

外省人的語言生活，在原則上大致以國語（北京官話）為前提。然而，國語的制定、普及，年限尚淺，一般人以出身地的方言應急。外省人的本鄉既橫跨全中國大陸，方言的種類當然多而分歧，趨於繁富。

外省人的獨特性格

移入台灣號稱外省人的新移居者集團，跟一般移民的性格頗多不同。

按通常情形，移民或因移居結果而變成的新來者，以併入既不是他們所建立，也不是為他們而建立的既存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為前提，來選擇移居這個社會行為。因為對新來者而言，並沒有作其他選擇的可能性。移居者自己儘管抱有賓客或過客，也就是新手的自覺，通常總是自發地——多半具有即使將來有一天會被同化也無所謂這種打算——力求適應環境的一切。

以國府中央爲核心的向台灣移居的大浪，景象顯然不同：

第一、他們是以超過兩百萬的絕對數所形成的相當完整的移居者集團。

第二、他們儘管對中共軍抗爭失敗，仍然擁有號稱六十萬的大軍。擁有海、空、裝甲兵的所謂現代裝備的三軍，仍然幾乎毫無折損地移到台灣。

第三、以中央政權的行政機關爲中心，把包括國會在內的現代國家大致的框架全數遷到台灣。

有趣的是，由以蔣介石爲中心的國民黨右派解釋的三民主義，也不曾被遺忘，當作意識型態帶入。

大陸風格建築的涵義

在外省人帶入台灣的一切之中，另外還有台灣這座島嶼不曾有過的兩樣東西。那就是烹調和建築式樣。

冠以中國大陸各省名或各處地名而林立的中餐廳，來自外國的觀光客所百嘗不厭的種種中式菜餚，這些譽之爲飲食生活藝術的巔峰也絕不爲過的山珍海味，似乎可以說是跟外省人一同入台並展示它的演化的典型新事物。

由公共機關爲媒介而引進，且國府當局費盡心血帶入的代表性事物，有國立故宮博物院

的「寶藏」。建立在位於台北市中心東北方約八公里的外雙溪山麓的故宮博物院，據說收藏了綿延中國歷代五千年的美術品及文物等約六十二萬件。這正是它與法國的羅浮、蘇聯的艾爾米達齊、美國的大都會等博物院並列為世界四大博物院的由來。

這些國寶本來是北京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一九二四年清代最後的宣統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後設立）與南京的中央博物院所收藏的絕品。它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軍進攻南京前夕，國府當局搶先運進台灣來的。如今已成爲國府台灣足以向世界誇耀且可當爲招徠嘉賓的最大且最高的象徵性觀光資源。

鑑賞了故宮博物院的國寶後，從外面把台北故宮博物院當建築物來眺望，往往會沈思直線式屋頂的華北系式樣的建築，到底在象徵什麼。

足以引人陷入同樣沈思的代表性建築物，另有圓山大飯店和中正紀念堂兩座。前者是日本旅客喜歡投宿的中國式宮殿風格的宏偉華麗大旅館。在同一地點，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爲止，日本當局存心靠宗教層面來增強台灣統治而建立的台灣神社還在屹立揚威。如今，知道這件事的日本人已經越發稀少了。意味深長的是該飯店開業後，主要的顧客是美國軍事顧問團的高級幹部。

位於台北市中心的總統府，是由以前的台灣總督府增修而成的。主人固然換了，但功能——當作支配與統治的權威的象徵——依舊不變。而屹立在它的正對面，高達七十公尺的正紀念堂，是台灣最大的公共建築物。衆所周知，興建在總面積七萬八千五百坪（二十五萬平方公尺）的寬闊廣場上的這座巨大的中國式建築物，是以紀念故蔣介石爲目的的。

按照蔣介石所享的年齡八十九，從該紀念堂正面的人行道到二樓正廳的台階，經設計爲八十九段。從上述設計等推想，傳聞有人說這是中國史上罕見的興建在大都市中心區的陵墓。

這些與台灣本來建築式樣完全異質的大陸中國式巨大建築物的出現，也是透過外省人，尤其是國府台灣的權力機關所帶來的。蔣介石的後裔和支持者，或許是爲了要永遠把蔣奉戴並推崇爲孫文以至於辛亥革命的正統繼承人，而仿建的。此外，也未嘗不可看成：他們憑藉建築式樣，來舒泄思鄉的情懷，來補償喪失「故土」——錦繡大陸河山——的內心空虛。

他們儘管在中原的逐鹿上失敗，可是也許自詡把中華文明移植到台灣這個邊疆來，而感到自我滿足吧。當作無可取代的象徵，而假託在這一連串的建築物上，這種解釋也是可能成立的。

第二章 台灣史的原景

1 地名變遷的涵義

古代的台灣

台灣有一個英文名字，叫福爾摩沙 Formosa。據說字源可以追溯到葡萄牙人通過台灣海峽，遙望台灣本島而叫喊的 Ilha Formosa (island beautiful)。這「島，美麗的」轉為「麗島」、「華麗島」，再變成近年在台灣常用的「美麗島」。日本詩人北原白秋把他一九三四年夏天所寫的台灣紀行，收編在《華麗島風物誌》的標題下。內容姑且不論，以書名來說，顯得異常優雅。

領著歐洲勢力的前鋒東漸的，是葡萄牙人。他們在一五一七年航行到澳門。按記載，於一五四三年和一五五〇年分別抵達日本種子島與平戶。

明室授與葡萄牙人在澳門的通商定居許可，是在一五五七年。此外又有一五九四年葡萄牙人在台灣島嘗試貿易殖民的說法，惟尚未成爲定論。就算葡萄牙人曾經佔據過台灣，也只是一時性的，還不如認定他們由於西班牙人與荷蘭人的東漸，加強澳門堡壘才是迫切的要務，因而撤退。這樣追究下去的話，似乎可以說，葡萄牙人稱台灣爲福爾摩沙，約略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

在文獻上能夠追溯的福爾摩沙以前關於台灣的地名，不用說，是根據漢語的。按照通說，秦漢時代的中原中國稱台灣爲「東鯤」，東漢（後漢）·三國時代的吳國，則稱台灣爲「夷洲」。鯤是古代中國傳說上所出現的大魚的名字，因此，從猜測爲「東鯤」這點推想，似乎可以論定：當時的文人們對台灣還沒有臨場感。

《三國志·孫權傳》記載：吳的黃龍二年（西元二二〇年），衛溫與諸葛直率領「甲士」（軍人）萬人到夷洲。如果按照通說，把夷洲改讀爲現在的台灣，那麼衛氏他們的軍事行動，可以看成中原中國的王朝計畫遠征台灣的開始。夷或東夷，原先是古代中原中國人指住在自己東方的各民族的名稱，洲則指浮在水上的陸地。因此，夷洲應當看做住在以長江三角洲一帶爲勢力範圍的吳國東方的少數民族（夷）之島嶼（洲）。

在歷經兩晉南北朝到隋初的約略三個半世紀的期間，目前尚未發現有關台灣的特別文獻資料。這或許是因為大陸內部的政權多災多難，無暇過問東南海域。

五八九年，隋的楊堅統一了分裂的南北朝。乘勝推進的第二代皇帝煬帝試圖四處對外遠征。依據《隋書·流求國傳》煬帝於大業三年（六〇七年）首先派遣朱寬等到「流求」，訪求異俗。第二年，從事慰撫，但不聽，於是決定派兵。令陳稜與張鎮州率兵，從義安（現在的廣東潮安）啓航，出兵到流求。結果，俘獲男女數千人凱旋，以後斷絕來往。

一般認為流求後來變成留求，然後是瑠求，再次是琉球，直到宋、元。今天的琉球（沖繩）的存在，在中國史上越來越明確，台灣這個琉球就成為小琉球，沖繩這個琉球就成為被冠上大字的大琉球。認定大小的區別，不是指土地的大小，而是指文化程度的形容詞，似乎不差。應當認為是：分別對「未開」的台灣戴上小字，對已知中華禮法的琉球戴上大字。總之，這足以令人窺知中原中國文人對外認識的一端，饒富趣味。

難道沒有從「台灣」這一方，向大陸彼岸那一方引發挑戰性行動的可能嗎？

宋代的兩種文獻，提示有趣的事跡。一種是樓鑰撰《攻媿集》卷八十八的〈汪大猷之行

狀》。該書記述毘舍耶人（按：可想像當為現在先住台灣人中的雅美族）侵入平湖（澎湖），擔任泉州知府的王大猷因此於南宋乾道七年（一一七一）派遣軍民到澎湖島。

第二種文獻是擔任福建路市舶提舉（海港的稅務官）的趙汝适在所著《諸蕃志》上的記述。據趙氏的記述，淳熙年間（一一七四——一一八九），毘舍耶人，同樣可認為是雅美族的人，到泉州府的水澳村和圍頭村，在暴行後，搶奪鐵器等。

其實，元世祖忽必烈在攻略日本（日人所謂「元寇」，第一次為一二八二年，第二次為一二八七年，都告失敗）後，於一二九二年隨著國力的伸張、派遣楊祥到瑠求，試圖招撫。然而，居民不理。接著，成宗又於元貞三年（一二九七）再度派兵瑠求（《元史·瑠求傳》）。設置第一個地方行政機關「巡檢司」於澎湖，作為台灣經路的一環（元，汪大淵著《島夷志略》）。時在至元年間，也就是一三三五——一三四〇年。汪大淵也記錄：同一時期，居民達一千六百多人，與泉州之間，有商船數十艘頻繁來往，盛行貿易。

綜上所述，當可推知，到了元代，「台灣」就慢慢地、以更清楚的面貌，逐漸被編進為中原中國歷史舞台上的一員。

2 明代的大陸與台灣

鄭和的遠征與台灣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是中國史上以江南為中心而出現的第一個統一王朝，這點事實很重要。一四二一年，第三代永樂帝遷都北平改為北京。然而，明太祖建都南京（江蘇省）的歷史意義是重大的。江南文化的成熟，必然把它文化化的浪潮推到台灣海峽的彼岸。

明帝國所發動的七次遠征南洋（從現在的南中國海到東南亞以至西南亞一帶的地區），頗為著名。指揮遠征的武將鄭和，是雲南出身的回教徒，在永樂帝時代擔任宦官的首長。遠征從一四〇五年到三三年為止，實施七次。

足以傳述鄭和遠征南洋與台灣的牽連的，有下面的事象。第一，是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成書的《明會典》記載遠征軍在赤崁（現在的台南市附近）補給用水。第二，是台灣有關「三保太監」（鄭和）的民間傳說。這個民間傳說究竟是出於台灣，還是從對岸帶進來，未嘗沒有爭論的餘地，但似乎以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強。

倭寇與台灣

明代中葉，十五世紀以後的中原中國王朝之外患，正史通常以「北虜南倭」四字表示。與台灣具有直接關係的，當然是後者南倭，也就是倭寇的侵入和稱雄。通說認為倭寇是從十三世紀到十六世紀，在朝鮮、中國沿海耀武揚威的海盜和商團的總稱。倭雖然指日本，但倭寇的真相，應該看成日本、朝鮮、中國各國居民雜湊成軍，比較接近史實。

倭寇又可分為前期倭寇與後期倭寇。前者以十四世紀為中心，主要在朝鮮與中國山東省沿海騷擾。後者則從十五世紀後半到十六世紀，以長江三角洲地帶乃至華南海域為中心逞威。

南台灣變成後期倭寇的基地，對岸居民也開始移居並開墾台灣。而且，台灣還衝破明室所實施的海禁政策——對民間海上交通、貿易、漁業等的限制與禁止——的漏洞，逐漸提高它貿易中介地的地位。

從現存的史料看來，自十六世紀中葉到末期，對岸的漢族系住民似乎主要把台灣當作「海盜」基地，加以利用。此外，漁撈大概也是目的之一。至於農耕，至多只夠附屬於基地的農產物的自給而已，這樣想像，大致不差。總之，這時期的台灣本島，一如東蕃這稱號所示

，對明王朝而言，還是域外之地。不過，值得記下的是：明王朝把在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一度撤廢的澎湖巡檢司，於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重設，作為倭寇對策的一環。

有趣的是，葡萄牙人的一部分曾與後期倭寇勾結，記錄俱在。他們後來與明室合作，以驅逐倭寇立功。在這段期間，他們獲准在澳門定居通商。此後，稱為「佛郎機」的葡萄牙人就獨佔明朝的官辦貿易，尤其是澳門、南九州間的中日貿易達一個世紀，收取莫大的利益。西班牙系的耶穌會相關人員稍微落後，於萬曆八年（一五八〇）訪台。按：他們恐怕是利瑪竇一行的有關人員，在中國大陸正式傳教（一五八三）前夕，順道停留台灣。

十六、十七世紀間的日本與台灣

日本方面，豐臣秀吉約略在同時，試圖於文祿二年（一五九三），向「高山國」送達「國書」。織田・豐臣政權的統一（一五九〇）使日本人・倭寇趨於平靜。「海盜」性格固然淡化，但他們之精力與體驗的累積卻透過朱印船貿易的形式，建立體制。秀吉致「高山國」國書的舉動，如果把它看作上述趨勢的一部分，即可理解。

根據日本明治・大正年間的歷史學家伊能嘉矩的考證，當時往來台灣的日本列島居民，以南台灣沿海為主要停泊地。該地叫做「打高社」（「蕃語」名），被漢族轉訛為打鼓山社。

它的發音接近日語的「高砂（音 Takasago）」，土地風光明媚，又令人聯想到日本高砂浦（兵庫縣）的勝景。伊能研判：「似乎因此假借高砂二字，來勉強轉訛。他接著又記述：起初只做單純一個地方的名稱，可是以後被慣用為全島的地名（參照吉田東伍編《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所載，伊能執筆的〈第三，台灣〉）。

其實，在金地院「異國渡海御朱印帳」中的元和元年（一六一五）條，有「高砂國」的記述；又，被認為於正德年間（一七一—一七一五）寺島良安所編著的《和漢三才圖會》中，有「塔曷沙古，和用高砂字」的記述。正擬歸納為：從 TAKAU（打高）而 TAKOSAN（打鼓山），然後轉為 TAKASAGO（塔卡沙哥），以漢字「塔曷沙古」對 TAKASAGO 的近似音，再轉訛為雅字的「TAKASAGO 高砂」。後來，到了日本殖民地時代，由日本當局把打狗（TAKAU）和（生）蕃族分別改名為高雄和高砂族。這是由於有上述歷史根源的緣故。

隨豐臣秀吉之後，有馬晴信在一六〇九年帶武卒視察台灣，接著，村山等安於一六一六年率領十三艘兵船，試圖遠征台灣。

總之，萬曆年間（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前後的台灣一帶，紛擾多事。對岸的漢民族對台灣的積極介入也趨於明顯，登場史冊的頻度也加高。

「台灣」的登場

「台灣」這個名稱終於登場了。

徐懷祖的著作《台灣隨筆》（清·康熙三十四年即一六九五年成書）說：「台灣（的稱呼）至今尙不知曾有。惟明代甫田（閩北縣名）人周嬰所著《遠遊編》，有《東蕃記》一篇，稱台灣為台員。當係南音。」閩南話中，「台灣」和「台員」是同音。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的諸羅（今嘉義）縣知縣季戲光在自著《蓉州文稿》中也記道：「萬曆間，海寇顏思齊，據此地，始稱台灣。」顏是否最先稱呼「台灣」，另當別論，反正從萬曆末期開始，「台灣」或同音異字的「台員」就出現在史冊這點是確實的。此外，據和田清博士的考證，除了「台員」之外，同一時代還使用「大員」、「大圓」、「大灣」等為近似音譯字。

荷蘭人的東漸

受到葡萄牙人據澳門並獲取獨佔性高度利益的刺激，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也都東漸，出現在台灣海域。荷蘭人早就在一六〇二年階段，組成以當時來說，屬於特別先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而成爲此後經營亞洲的前進基地。

荷蘭出現於南中國海海域，以中國貿易爲目的的首次軍事行動，是一六〇二年的澳門攻擊。它主要的意圖，在於打擊獨佔亞歐之間貿易的葡萄牙。

然而，荷蘭受到葡萄牙與明室聯軍的反擊而後退。儘管一六〇三年七月佔領澎湖島，仍屈服於明朝的警告，而在大約十個月後撤退。第二年，即一六〇四年，派遣兩艘船到漳州，向對岸的泉州官憲請求貿易許可，可是再度受到拒絕而離去。荷蘭於一六二二年四月，向澎湖島發動正式的攻勢，然而經過八個月的佔領和交戰後，在明朝的大軍壓境下進行交涉。

在荷蘭與明朝的交涉中，荷蘭自明朝確保①台灣為「化外之地」，也就是王化所不及的土地，教化之外的土地和住民，因此對佔領不表異議；②承認他們在台灣與民間的通商貿易，不妨害中國商船來航為條件，才從澎湖島撤退。

荷蘭人一六二四年開始在安平修築熱蘭遮城，在它對岸本島部的赤崁（今台南市）修築普洛文西亞堡。並且以台南一帶為中心，逐漸進行重商主義式的殖民地經營。

另一方面，在菲律賓稱霸，把墨西哥銀帶入亞洲，正在改變中國商

圍繞台灣的三大勢力

品外流形勢的西班牙人，對荷蘭人佔據南台灣的局面感到震驚和威脅。主要的理由是極度擔憂被荷蘭切斷、妨害華南——馬尼拉——太平洋——西班牙（歐洲）這條航路上甚具軍事和經濟潛力的太平洋的制海權和橫斷貿易。

兩年後，即一六二六年，西班牙巧妙地躲過荷蘭的阻撓，沿台灣東海岸北上，經三貂堡

（三貂角，原為西班牙人所命名的聖狄亞哥的漢譯，今台北縣東北角地區），在雞籠灣內的社寮島（今和平島）修築聖薩爾瓦多城。接著，於一六二九年，也繞過西北部沿岸，拿下淡水，修築聖多明哥城（紅毛城），溯淡水河而上，試圖也在台北平原扶植勢力。

如今，在台灣本島，荷蘭人佔據安平、台南一帶，顏思齊、李旦和鄭芝龍一夥佔據魷港（今嘉義縣東石與布袋附近），並有西班牙人佔據以雞籠淡水為中心的北台灣，各自肆意活動。再者，企圖與上述三大集團交易，因而向台灣推進的，正是搭乘朱印船的日本商人。

在這三大勢力中，以台灣為據點而出力經營的，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此以前，以安平、台南為中心而盛行的對中國大陸的「走私」，也隨著荷蘭的軍事介入而改變，已有的交易業者，中國人和日本人都被課徵重稅，商權的主動力也逐漸被荷蘭人所掌握了。日本人濱田彌兵衛一夥與荷蘭有關人員在台南的衝突事件（一六二八），即為著例。

一六二〇年代的荷蘭當局與鄭芝龍一夥之間對抗的記錄，目前尚未發現。這或許是由於兩集團間的互補、共存關係，緊密、重要到超過矛盾、對立的緣故。

3 荷蘭對台灣的支配

荷蘭人佔據南台灣

外來者對台灣與先住各民族的「征服」，從一六二〇年代開始正式化。在以台灣為對象的抗爭過程中，日本人和西班牙人落敗下去了。

剩下的是中國人與荷蘭人。中國人，不用說，是福建、廣東二省，尤其是以接近台灣，慣於渡海且長於航海術的閩南系居民為核心的集團。

通常多把台灣史的一六二四到一六六二這三十八年間，當作荷蘭支配期來掌握。不過，單就荷蘭方面的史料，例如《巴達維亞城日誌》、《被投閒置散的台灣》（荷蘭的台灣太守揆一著，一六七五）等來看，荷蘭人並沒有那麼執著於對台灣的殖民地支配。

荷蘭方面為了打破葡萄牙人在遠東對日、對華貿易的獨佔，甚至於驅逐葡萄牙的勢力，而攻擊它的根據地澳門。這一著失敗，接著就到西班牙人所掌握的中國商人在華南——馬尼拉航路上的起程港之一——漳州，逼迫通商。然而，荷蘭連這一著也失敗，於是試圖在中國沿海的離島——澎湖島——設立據點。可是，也沒成功。這一來，終於決定佔據南台灣。

值得留意的是：連佔據台灣這一著，都是一六二二年聽到西班牙人向台灣推進的傳聞，而想先發制人的倉促決定。荷蘭人所修築的熱蘭遮城和普洛文西亞堡都以監視外海為主要目標，並不以台灣島內的土地和人民為攻守之主要對象。

當時，台灣的先住各民族，多半仍在狩獵與漁撈階段。荷蘭東印度公司結合豐穰的「處女地」與大舉移來的漢族系居民，推行開拓。稻作和甘蔗成為它的中心作物。這不僅是風土適宜雙方，而且來自閩南的移民也具有該兩種作物栽培的高度技術。此外，當年的閩南是中國製糖技術的先進地帶，在開墾中砍伐的樹木，還成為貴重的燃料來源——製糖所需的柴薪。

鄭芝龍開拓台灣

處於時勢的漩渦中，因勢利導，並充分加以運用的代表性人物，是鄭芝龍。芝龍也稱爲一官或老一官。出身於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年輕時投奔外祖父，出澳門。及長，遷往父親紹祖寄居的日本平戶，娶平戶的田川氏，一六二四年生福松（成功，後日的國姓爺）。

鄭芝龍加入爲顏思齊、李旦（一六二五年卒於平戶）的夥伴，出沒華南沿海及台灣海峽一帶，繼承顏李的衣鉢，從泉州一帶到澳門、馬尼拉，再以魷港、安平、台南與平戶各地點爲舞

台而活躍。

針對上述行徑，明室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招撫芝龍，芝龍也接受了。從海盜（有時為武裝貿易集團）搖身一變而為官的芝龍，起初就任海上防禦，借名掃蕩海寇，打倒往昔的競爭對手，掌握制海權。接著，爲了對抗荷蘭的勢力，並加以利用起見，致力於魴港鄰近的開拓。

鄭芝龍於一六二八年招募福建省民數萬人到台灣，發給他們每人銀三兩，每三人耕牛一頭，責令從事開拓，企圖在台灣扶植並擴充自己的勢力。然後，積許多戰功而升任都督。後來，這些經歷和業績，成爲兒子鄭成功向荷蘭奪取台灣時所運用的口實。

盤踞在北台灣的西班牙人，可能忙於經營美洲與菲律賓。起先是在歐洲敗於荷蘭人所挑起的獨立戰爭，來到東南亞後，又在搶奪香料貿易獨佔的摩洛加群島之戰再嘗敗績。在北台灣既以山地民族中最勇猛、勢力最強大的泰雅族爲主要對象，事實上，根本不必提殖民經營，恐怕連天主教傳教也無法如意實施。不久，被佔優勢的荷蘭艦隊所驅逐，結束了十六年間的北台灣支配史。

4 漢族政權的上台

鄭成功與清朝的對立

中國邊疆少數民族之一的女真族，自古分住在中國的東北部。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首長努爾哈赤（清太祖）統合女真族，脫離明室的間接統治而獨立，在東北建立後金國。他死後，第二代皇太極（太宗）繼承父業，分別征服東面的朝鮮半島和西面的內蒙古，創立了橫跨東北、朝鮮、蒙古的國家。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太宗稱帝，號稱大清國。

一六四四年，北京受到李自成所率領的農民軍的攻掠，明亡。清軍乘機突破山海關，進入華北，兵不血刃而入北京，定都於此，君臨中國。

明的殘餘勢力之一，是以東南沿海各省，尤其是廈門為中心而活動的鄭芝龍、鄭成功一夥水軍。明在北京滅亡後，南京的宗室福王（朱由崧）倚賴芝龍的勢力，封他為「南安伯」（一六四五）。福王又把在靠近芝龍家鄉且為他們根據地之一的福州駐守的唐王（朱聿鍵），也封為「平虜侯」，再封為「太師平國公」。

然而，芝龍的事功，與其說關心明王朝的命運，倒不如說在乎怎樣在保持自身榮譽的情況下，和新王朝共存。清有切斷芝龍的水師與反清復明運動的結合，讓它維持局外中立的必要，芝龍又設法憑藉他與清的談判，以保存自身的勢力。

一六四六年，清傳喚芝龍到北京，並加以軟禁。既把芝龍扣留爲人質，清軍就同時使用攻擊與撫慰的軟硬兩策，企圖挫折他的兒子鄭成功所指揮的水師。不料，利用鄭芝龍之策得到反效果，只有激發鄭成功對清王朝的憤怒。結果，鄭成功由於拜受唐王賜爲朱姓，自號國姓爺，統合留存在華南一帶的明宗室和遺臣，爲反清復明運動而奔走。

清攻膩了鄭氏一夥，於一六五六年發出貿易禁止令。接著，於六一年，對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五省頒佈遷界令。這是要在沿海地方劃清特定界線，強制居民遷移到該界線內，使沿海一帶保持無居民狀態的一項極端嚴厲的法令。它的目的，是要切斷鄭氏一夥與沿海居民的接觸，枯竭物力人力雙方面的補給來源，逼迫鄭成功等反體制派投降。然後，清室於同年四月，將在北京軟禁中的芝龍一族全部處斬首刑。這當可判斷爲對鄭成功的決裂宣言。

鄭氏的主政

鄭成功於一六六一年，率領二萬五千的大水師，攻取荷蘭人佔領下的台灣。第二年二月，荷蘭人開城投降，鄭成功就在台灣本島的土地開創他的政權。

此後，到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降清爲止的二十二年間，實施綿延鄭氏三代的台灣主政。

原始林和豐饒的處女地所代表的「曠野」，與以南宋以來驟然使中原中國文化生根發芽的閩南人爲中心的鄭氏一夥的「文明」二者正式的融合，以台灣爲舞台而開幕了。這又成爲漢族系政權在台灣建立的歷史性創舉。

鄭成功稱台灣全域爲東都，以赤崁之地（今台南市）爲承天府，設府治，建立一府二縣一司的制度，開始新政。他又試圖招撫呂宋島，但沒有結果，而於一六六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病死，年僅三十九。在鄭成功死去的前一年，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上以不世出的天子聞名的康熙帝（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在位）即位了。

奉命留守廈門、金門的鄭成功的兒子鄭經，接到父親的訃聞，就率領殘軍及有關人員七千餘名遷台。鄭經改東都爲東寧，又將天興、萬年二縣升格爲州，建置內閣制度。鄭經在形式上仍舊遵照明朝的統治制度。不過，只要依實質來看，確有把台灣當作安居之地而加以開拓經營的意願，這也可以從前述的改名和內閣制度的建置推測。

從政策的層面輔佐鄭經的台灣經營的，是流亡儒士陳永華等人。再者，大舉推動處女地的開墾、製糖、製鹽產業的力量的，應該歸功於與鄭成功父子一同遷入台灣的五萬人，以及

在他們以前定居的十萬人，共計約十五萬人的漢族系居民，一面抗清，一面奮發圖強。

開拓遠超過荷蘭時代，南抵今日的恆春，中部到彰化和新竹，北部及於淡水河沿岸。然而，那最多只不過是從西部沿海順著各河川，向內陸而推進的點、線上的屯田式開拓而已。以先住各民族の抵抗與原始林爲核心的「曠野」，在阻止中原中國「文明」的「面」層次的擴展。儘管如此，鄭經還是採納陳永華的獻策，也實施中原中國式文教的獎勵和科舉考試，試圖拔擢人才。此外，又經營以砂糖爲中心商品的國際貿易。

一六七三年，大陸發生三藩之亂。鄭經對此響應，進兵閩粵兩省而失敗，一六八一年，在失意中病死。與父親同樣，僅活了三十九歲。

鄭經死後，發生繼承的骨肉之爭，最後，十二歲的次子克塽受到擁立。清室乘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之亂的聲勢與鄭氏的內亂，攻陷澎湖島。克塽的徒衆知道大勢已去，遂無條件投降。康熙帝由是獲得中國全土的統治權。

5 清代前期的台灣

初期的行政機關

清室固然消滅了鄭成功的政權，內部卻發生針對處理台灣善後方式的爭論。有不少人認為未開發而稅收少，隔海峽而難統治，因此對領有台灣提出質疑。據傳，連康熙帝起初也抱曖昧的態度。不過，攻取台灣當時的水師提督施琅，深知台灣的經濟潛力及其在國際關係上的重要性，並極力主張保有台灣。清室採納他的意見，於一六八四年，決定在台灣設置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施政。

清室迎克塽至北京，還允許把鄭成功父子的棺柩遷葬故土南安等等，一面致力收攬台灣居民的人心，一面針對三十萬左右的居民派遣一萬水師防禦，表現出其用心的深遠。

清代初期對台灣的行政機關，稱為「台廈兵備道」，是在福建巡撫管轄下，把台灣、廈門兩地區合為一體的行政區，主要的著眼點在於一掃台灣海峽的「海患」。台廈兵備道的權限中，有斟酌台灣的特殊性，而賦與委任的、和大陸地區頗為不同的特別權限。

掌握文武兩權的最高行政官，稱為道台。道台每半年輪流就任於台灣與廈門間，它有關台灣的權限強有力而範圍廣大。道台一手統括內務，也就是一般行政事務、兵務（軍事）、按察使（司法）、學政使（科舉教育）和布政使（財政）。道台之下，設文治機關——台灣府，與武備機關——鎮台，道台衙門（公署）則設在台灣府（台南）。

台灣府下，置台防同知廳與台灣（台南）、鳳山（高雄）、諸羅（嘉義）三縣。台防同知廳在台南的外島——鹿耳門，它的首長稱為同知，是掌理「海寇」的取締等，以海岸防備為任務的公署。又，縣的首長稱為知縣。而鎮台把台灣分為五個警備區，以總兵為首長，統帶水陸兩軍。五區是府城、南路、北路、安平、澎湖。它的劃定務求符合道台所管轄的行政區，以策水師能對安平、澎湖作重點式防衛。又，從文武百官到一般士兵，採三年輪換制，由大陸派遣到台灣。

台廈兵備道當局力求治安的維持與秩序的重建，把對岸民間人士的來航改為許可制，違反者嚴加處罰等等，設立一定的限制。尤其視廣東為海盜巢窟，禁止廣東居民（主要是客家人）的渡台。閩南系男子與平埔族女子的通婚，因此大為盛行。

然而，海禁隨時間的推移而名存實亡，每逢大陸發生戰亂或饑荒，破禁渡台的人就陸續湧現。與鄭氏一系關係不淺的閩南系人掌握開拓的主導權，將西部平原沿著海岸開拓下去。以閩西粵東為出處的客家人，渡航期稍稍落後，主要在中央山脈和西部平原所來的中間地帶動斧揮鋤。

隨著開發的進展，一府四縣二廳制於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開始實施。新成立彰化縣，澎

湖島從台灣縣劃出而成澎湖廳，還有管轄現在的新竹以北地方的淡水廳分別開設。

稍前，一七二一年，發生朱一貴之亂。依據紀錄，這是清室統治下的台灣三大「匪亂」之一。據傳原為鄭氏一系武將的朱一貴，於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四月，在羅漢門（鳳山縣下，今高雄縣旗山附近）舉兵，進逼台灣府。叛軍由於各方響應，很快就席捲全台灣。朱一貴慶幸與明共戴國姓——朱，善用復明為天經地義而自號中興王，改元永和。

閩浙總督滿保派遣水陸兩軍對付，俘獲朱一貴，七天就鎮壓大亂。不過，要恢復全島的治安和秩序，卻花了將近兩年。前面所提的新行政機關的創設，正是為對應這種情勢而催生的。

理蕃政策

隨著漢族系移民的開拓，推向以山地為中心的邊界地，它一面壓榨先住系各民族的生活圈，一面逐漸破壞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行政當局不得不針對這點，謀求對策。因而實施的，就是所謂「理蕃政策」，一直持續到日本殖民地時代。

新加入的開拓者，對還沒有培育出個人所有權的先住系各民族，贈送酒肉、布帛、玻璃珠等等。一面試圖慰撫，一面騙取土地進行「開墾」。有時也組織徒眾，以暴力方式闖入，頻頻挑起所謂「民（漢）蕃紛爭」。合併後不久，主要是對稱為「熟蕃」的平埔族，採漸進

式的同化政策。據傳，到了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被征服並劃歸管轄的「蕃社」已達到五十三社。

不過，對住在遠離平原的僻地「生蕃」來說，事情可不容易。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建立理蕃政策，作為漢人頻頻進入「蕃界」而引起的社會不安的緩和策略，標榜確定民蕃境界與保護蕃人。雖然樹立界碑，提倡禁止漢、蕃互相侵犯，但效果不彰。當局靠蕃童的漢文教、育、「清俗」（辮髮漢服）的普及、漢姓——潘等——的授與，大步推行同化政策。另一方面，為了事先防止漢蕃結合起來造反，而試行禁止漢蕃通婚（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和限制漢人移居台灣等，但效果亦不大。

從對岸向開拓前線流入的移民群，勢難抵拒。清室到了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不得已而創設理蕃廳。把全台灣分成南、北兩路，南路理蕃關係事務由台灣府的台防同知兼管，統括二十二社；北路理蕃同知，特設於鹿港（彰化縣），統括七十二社。從上文可以看出，南台灣的「蕃情」已經相對安定，相形之下，在彰化以北，山地開拓越來越盛的情形，呈顯於文字，饒富趣味。

6 清代後期的台灣新政

列強進窺亞洲

清室對台灣的支配，由一六八三年到一八九五年，達兩世紀有餘，這裡列舉在這段期間，可以顯示漢族移民「成果」的指標如下：

- ① 漢族系居民人口，從三十萬人（一六八四）增加到二百五十五萬人（一八九三）。
- ② 耕地面積，從一萬八千甲激增到七十五萬甲。
- ③ 行政區域，起初以隸屬福建省的一府三縣開始，由於開發的進展與防務的關係，從台灣府升格為台灣省，脫離福建省而獨立；管轄內設置三府、一直隸州、六廳、十一縣。

十九世紀中葉，東北亞風雲告急。歐美列強爭取世界性規模的殖民地分割的行動急劇化。經過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雍正（一七二三—一七三五）、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三朝，到嘉慶朝（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前半為止，大約有一百二十年間全盛無敵的大清帝國，也在進入十九世紀以後，逐漸走上衰亡的軌道。茲列舉這期間的動態如下：

一八四〇年前後，英國兵船在鴉片戰爭時，爲了牽制而在台灣近海巡弋。接著在一八五四年，美國遠東艦隊司令培理自日本返航中途，停靠雞籠（基隆），調查測量煤礦與港內，並熱心向華盛頓當局提議佔領雞籠，充做補給港。一八五八年，台灣府（台南和安平）與滬尾（淡水），根據天津條約而向外國開港。一八六〇年，普魯士船對南部先住少數民族部落實施砲擊。一八六三年，增開打狗（高雄）、雞籠兩港。一八六七年，美國軍艦砲擊並進攻南部先住少數民族部落。一八六九年，英國乘居留台灣的英系商行與清朝憲警衝突的機會——即所謂樟腦紛爭，砲轟安平。一八七四年，日本謀求國際上承認它對琉球的「處分」（吞併），而對台灣出兵，爆發了所謂牡丹社討伐事件（出兵台灣，另於第三章詳述）。一八八四年，法國艦隊配合侵略中南半島之中法戰爭，砲轟雞籠、滬尾、澎湖島。

上述一連串的動盪，促成腐敗橫行的清室的覺醒，不得不承認位於東南沿海七省門戶的台灣、澎湖各島在國防上的重要地位。在此以前，清室一直認定亂多起自內部，很少從外面發生。因此，被迫作一大政策變換，採行以防止外患於未然爲最高命題的新政策。

台灣洋務運動的推行

台灣建省正是上述變換的具體表現。劉銘傳被任命爲首任台灣巡撫。他是洋務派首領李鴻章的部屬，因此，這是企圖在台灣正式實行

洋務運動而安排的人事。劉於一八八六年到任。

洋務運動，通常指在英法聯軍之役（第二次鴉片戰爭，亞羅疏事件，一八五六—六〇）到甲午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二十五年間，清室官僚中具有買辦傾向的實權派所推行的中國型富國強兵運動。台灣的洋務運動先驅，也出現在劉銘傳以前。同治年間，福建船政大臣，以鴉片戰爭著名的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就積極試行電線的鋪設，行政的革新，台灣東南部山地的開拓，道路的開通，兵制的重編與砲台的建造，受到英美兩國注目的雞籠一帶的煤礦開採，當作台灣防禦政策的一環。

沈的繼任人——福建巡撫丁日昌，原為洋務派的巨頭之一。他為了獎勵開採煤礦，也兼顧石油等礦物資源的開發調查，而渡往台灣。並且於一八七七年底以前，完成了沈所留下的工作——電線的鋪設。丁自己是客家出身，因而讓客家人大量渡台，從事山地開發。尤其大力進行特產品樟腦和茶的製造，火藥原料——硫磺的開採。另外，洋務派大臣左宗棠於一八八五年春，等待中法戰爭結束後，上奏朝廷提議將糖業之現代化政策引進台灣。

劉銘傳的新政

劉銘傳所作的嘗試——在台灣實施正式的洋務運動，有上述基礎與時代背景。原來，自牡丹社事件的善後處理中，沈葆楨奏請福建巡撫移駐台灣以

來，台灣獨立建省一直受到考慮。於是以中法戰爭為轉捩點，由於情勢的再度緊迫，才能付諸實施。

劉的新政，以「辦防」、「練兵」、「清賦」、「撫蕃」四大要素為骨幹。前二者都涉及軍政。民生部分的兩大支柱包括稱為「清賦」的土地調查事業，和在「撫蕃」名義下展開的山地開發事業。新政是洋務運動的一環，因此，防衛任務就成為它的大前提了。財政的支柱，在於合理並順利徵收田賦（土地稅）。又以土地調查事業為核心的「清賦事業」的附帶之形式下，編成最基層的行政組織——保甲制度，實施人口調查。

台灣的特產——砂糖、樟腦、茶葉的貿易，因開港而越發繁盛。此外，更多新田的開發，大大地提高稻米的生產。劉銘傳沒有錯過把豐富蘊藏資本主義的新芽、並開始具有相當規模的台灣經濟加以靈活運用的機會。

矢內原忠雄在《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高估劉銘傳的清賦事業，認為具有資本主義式開發的先驅性意義。他又對劉所用力的雞籠、竹塹（新竹）間的鐵路鋪設，輪船購置，對大陸、香港、新加坡、西貢、菲律賓的貿易，郵政制度、樟腦專賣，理蕃事業的實施及運作等等，也加以注目，認為具有積極的意義。除了上述之外，劉銘傳也推行建港，開路，擴充

電信設施，改善貨幣制度，擴充近代式教育設施，聘請西醫韓森而創辦官醫局，架設電燈等。在農業方面，則同時試辦茶、蠶、棉花、呂宋種菸草的引進與獎勵。更有趣的是計劃在大料坎溪上游（今石門水庫）開設灌溉水道，還聘請外國技師試行測量。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恆春的排灣族所引起的美國船員殺害事件，與十三年（一八七四）同樣由排灣族發動的琉球漂流民殺害事件，釀成開端，而發生牡丹社事件。清室當局趁此契機，一變從來的消極性理蕃政策，而改採積極政策。

起初，依沈葆楨的建議，首先把南路理蕃同知，從台南移到卑南（今台東市），改爲卑南同知。又將北路理蕃同知，自鹿港移到埔里社（今南投縣埔里鎮），改爲中路理蕃同知，並新設北路撫民理蕃同知，令雞籠海防同知兼任。這是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創設理蕃廳以來的改革與新的編制。不僅是組織層面，而且在南、北、中路開設道路，由政府積極領導山地開發。

劉銘傳承襲沈的政策，把撫墾委員制度更擴大爲撫墾總局，設在大料坎（今大溪）。適用範圍內的土地，各設分局，假藉「撫育」的名義，進行山地開發。大料坎靠近先住少數民族中最強大的泰雅族居住地區，水運便利，是漢蕃間物產交易中心。利用上述大料坎溪流域開

發的機會，大發財富的，正是林本源家。該家在台北近郊——板橋，修建「林家花園」從清末到日據時代，始終獨享台灣第一豪府的大名。

然而，為國內外的許多人士所注目的新政，也隨劉銘傳的離職（一八九一年六月）而暫告頓挫。也許該叫做歷史的弔詭吧，四年之後，劉的治績竟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當做與支配台灣並行的殖民地開發的「台木」而接枝活用下來。

第三章 日本的殖民地支配

1 出兵台灣與甲午戰爭

化外之地

衆所周知，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是根據一八九五年，清、日兩國所簽訂的馬關條約，台灣、澎湖島的「割讓」而開始的。到了一九四五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落敗的大日本帝國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最後一任的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舊台北市公會堂）簽署投降文書（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而終結統治。前後約為五十年。

前面已經逐步探究，自荷蘭人被趕出台灣以後，始終看不到中國人以外的外來民族對台灣進行殖民地化的具體行動的形跡。包含有清一代在內，外來者與台灣居民之間的摩擦，多半是局部性的，幾乎都只是與先住系少數民族之間發生的小衝突而已。就拿「牡丹社征討事

件」爲例，進入台灣的日本軍隊，從頭到尾標榜懲罰「不逞蕃人」的堂皇理由，以極力避免與漢族系居民的衝突之類的所謂有限軍事行動自律。

不止是歐美列強，就是新興國家而仍然虛弱後進的日本，在中國領域內以清室爲對手的衝突中，也顯得在力避衝突。從出兵台灣到甲午戰爭爲止的主戰場，各自局限在「化外之地」（如台灣），抑或屬國（朝鮮），長城外（東北三省），足可爲證。

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列強，是否忙於插手與侵略中南半島與中國大陸內部，而無暇他顧？不然，是否認爲與其對精悍的先住系各民族展開熾烈的遭遇戰，還不如與大量移植而以開拓收穫成果的漢族系移民社會進行交易以謀得利潤？列強在南北的港口開設商館的例子，持續不斷。然而，企圖把台灣全面加以殖民地化的行動，卻久久不見出現。

打破這沈寂的，正是新興資本主義國——日本。首先，就出兵台灣加以敘述。

出兵台灣

出兵台灣也稱爲牡丹社事件，或牡丹社「討伐」事件。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清同治十年）十一月，琉球·宮古島官民六十九人爲了納租而到那霸，可是歸途

遇到颱風，漂流到南台灣的八瑤灣，牡丹社附近。登陸時三人淹死，五十四人歷經迂迴曲折，而被牡丹社的「蕃人」殺害，只有十二人爲附近的漢族系有力人士所救。他們被送到福州

的琉球館，於第二年六月七日，從福州回到那霸。

單純的遇難事件，引發了近代日本首次的海外出兵，是由於以下的情況。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明治維新政府斷然實施廢藩置縣，接著在九月十三日，與清室簽訂日清修好條規。第二年十月，半受強制而入江戶朝廷的琉球賀使晉見明治天皇。明治維新政府強迫冊封琉球國王為日本之藩王。維新政府又隨即通告各外國：今後琉球藩與各國間的一切交際事務，均屬於日本外務省管轄。它用這種方法，巧妙地演出：把向來一直保持同屬於日本、清朝形式的琉球王國，移歸日本的單一支配下的過渡程序。

宮古島官民的遇難事件，正給明治政府挑撥對清外交問題的好機會。恰逢薩摩、長州等舊四藩聯合政權，正圍繞著「征韓論」與實施徵兵令，開始鬧分裂。在征韓論上失利的西鄉隆盛與牢騷滿腹的薩摩士族軍團結合，隨時可能生變的緊迫情勢錯綜複雜。隆盛的弟弟從道和外務卿副島種臣預見這項危險，因而趕快斷然決定出兵台灣，藉機把薩摩士族軍團自西鄉隆盛拉開，暫緩惹事。出兵前夕，副島為了交換日清修好條規批准書而入清。

明治政府以「保護人民的義務」為冠冕堂皇的理由，於一八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出兵台灣，二十二日登陸台灣南部。企圖用這種方式逼迫清朝，以便一口氣完成對琉球的吞併。台灣

蕃地事務都督西鄉從道極力避免遭遇清朝駐台軍隊和漢族系住民，巧妙地進兵。一面利用出兵，一面對清交涉的結果，於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締結北京條約。日本不僅從清朝拿到龐大的賠償金，而且使其承認琉球歸屬日本，就是在國際關係上，也讓清朝事後承認「琉球處分」是以「合法」方式實施。

明治政府把剛剛起步的日本軍事上的聲名與國家威信，以東亞為舞台而留下國際性印象的歷史意義是深遠的。反之，對清朝與台灣來說，遇難事件被用為藉口，台灣則被當作近代日本對外的軍事與外交行動的演習場。清朝因此受到日本的輕視，終於引起日後以甲午戰爭為嚆矢之一系列的侵略。

在出兵台灣期間，日本從事有關台灣的軍情、民情雙方的細密調查。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兵前夕，首先就有關軍事方面進行勘查的領隊樺山資紀，與同時調查民情的水野遵，日後分別就任第一任台灣總督與第一任民政局長。台灣總督府這樣巧妙的人事安排，又豈是偶然的巧合！

此外，稍後在劉銘傳新政末期的一八九〇年，駐福州的代理副領事上野專一，奉外務大臣（部長）青木周藏的命令，以「商情視察」名義，試行台灣實地勘查。時在一八九〇年十二

月二十日到九一年二月十四日間。值得注意的是賦與上野的指令內容。有「假如他日有溫帶地方的人民（指的係日本人）佔據或遷居該島的情事，他們的生活方法將如何，民心的向背亦將如何等各點，也應請深加考察，然後詳報」的說法，其對台灣的領土野心，躍然紙上。

甲午戰爭

距牡丹社事件二十年後，爲了爭奪統治朝鮮的霸權，從一八九四年八月到九五年三月，發生了甲午戰爭。同年四月，由於馬關條約的簽訂，戰爭結束。新興資本主義國日本，爲了要與列強並立，成爲帝國主義國家起見，無論如何，都必須領有殖民地。日本當時還沒有足以併吞全朝鮮半島的力量。靠馬關條約，把遼東半島南部當作北進的據點；再以台灣、澎湖各島的「割讓」，取得南進的據點。雙向齊下，用盡全力的日本，難以掩飾新興國家的左支右絀，因而在俄國發動的三國干涉下，未能實現奪取遼東部分的願望。

在馬關的和談中，清朝全權大臣李鴻章舉出很多理由，努力促使日方放棄台灣之佔據。例如，台灣不但有「生蕃」，而且漢族系各部族也強暴精悍，法國在中法戰爭攻擊在清軍，但無法擊敗他們。又台灣不但外海波濤洶湧，而且瘧疾之類的水土病也多，台灣人民爲了驅除毒氣而大半吸食鴉片，因此弊害甚大。李鴻章這樣嘗試討價還價，企圖逼退日方野心，

然而，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非但不聽信李的說詞，反而回答他，日方明白這一切，割讓後日方會負責克服這一切，而終於成功地吧台灣割讓條款加入和約中。

此外，日本也有強烈希望領有台灣的明確經濟理由。當時大藏省的高官且為金融、經濟論壇上的泰斗添田壽一，在〈日清戰爭的經濟觀察〉一文中，立「台灣及澎湖列島的略取」的專項，說明台灣樟腦、砂糖、米、甘薯、茶、菸草、煤、硫磺等資源豐富，而且台灣是向東洋沿海及南洋各島擴張貿易，延長航路的重要跳板，日本人應當實行殖民。以在和談成立後不久的時機所寫的評論來說，不能不推崇為特出的力作。

2 日軍進駐台灣與抗日的複雜相貌

台灣民主國

傳聞清室承認台灣的割讓後，台灣官民大為憤怒。一八九五年五月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後，打出反對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行動。

台灣民主國的構想，由陳季同提供。陳出身於巴黎大學，擔任駐法公使館參事，也是受過法國文豪羅曼羅蘭推崇的人物。他的駐歐經歷受到賞識，因而跟隨劉銘傳渡海來台。起初

以推行洋務運動的幕僚活躍，後來升任副將（相當於旅長）。陳季同模仿法國共和制，或許意圖藉此喚起列強——尤其是把越南殖民地化的法國——的同情與干涉，逼迫日本放棄佔據台灣。

巡撫唐景崧被推舉為總統，為了防備日軍的侵略，於甲午戰爭爆發後，立刻從廣東緊急派來台灣的黑旗軍勇將劉永福、客家系台籍進士丘逢甲、陳季同本人，以及台灣第一大地主林本源家當時的大家長林維源，分別被推舉為大將軍、副總統兼團練使（當地募集義勇軍的民兵司令官）、外務部長、議會議長。唐勉強就任，林堅辭不就。

奉派交割台灣的全權委員李經方（李鴻章的義子）對台灣官民悲憤的強烈感到威脅，不敢登陸。他匆匆在基隆港外海的軍艦上，完成與樺山總督的移交程序，就撤走了。時在一八九五年六月二日。

從民主國建元「永清」這一點來看，台灣民主國並沒有追求原本意義上的獨立自主，已很明顯。何況唐還派遣特使到北京去，說明他鑑於民情激昂，不得已才就任總統。並且宣誓「恭奉正朔，遙為屏藩」。

負有佔領台灣任務的近衛師團，在戰略上似乎完全不把台灣民主國的存在放在眼裏。然

而在戰術上，卻慎重地避免對基隆實施正面攻擊與登陸作戰。到了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襲擊基隆的背後，試圖從小漁港澳底登陸。六月一日，佔領基隆。

脫逃的人士

事實越來越明，割台的決定不易改變，列強的干涉和支援也都無法期待了。正在這個關頭，基隆失守，民心的動搖只有更加激烈。唐景崧在四日夜晚，偷偷逃到淡水，藏在德國船上，脫身到廈門去了。

台北城內，大為混亂。將士們落得四出徬徨，蠻幹橫行，以謀求抵抗或逃亡的資金。以靠對外貿易發跡的買辦式豪商為首的上層階級，非但不抗日，反倒爲了維護自己的權益和安全，變得寧願歡迎日軍不流血入城。他們派遣冒險漢子辜顯榮到基隆，叫他引導日軍入城（六月七日）。辜由於這番功勞，日後被任命爲台北保良局長，享受許多特權，遂成爲台灣首屈一指的政商。到了一九三四年，經「勅選」（天皇親任）爲台灣人的第一個貴族院議員（終身職）不過，他在受到日本當局寵愛的反面，畢生被台灣民衆罵爲「辜狗」、「漢奸」等等。

對駐台官吏、將士相繼逃亡到對岸去，我們可以作相當程度的了解。在處境上，他們不能違背清朝的命令，在台繼續抗日。再說，他們本來只是以三年輪調方式，從大陸奉派來台的所謂外來官員而已。我們應當認爲：他們對台灣原沒有愛惜之心，更沒有挺身保衛台灣的

情理。

不可或忘的是：在已經生根台灣的漢族系移民當中，一部分有力人士也爭先恐後地往對岸或香港去避難。日本當局所通緝的丘逢甲，也帶著族人加入流亡的行列。富豪多半把本宅和事業據點，分別設在大陸原籍和台灣，因此既容易逃走，也容易避難。

劉永福也不例外。他據守台南城到十月中旬為止，靠台灣民主國的郵票、向逃亡對岸的難民徵收人頭稅等方式，收集軍費，孤軍奮鬥。這樣一來，台灣民主國連兩個星期也無法維持，就崩潰了。

大清國的「帝政意識型態」難道仍舊高高在上，泰山壓頂，拴住人民嗎？劉永福最多只肯以大清國特命台灣防衛副司令的官位，盡軍人的義務。民衆渴望他繼唐而就任新總統，於入山後指揮游擊戰，但他一概拒絕。十月十九日，劉終於抵不住日軍的圍攻，從安平城搭英國船，脫逃到廈門去。十一月三日，日本當局證實劉的逃出，而宣告全島業已「平定」。

留下來的人們

在台灣留下來的人當中，有一群像上述的辜某一樣，希求引導日軍，靠新的秩序建立社會安寧的人。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協助台南的不流血入城的長老教會牧師——英國人巴克禮。他由於這項功勞，日後獲授日本勳五等雙光旭日勳章。

另外，對高雄一帶的鎮壓助一臂之力的，是台灣屈指可數的糖商「順和棧」的掌櫃陳中和。陳就趁這機會，變成南台灣的大政商，後來擔任新興製糖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初期對日合作者多半是在台外僑或與外國關係較深的漢族系人士，不然就是買辦商人的夥。此外，避難的富翁留下看守人，用心周詳地摸索因應方策，是不問可知的。

在一小撮合作者之外的另一個極端，還有仍舊充滿著開拓精神的，主要是住在農村地區的漢族系移民集團。又，山間地區或台灣內的邊界地，則有爲了維護原本意義上的自己的鄉土與生活方式，而受闖入者的逼迫，以致不得不奮起的先住系居民。他們除了舊敵漢族系移民之外，不得不再迎擊新侵略者——日本人。以台灣爲舞台的新侵略與反侵略，對立與抗爭的構圖，於是進一步錯綜且複雜化。

3 後藤新平的台灣統治政策

農民的抵抗

抗日游擊隊打得最堅強的，是在西部平原和中央山脈之間的狹長山麓地帶。背後有山屏障，因此容易抵抗，並不是唯一的理由。此無他，只因爲這個地

帶的開拓比較晚，「小租戶」和「現耕佃戶」的連帶關係最堅強。

台灣的土地制度，由於台灣開拓史的特殊性格，而逐漸地形成一田兩主制。移民中的先行者或有力人士，向當局取得開墾權而成爲墾首。墾首就招募從事開墾者，也就是墾戶，實施開墾。墾戶向墾首繳納叫做大租的佃租，因此墾首也叫做大租戶。

墾戶有時再把開墾過的土地，租給耕作農民（現耕佃戶）耕種，而徵收佃租。上述佃租叫做小租，而墾戶也叫做小租戶。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地的實權轉到小租戶，而大租戶幾乎變成只掛空名的存在。

來自對岸的一般移民，一方面把中原中國文化的榮耀和重擔，另一方面把在大陸的挫折和貧窮，一併帶進台灣來。移民們受長年來希求擁有自己的土地的欲望所驅使，靠只有形式的「協定」，用物品的「交換」或騙取及戰鬥，向先住各民族奪取土地。他們爲了尋求新的土地，進入人跡罕至的原始林，有時遭遇「出草」（獵首）而倒下，或因惡劣的天候、水土病、飢餓而死亡。

在這樣千辛萬苦才到手的土地上，日軍居然無禮地踩進來了。就是在台灣民主國崩潰以後，小租戶、現耕佃戶以及開拓農民也結成無形的抗日戰線，在各地奮起。開拓精神與質樸

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化成抗日游擊隊的能源，掀起了激烈的抵抗運動。

台灣出售論

在日本的帝國議會（國會），衆口紛紜，討論以一億圓把台灣賣給法國的台灣出售論。另外，國際輿論中，也有嘲笑未成熟的日本，有何能力來承擔殖民地統治的一些評論。很能表達這中間的實情與困境的資料，是當時率領日本征台軍第二師團，以南部台灣守備隊司令官地位從事遠征的乃木希典寄給朋友的私函（一八九六年一月三十日發）。他在函中寫道：「台灣施政也真是一大堆令人厭煩的事，難怪人民要謀反。就像叫花子討到馬匹一般，既養不起，又不會騎。這樣下去，只有被咬被踢，受氣不說，結果還要成爲世間的笑柄，實在慚愧。今後雜亂的情形還會更多。」叫花子的譬喻，非乃木般之儒將畢竟道不出，豈能不說是絕妙的自我解嘲。

打贏了甲午戰爭的日本，積極干預東亞地區帝國主義國際秩序的舞台，意圖成爲東亞的盟主。台灣的出售自不必說，連從台灣撤退也不是大勢所允許的。對日本帝國而言，不等待資本主義經濟的成熟，而強行轉化爲帝國主義，是必須的課題。因此，對第一個殖民地——台灣——的確保與安定性的殖民主義式經營，就成爲最高命題之一。

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本陸軍首屈一指的才俊，且深受當時藩閥政府倚信的兒玉源太郎中將就任第四任台灣總督，後藤新

平就任其幫手——民政局長（後來改爲長官制）。從此以後，就在當局的全面委任之下，直到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轉任「南滿州鐵道」總裁爲止，大顯其「精明」強幹近十年，實施鎮撫並用的政策。

後藤在到任前，約有三年期間，擔任明治政府內務省衛生局長和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以鴉片政策的制定爲中心，一直插手台灣經營。雖然說有了這項體驗的累積，但他的洞察力和政治手腕，的確不凡。他假借尊重舊風俗習慣的名義，首先從截斷台灣抗日勢力下手。他以改變鴉片的嚴禁政策爲漸禁政策，除卻資產階級鴉片吸食者對斷絕鴉片的不安。後藤這麼做，也是因爲覺察到「日本人嚴禁鴉片」成爲抗日口號的一部分，驅使中上級地主階層參與抗日。

另一方面，兒玉總督又舉辦號稱「饗老典」的敬老儀式，邀請在台民社會上受到尊敬的老人，加以慰勞。此外，舉行以對讀書人表示尊敬並聯絡感情爲宗旨的「揚文會」，共吟漢詩。最巧妙的是紳章制度的政治運用。把地主、富農、商人階層的有力台籍人士，捧爲士紳

，說要讚揚他們的榮譽，而讓他們佩帶紳章——限定用於台灣的勳章。對維持治安的合作人士，則毫不吝惜地給予鹽、菸草（專賣制）的銷售特權等經濟上的權益，以推行懷柔政策。

兒玉在另一方面，公佈「匪徒刑罰令」（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三日），把反日的台民一律當土匪看待，加以嚴罰。後藤的女婿鶴見祐輔所編的《後藤新平》記載：從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到三十四年（一九〇二）之間，拿獲的土匪數目有八千零三十人，殺戮的有三千四百七十三人；又在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的大討伐中俘獲而經審判處以死刑的有五百三十九人，交付「臨機處分」而加以殺戮的多達四千零四十三人。所謂「臨機處分」，是把順應招降政策而報到的游擊隊人員，假借歸順典禮的名義，集中在一個場所，然後用一齊開槍的方式屠殺的，與「武士道」完全相背的作風，這不是可怕的鐵腕統治又是什麼呢？

4 殖民地型開發與台灣居民的抵抗

土地調查事業

當治安獲得確保之時，後藤以自己所標榜的生物學式殖民地統治策略和科學性調查研究，雙管齊下，正式開始作接枝式的政策推行。立即成爲「台

本」的，是前面提過的劉銘傳的新政；新枝呢，不用說，是日本資本主義所要體現的合理主義。媒介的角色，則由新興日本的帝國主義擔當。

後藤行使強大的權力，完成劉銘傳因遇挫而未竟的土地調查事業（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一九〇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徹底執行的過程中，「隱田」（不曾登上官冊之田地）被登記了，可課稅的耕地面積增加一倍了，對財政大有幫助。而且，又能夠一併整頓土地的資本主義式交易的條件，因此，成爲日後殖民地型經濟開發的基礎事業而發揮功效。值得特別記述的是：土地所有權由於對大租戶採取解消式的整理，而單一化爲小租戶。它在經濟上的意義是深遠的。

日本起初以爲可以採用與歐美殖民地統治相同的形式，任性肆意地實行土地的全面性奪取，但那是完完全全的誤解。說起來，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程度已相當高，具有夠資格引進洋務運動的社會經濟基礎，尤其地主階層有一部分頗爲富裕。另外，日本與台灣，在人種上同屬於黃種人，在文化層面上都屬於漢字文化圈，共有儒家倫理，有上述這些共同點。因此，姑且不論妥當與否，漢族系讀書人階層或多或少對日本人抱有先進身分的自負和優越感。這對日本的台灣統治來說，實在是極爲不利的條件。前述的「饗老典」之類，正可看成日本當局應付這個層面的懷柔政策，來加以理解。

土地制度的近代化與寄生地主制在殖民地體制下的重編、強化，以結果來說，是擔當了從社會經濟層面支持懷柔政策的功能。起初，地主階層害怕自己的土地會被沒收，而奮起抗日。日本當局也許由於抗日游擊戰爭的激烈與戰線的寬廣而驚惶失措，也許認為不易消滅地主階層，於是在符合殖民地經營的邏輯的範圍內，准許地主階層保有私有土地，用法律保證他們的權益，把地主編入殖民地體制內，從事度量衡制度和貨幣的統一等整頓投資安全與經濟循環的擴大所倚靠的基礎事業。另則強有力地推進鐵路、公路、港灣等的創設和擴充。這些財源的一部分，是透過鴉片、鹽、酒、菸草的專賣制度來籌措的。

殖民地體制的「共犯結構」

繼土地調查事業之後，林野調查事業（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開始進行。忽視漢蕃邊境地區與先住

民所居住的廣大山林地帶既往的舊風俗習慣，強迫推行國有化（歸為日本國家所有）政策。這個政策引起了先住系各民族與漢族系居民的武力抵抗。針對隨著製糖業的振興而進行的土地強制收購，原料甘蔗的不當價格承購制度，支援三井三菱等大企業的侵蝕而辦理的土地放領，激烈的農民運動展開了。所謂以資本的原始性累積為中心的動與反動的構圖，醞釀起來。

殖民地經營以對宗主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效勞為大前提。日本當局歡迎台灣人取得股份，

也就是提供資本，但禁止台灣人獨自創設與經營公司。此外，用心於提高下級勞工與農民的品质，也試圖推廣普通（小學）教育。然而，對於威脅日本人優越地位的大學教授、高級技術人員、熟練工的培養，則刻意加以限制；至於開業醫師和律師，又爲了當作殖民地經營的潤滑劑而讓他們發揮功能起見，一面斟酌「適當的人數」，一面培養。

上述在「鎮撫並用」之下推展的殖民地型經濟開發的基礎，大致在後藤新平任內穩固確立。並且，它把台灣人這一方的中上階層編進可稱爲殖民地體制的「共犯結構」。日本政府在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中，主張台灣人和日本人同樣是天皇陛下的赤子，力求設法把台灣人塑造成大日本帝國臣民。可是無論古今東西，殖民地支配畢竟是要以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一定的差別爲前提來實施的。所以所謂日台一視同仁，是虛有其名而無其實的。

羅福星事件

當初期的抗日游擊隊受到鎮壓，殖民地開發剛剛上了軌道的時候，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大陸發動了。儘管受了中國本土的革命的刺激，而出現了新型的抗日運動，但每次都受到近於大屠殺的大鎮壓，終歸失敗。其中著名的，有羅福星事件（一九一三年十月）、西來庵事件（一九一五年八月）等。

羅福星事件，又稱苗栗事件。這個事件的核心人物羅福星，是原籍廣東省嘉應州（現在的

梅縣)的客家人。一九〇三年，在台灣「割讓」後，被一度還鄉的祖父再度帶來台灣，讀苗栗的公學校(專收台灣人的小學校)，接受日本教育。一九〇六年，厭惡日本統治的一家，再度返回大陸的故鄉。

羅福星後來在故鄉擔任小學教員時，由於同鄉的前抗日領袖丘逢甲的介紹，遠渡南洋，擔任客家系華僑學校教師。眾所周知，當年，孫文他們的革命運動，在南洋華僑社會盛行。據點多半佈置在華僑學校。羅受到丘與孫文的同志們的影響，而加入孫文所組織的中國革命同盟會。

羅福星於辛亥革命的第三年，和十二名同志商定，密渡台灣，計畫把革命適用到台灣來。然而在蜂起前夕，事機不密，一齊遭受逮捕，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在台北監獄留下兩首詩，登上斷頭台，年僅二十九。因為羅是繼承中國近代革命的壯士，所以日本當局加強警戒他的影響力的擴大，但有志氣的台灣人卻在暗地裏歌頌他壯烈的犧牲。

西來庵事件

辛亥革命的影響延續下去，在以余清芳為首的西來庵事件中，再度呈現。余是屏東人，一八七九年生。從他歷經店員、巡查補、公所書記等行業，就可看得出來，是極為活躍的人物。他可能充滿反叛精神，一九〇九年被憲警送進台東的「浮浪

者收容所」，被羈押到一九一一年。當時的日本當局把反日的人當做土匪，把提出異議的人當做浮浪者，分別加以處分。也許因為余當過巡查補，又是地方上的名士，不能夠輕易地適用匪徒刑罰令把他處死吧。

余在恢復自由後，慎重地使用他人名義，經營碾米廠，籌措軍費。另一方面，隱身於「食菜堂」（素食者所信仰的廟），透過信徒，組織同志。他的主要根據地是台南市內的西來庵。他的心腹，有羅俊與江定。羅是嘉義出生，當過私塾教師和中醫的讀書人，也是往來於台灣海峽的素食者。因而通達內外時務，充任余的參謀。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從大陸到淡水下船，同余會合。

密切監視的憲警，逮捕了航渡廈門的蘇東海——余的同志，解讀密函，知道余集團的密謀。余獲知計畫洩露，就投靠初期抗日游擊戰爭失敗後，巧妙地潛伏在山中的江定的居處，搶先發動攻擊。在礁吧岬（今玉井）一帶展開激烈的游擊戰，日方當局由於靠台南守備隊的正規軍與警察隊的聯合作戰，施加集體屠殺式的大鎮壓，飽受國內外的抨擊。當時的總務長官下村海南在回憶錄中留下費盡苦心，多方辯白的記載。

事件的被告將近二千名，固然驚人，但其中被宣告死刑的人竟達九百零三名，約佔半數

，更成爲世界審判史上空前的殘酷記錄。由於這個事件，日本當局野蠻鐵腕的一面趨於明顯化，把台民陷進恐怖的深淵中。結果，抗日運動只好逐漸轉向社會文化運動了。經過許多曲折後，一九二二年十月，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設立。該會是台灣人受蘇俄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美國總統威爾遜第一次大戰後所提倡的民族自決論（一九一八）、朝鮮的反日三·一獨立運動（一九一九年三—五月）、中國大陸在北京發起的愛國民族運動——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等的影響，而創立的反日團體。起初，不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右派或左派等，大同團結，擁有兩千個會員而開始活動。可是隨著時局的變遷而一再分裂。無論如何，一方面近代民族意識在台民之間漸漸高漲，他方面反日青年階層的左傾化與急進化也加深。對此感受恐懼的以中上地主階層爲中心的一部分台灣資產階級，或許只能算是從犯，但越發有意或無意地深陷在殖民地體制的共犯結構裏，並被套牢。

台灣統治的變遷

日本當局受到第一次大戰和蘇俄十月革命的影響，由以前的武官總督實施軍事統治，改爲文官總督實施文治統治。它以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到職（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始，第十六任總督中川健藏離職（一九三六年九月）結束。然後，爲了因應「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海事變（一二八淞滬抗日之役，一九三二年一月）

以次連續不斷的日本的大陸侵略，文官總督制再度被復舊為武官總督制。第十七任總督小林躋造（一九三六年九月—四〇年十一月在職）和第十八任長谷川清（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四年十二月）都是海軍上將，而擔任最後一個台灣總督的第十九任安藤利吉，則為陸軍中將，後昇任為上將。

還要補述一下，當漢族系移民社會上的殖民地秩序大致就緒時，第五任總督佐久間佐馬太（一九〇六年四月—一五年五月）以兒玉的繼任人地位到職。他動用總額高達二千萬圓以上的龐大預算，實施「五年討蕃事業計畫」。這是從明治四十三（一九一〇）年度到大正三（一九一四）年度之間的事。

這麼一來，日本資本主義也開始侵蝕到佔台灣面積六〇%的山地。當時的先住系各民族，仍舊以狩獵和火耕農業為主要的生產方式。由於林野調查事業，已經實施把沒有地契的土地收歸國有的所謂無地主土地國有化政策。以它為背景，倚仗佐久間的武力集中行使，而對少數民族居住地區所採取的強行侵略，引起了先住民的激烈抵抗。然後，一再累積的怨恨，不久就爆發為霧社蜂起事件。此時正逢世界經濟恐慌高峰期，九·一八事變前夕，一九三〇年秋天。

霧社事件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八點光景，在台中州霧社公學校（今屬於南投縣管轄），正要舉行秋季聯合運動會開幕典禮。會場上，霧社一帶有關的日本人，

爲了共享一年一度難得的「拜拜」式聚會，不分男女老幼，幾乎全都到齊了。

泰雅族的隊伍襲擊過來，意圖殺光集結在會場上的日本人，包括以郡守爲首的來賓，參加運動會的學童、觀衆在內的日本男女、孩童等一百餘名被供上怨恨之祭壇。受到事件的牽累而死的漢族系人，包括因穿著和服而被誤殺的兒童與誤中流彈而死的成人，只有兩人而已。

這次蜂起的民族性格與問題意識相當鮮明，而且基於極爲周到的準備和計畫，因此嚇住了以日本憲警爲首的日本全部有關人士。蜂起從當天黎明前開始。把四周的警察駐在所，以霧社爲準，按由遠而近的順序襲擊，首先切斷電話線，把日本人的警察當作第一個犧牲品而擁進。蜂起方一面如上行動，一面在安排大舉同時衝入運動會會場。

日本當局大爲吃驚，打從心底發怒。因爲他們以前一直把霧社當作「理蕃事業」最成功的示範地區，向國內外大力宣傳。事實上，當局在霧社試過很大的努力。首謀莫那·魯道早就應邀到日本考察，期能誇示日本的國力，另外，也選拔優秀的「蕃童」與日本人同校共學

，意圖塑造「模範生」，當作「花瓶」顯示於內外。

典型的例子是以現職巡查與警手（警察的助手）而參加蜂起，事件後一同自殺的「花岡一郎」（達吉士·諾賓，台中師範學校畢業）與「花岡二郎」（達吉士·那武義）。他們並沒有血緣關係，日本當局卻給他們彷彿是兄弟一般的日本名，並且主動撮合他們與同樣是日本人小學校畢業的「川野花子」（歐賓·那武義）和「高山初子」（歐賓·達道）的婚事，以官費訂製和服，讓他們舉行日式婚禮，大加表揚。

正因為日本當局對霧社的用心太切，對「背叛」的報復也就更為殘酷。可能也擔心前一年世界大恐慌所引起的普遍性社會不安，加上一味高漲的社會運動與朝鮮、台灣的反殖民地運動吧，不僅是正規軍，連空軍部隊都出動，把近代兵器——機槍、大砲、毒氣等，順便當作實驗般地加以使用，費了將近兩個月，方能鎮壓下來。

憲警方的報復，偏執地延續下去。挑唆跟日方合作的集團——「友蕃」，對集中收容一處的蜂起方倖存者——「保護蕃」，實施夜襲，把十五歲以上的男人，幾乎全都殺死。時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黎明前。這被稱為第二次霧社事件。

中日戰爭與台灣

以霧社事件為轉捩點，理蕃政策重新受到檢討，侮蔑性的稱呼——「生蕃」，台灣總督府把它改為「高砂族」，「熟蕃」則改為「平埔族」。

隨著武官總督制的恢復，正式的皇民化運動開始推行。從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起，台民母語的使用受到限制，報紙的漢文欄也廢止了。粗暴的是，連民衆的娛樂——傳統的戲劇、音樂、武術，也禁止上演和傳授。尤有進者，連台民靈魂的領域，警察權力也踩入了，對傳統的宗教儀式以及祭祀年中行事，也加以限制和禁止。取而代之的是日語的強制使用，「天照大神」（神話中的日本開國母神）的奉祀與取日式姓名的改姓名運動（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一直強制推行到戰敗的前夕。無論任何一項，都不外是爲了因應原原本本的侵略戰爭，希望把台民改造成日本皇民的既傲慢且任性利己的行徑。

以改姓名成日本式爲條件，當局就戰爭期間的物資配給和子弟的升學，惠予少許的特別照顧，當作「鮎」餌，但在基本上，受歧視的「二等日本人」——本島人（台灣人）——的地位，無論在法律上、社會上都沒有本質性的改變。反而遭到不爲所動的台民的白眼。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先住民系的青年們，一變而被當作日本人的同胞一樣看待，被迫接受動員，以「高砂義勇隊」名義參加南方（南洋）作戰，再度犧牲。一九七四年底，在印尼的

摩洛泰島被發現，七五年一月八日，隔了三十二年才回到故鄉台灣的原「皇軍」士兵「中村輝夫」（阿美族的本名為史尼恩，中國名為李光輝）的悲劇，對我們而言，記憶猶新。

由九·一八事變打起的中日十五年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使台籍人士被囚困的共犯結構，變得更加複雜。成爲新而有力的媒介的，不用說，是侵略戰爭本身。不堪忍受在台灣所受的歧視跑往大陸的，打從開頭就意圖雄飛大陸的，還有由於日本當局的徵用而被迫從軍的人等等，真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從當過「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該國駐日大使的謝介石算起，在號稱冀東政權、汪精衛政權、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這些傀儡的幹部中，以通達日語的「二等日本人」身分合作的台灣出身的知識分子，爲數不少。憑自己的意志，做日本的爪牙，是本於自己負責所作的個別性選擇，因此，他們的動機是較容易理解的。

不過，最常見的例子卻是像吳濁流所描寫的《亞細亞的孤兒》主角那樣，小心翼翼的台籍人士。他們往往被大陸的中國人輕視，懷疑可能是日本人的奸細。並且，有時日本人又從另一種意義上把他們看成中國那一方的間諜，侮蔑爲「不逞之徒的支那人」的同夥。正是被逼到兩面不討好的悲慘狀態下的「亞細亞的孤兒」。

在戰爭末期，以軍人或軍屬身分受到動員的台籍青少年們，由於接受戰時體制下的軍國主義教育，中國人意識已逐漸被磨滅，在無意識中被培養成日本的積極爪牙。甚至於有人因日本戰敗而以戰犯身分被捕，經聯合國這一方判處死刑。

覺醒而抱中國人意識，投身於大陸的抗日運動的民族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也粗分為重慶（國民黨）、延安（共產黨）兩大集團，前者則佔多數。他們希求殖民地台灣的解放，而各自採取行動。當台灣重歸祖國以後，有人向國府靠攏而「成功」，也有不少人不幸在政治整肅下喪身。

第四章 光復的明與暗，

二二八事件的悲劇

1 光復與社會的百態

光復的喜悅與不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氣熱得叫人發昏。憑前一天的廣播預告，知道中午有天皇陛下的重大廣播的人們，貼近了收音機。雜音干擾，聲音又低，因此，「玉音」很難聽懂。不過，戰爭結束之語意，倒清楚地體會了。知道日本要接受波茨坦宣言。本島人在心中深處細細玩味這份喜悅。相反的，日本人卻過著不安而無法闔眼的日子。

任何社會，任何時代，總有血氣方剛而愛出鋒頭的青年們。抱著輕鬆的心情，不知從何處尋覓來的中華民國的國旗、中國國民黨的黨旗、孫文的遺像和三民主義的教本之類出現了

。會讀樂譜的人，一聽到「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日戰爭的軍歌就唱，還到處教唱。尤其是雄壯的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把因光復而歡欣的年輕人，鼓動得熱血沸騰。他們邁著大步，簡直在誇耀：「我自由的時代，就要來到了。」

縱然知道情勢已變，幾乎所有的一般百姓還是不肯改掉旁觀、注視的姿勢。為生存而忙，為三餐而緊張。此外，這也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一直遵奉「莫談國事」，也就是不過問政治對自己比較有利的生活方式或哲學所致。更何況無依無靠的百姓們，可能也不會輕易忘記日本統治初期血流成河的鎮壓，嗣後日本憲警繼續逞暴行虐的種種。

街頭的一部分小商人，尋找「剝狗皮」（用客家話讀）的機會。台灣的平民們厭惡日本人的支配，一有事，就暗地裏把「狗」或「四脚仔」（用閩南話讀）的賤稱，向日本人轟過去。「狗」就是犬，是看見日本人隨地撒尿，或脫光衣褲，只圍一條兜襠布在邁大步的模樣而取名的；又，「四脚仔」指四隻腳的動物，是表示野蠻的字眼。發洩積壓的憤恨，是弱者長年的習慣。日本人開始賣出大小家具雜物，人們把收購出售品的生意叫做「剝狗皮」，就是剝掉犬皮。人們添上理由——向日本人取回被掠奪的財產，來辯護這種行為。

前面已經提過，日本當局不准台民創設和經營台籍人士獨自的公司。結果，幾乎全部的

台民薪水階級屈居日本機關和日本人公司的下級職位。可以說被阻擋在經常被迫忍耐、把接受歧視看作當然的身分上。因此，他們高興日本人的敗退，期待自己能藉機升級去替補日本人的遺缺，是正常而自然的趨勢。

政治領導權的欠缺

台灣和朝鮮不同，中小地主的階層相當寬厚。在這些台灣本土地主階級中，有一部分與日本人牽連不淺的人，尋求日本不動產和動產的移轉登記而蠢動。有的用口頭約定，等局勢平穩下來後，再結算匯款；有的自家藏書突然增加，搬進鋼琴坐鎮客廳的宅院，而擺起臭架子等等，呈現不少奇景。

最慘的是替皇民化運動做走狗的「士紳」、經濟警察，和居於特高警察的屬吏地位而狐假虎威的台民。逃得太晚而飽嘗報復的鐵拳，被打得半死的也不少。比日本人更高唱忠君愛國，呼喊「天皇陛下萬歲」或「大日本帝國萬歲」，痛罵蔣介石的本島的公學校（日據時代，台民小學之稱呼）教員也驚慌失措了。他們多半就像風向測定器一般，每天大忙特忙地專心學習北京官話。

形勢一變，中國成爲四大強國之一。四千年的歷史是燦爛的。偉大的母河——黃河，是世界性的大河，它的流域是古代四大文明之一的發祥地云云，轉變方向頗快。小學高年級的

孩子，疑惑地仰看教師們的臉，對他們的缺乏定見，投注輕蔑的眼光。不過，傳統式儒家倫理仍然殘留的台籍漢人社會，對教師寬容。教師的輕率言行和過失，受到了原諒。

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中心，曾經參與過抗日運動的人們，則採稍微不同的姿勢。包括從中間偏右到左派，還有少數共產主義者的這個集團，暫時以民族主義為共同的主調，隱藏各自的盤算而活動。帶妥協色彩順應日本支配的中間偏右派，儘管抱著些微內疚的心情，還是比任何人都拉高聲音，歡迎重歸祖國。他們也許有必要格外展示自我存在的證明吧。

跟他們比較起來，體驗過牢獄的左派和原共產黨人士懷有道德上的自尊心與活力，而居於優勢。然而，他們的人數和力量，卻小得可憐。

順便說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的正式名稱，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大概是由於台灣處於日本的殖民地支配下的情勢而定出的通俗名稱吧。黨員除了以台灣為共同的活動範圍之外，斟酌留學日本或留學中國大陸等背景的不同，發生把活動舞台限定在日本或大陸的不同的個別案例。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三一年間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彈壓以後，倖免被捕的人，除了潛伏地下或在大陸打開生路之外，沒有選擇的餘地。據說，在日共中央受當局彈壓而癱瘓後，按當時的情勢，台共人士改為接受中共的直接領

導而從事活動。

遺憾的是，貫穿全部殖民地時代，獨立自主，而且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日本在台殖民地體制，並加以批判的台籍精英人士甚少。從而，在台灣實踐從殖民地體制解放與變革的革命家也就更少了。少數中的少數「勇士」大膽地向日本的鎮壓挑戰。他們不是受到極殘酷的鎮壓而死在牢獄中，就是在遇挫後逃出台灣，把戰場移到以大陸為首的島外。變節者以及戰後獲得釋放的人，還有潛伏避難而在島內倖存的人，估計最多不到五十名。

當時的狀況是：無論在島內任何地方，都沒有掌握政治領導權的勢力存在，足以填補殖民地權力瓦解和崩潰後的空檔。既沒有在島內組織統治機構——軍部與官僚——的領袖，也欠缺支持它的人力資源。夠資格稱為財閥的，當然也沒有。

儘管有僅少的大地主和層面相當寬厚的中小地主階層，卻沒有具備整合他們力量的政治家。中間偏右派及保守的民族主義派士紳，先是對日本當局進行不徹底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九二一年二月—三四年九月），後則與左派激進派民族主義者劃清界線，集結於具有濃厚的翼贊日本當局治台性團體色彩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組成），而力圖在殖民地體制內妥協，以謀保身。這一群士紳，大家都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多半並沒有超出地方

性政客的境界。日本以寄生性地主的保留與重編為主調的「殖民地型經濟開發」，收到相當程度的成功。結果分享「殖民地利潤」殘羹的台灣地主階層，無論是否覺察，都被殖民地體制的「共犯結構」緊緊地收編過去。縱然有正犯與從犯的差別，被略誘，或自行接受引誘的儼然史實，是不變的。抵抗的自主性或民族的自主性顯著地受到損傷，因此，在光復隨後，他們實在沒有足夠的條件，來擔當塑造歷史的社會力的主體。事實上他們並未以真的主體自勉而奮起的意識和意願。大多數自以為精英的台籍人士，甚少對這一次大戰的結束作過具有自主性、原理性、思想性層次的思考而對其定性。究竟對台民來說，大戰的結束係單純的「終戰」呢，抑或「勝利」？但叫有志之士啼笑皆非的卻是：有人暗裏跟著日本人認其為「敗戰」而一起涕泣。

於是，大多數人就把戰爭的結束，原封不動地直接看成「光復」了。然後，一心一意等待祖國接收人員的來臨。頂多考慮到：①與日本的殘餘權力（軍隊、警察）合作，以謀求維持當前的社會治安；②籌備歡迎國府接收人員；③與國府有關當局合作，以便順利進行有關接收台灣的業務等等。

農民也好，工人也好，作為一個階級，雖然存在，但革新派這一方並沒有累積以他們為

基礎，在短期內組織革新力量，使它發揮政治勢力的領導權。

純樸的愛國心

本於民族主義純樸愛國心的流露，與單純而又美麗的重歸祖國的心願，成爲社會上的一般潮流。島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一心一意期盼來自祖國的

接收人員與具有國民政府軍和國民黨軍雙方含義的「國軍」進駐台灣，這種氣氛瀰漫全台。繼承德高望重的孫文主義者蔣渭水的乃弟渭川組織「台灣政治建設協會」；以原台灣共產黨的女領袖著名的謝雪紅，在她的地盤台中組織「人民協會」；謝又與楊達夫婦，組織承襲戰前「台灣農民組合」的「台灣農民協會」；在台灣共產黨內部的抗爭中與謝雪紅對立過的蘇新等，則組織「台灣文化協進會」；分別作建立據點的嘗試。

謝雪紅是一九〇〇年生在彰化的女鬥士，不但出生在窮苦的家庭，而且在少女時期失去雙親，經歷養女、女工等的逆境，在政治上逐漸覺醒。曾遊學神戶和上海，尤其在上海時，活躍於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因此受到賞識，於一九二五年底，到莫斯科的「庫特威」（東方勞工共產主義大學）留學。她也是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創立時的主要成員之一。謝在二二八蜂起遇挫後，逃亡到香港，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及台灣再解放聯盟（一九四八年八月）等。中共政權成立前夕，進入大陸，歷任要職。但因在反右派鬥爭中受到批判

而沒落。文革期間，再受批判，一九七〇年，在失意中病死。到了一九八〇年，獲得中共當局の平反。

另外，早先的新聞記者和文化人士，兼圖啓蒙運動而湧進大眾傳播媒體，投身於從日本接收的報紙——《新生報》（前身爲《台灣日日新聞》）、《中華日報》（《台南新聞》的化身），還有在光復隨後創刊的《人民導報》、《內外新聞》、《自由報》報紙，與《政經報》、《台灣評論》等雜誌。

陳儀抵台

進入十月，「祖國」的影子才在台灣出現。五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前進指揮所在台北成立。十七日，國府軍隊第七十軍分別搭乘美國軍艦，在歡呼迴響中，登陸基隆。二十四日，兩度變更到達時間，讓歡迎的龐大群眾焦慮不安的陳儀長官，終於從松山機場降落了。

陳儀或許因爲與魯迅和許壽裳有交情，有益於形象吧，被認爲是屬於政學系——以國府內開明官僚爲核心的派系——的清廉之士。在重慶被任命爲接收台灣的長官時，一般說來，反對的聲音低，良才獲得選任的風評反而較高。這也是由於他是日本陸軍士（軍）官學校畢業，娶日本人爲妻的知日派，歷經福建省主席的職位，瞭解閩南人（使用與台省人的多數派相同的母

語群)的氣質，有訪台的經驗，也主持過有關台灣的調查與研究。

不過，南洋華僑的有力人士——陳嘉庚這幫閩南系人士等，對陳儀強硬且獨斷獨行，與傳統中國官場習慣有異的施政，從他的福建省主席任期開始，一有機會就加以指責和批判。

台灣的新貴

各色各樣的人，開始從對岸湧進台灣來了。有自稱懂得閩南話，而謀求一下子發大財，或者在處女地尋覓高官厚祿而來的閩南系人。有因為與日本當局合作，擔心以「漢奸」罪受追究的「滿洲國」、「汪精衛南京政府」、「冀東政府」等的有關人士，他們懂日語，又由於沒有熟人，反倒得救，以為台灣容易藏身，而矇混進來。事實上，他們那裏肯安靜地藏身，竟拿北京官話當武器，簡直是趁別人不知情的好機會，公然高掛來自祖國的「勝利者」的假招牌，欺騙台灣老百姓，毫無顧忌地一意作孽。

從台灣逃出去的抗日分子，「雄飛」而在大陸或南洋的日本機關走紅的前「二等日本國民」、被強迫徵用與徵兵復員的人員——具有實在複雜背景的人們，從四面八方，向台灣回流。

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和學業已完成的老留學生，以充滿自負心的精英集團，獨異於眾。戰爭結束以前，台灣青年的留學目的地，幾乎以日本為限。這也許是他們的心情所致吧。其

中的一位，東大法學院的校友作了以下的證詞：

老校友：「聽到日本戰敗與台灣重歸祖國，我們高興得跳起來。再也不讓日本人喊我們爲『清國奴』啦！趕快回台灣吧！除了我們，沒有任何人士能接收台灣總督府，接收過來建設台灣呀！我們大家都這樣歡欣鼓舞。」

戴：「那麼，前輩們當時所看到的中國是什麼模樣，可有清清楚楚的形象嗎？」

老校友：「如今想起來，我們是完完全全的無知啊。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是知道的；關於中共，僅止於傳聞的程度。戰爭結束時，中國至少有重慶的國府和延安的中共，加上即將面臨消失命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南京政府』和『滿洲國』，居然有四個『中國』。我們連這項客觀上的事實，也完全不知道。」

想投進慈母溫暖的懷抱的心情在引導著，再沒有別的任何念頭。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不擔心。我們大家都把國府本身當做好久以來一直懷念的慈母，而深信不疑。連自己不會講中國的標準語，也就是北京官話，不會讀，更不會寫的情形，也不加關心與注目。我們充其量只不過是會講母語——閩南話或客家話——的台灣人；不止是語言而已，就是在意識的層面，也被殖民地支配扭曲掉不少。並且，沒有注意到：由於被帝國主義隔離的結果，好也罷

，壞也罷，在意識層面上，在生活形態上，與中國大陸的人們產生了隔閡。連我們自己多半只不過是『不完整』的中國人，都無法確認，真是粗心啊。彷彿以為只要接收總督府就行，一切就成了，這麼充滿幹勁，由衷地興奮。」

戴：「由於美國準備不足和變更預定計畫，取消對台登陸、佔領作戰，改成麥克阿瑟先進行呂宋島的佔領。到了後來，又因戰況的急速進展，跳過台灣，改為沖繩（琉球）大血戰。請問您，是否知道這中間的原委？」

老校友：「不知道有過這等事。不，連想要知道的意識也沒有。豈止是我一個人！就是到現在，我們台灣人仍然不肯在全世界戰略構圖中，好好研判台灣的位置。嘗試替自己定位，從事獨立自主的、原創性思考的台灣人很少。格局小，視野又窄，正是我們無法否認的本質性缺點。遲遲不能自我提升，可真糟糕啊。」

不經任何媒介而直接地變回中國人，得意揚揚地承接日本人的職位，可以向台灣的建設軌道邁進——這樣想的，並不是只有這位校友仁兄而已。法律形式上的「光復」，與每一個人在重歸中國後，能否自主地參加新台灣的建設，擔任自己所應該擔任的角色，是層次根本相異的問題。台籍精英分子的幻想，不久就被戳破粉碎。

2 國府軍到達台灣

第七十軍 台灣的馬路街景，經過重新粉刷，塗成歡迎光復、慶祝國府軍到達的彩飾。

解脫感與戰勝了日本的滿足感交織的氣氛，把蔣介石的形象大大地清新化了。中共地區以外的民衆，接納蔣爲勝利的象徵人物，光復隨後的台灣，自是如此。

國內外冷靜的分析家，則評估蔣介石爲軍閥割據時代以來，足智多謀地倖存下來的最後且最強的軍閥之一。他與其他軍閥的差異，通常被舉出的是：具有近代軍事知識；透過妻子宋美齡與美國深相結納；以妻族孔祥熙和宋子文爲管道，在財政上能作相當程度的控制。

然而，國府軍的對日勝利，徒有形式，實際內容卻只是「慘勝」而已。第七十軍不過是爲了進駐台灣而匆匆編成，姑且湊合的「雜牌軍」罷了。以戰爭結束當時的國府軍而論，還欠缺國家軍隊抑或國民黨軍隊所應有的實質。在國府的軍隊中，以公認爲蔣介石嫡系的黃埔軍校系，最佔優勢。可是，以李宗仁、白崇禧爲首的桂系（廣西軍），仍然保有與黃埔系分庭抗禮的實力。此外，有孫立人將軍所率領的美式裝備的「新一軍」，以在緬甸作戰中痛創日

軍聞名。還有以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爲轉機而被解散的東北軍（張學良部）和其他被再整編而成的軍隊等，同時並存。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以爭奪中國革命領導權爲目標的國共鬥爭就顯著地表面化、激烈化。在軍事方面，爭戰於東北地區與華北地區；在政治、財政、經濟方面的接收重點，是包括南京、上海的長江三角洲，重工業的武漢三鎮，以紡織業等重要的天津、青島，再加上故都北京與鄰接香港的廣州等地。相形之下，台灣可以說是國共鬥爭的圈外之地，似乎並沒有被列爲接收的重點地區。事實上，國府主流的袞袞諸公甚至還有認爲台灣無關緊要的跡象。「雜牌軍」——第七十軍——的進駐，就如實地反映這一點。陳儀獲任爲長官，自另外觀點來揣摩，未嘗不可以說是：蔣介石周圍的主流人士用巧妙的方式，把非主流的陳儀隔離放逐到離島台灣去。

受降典禮前後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受降典禮在台北中山堂舉行，陳儀長官與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代表中日兩國政府，在投降文件上簽署。從此，這一天就稱爲光復節，成爲國定紀念日。

受降典禮完畢後的當天下午，「台灣光復慶祝大會」由大地主且爲文化協會右派民族主

義者集團盟主的林獻堂主持。第二天，林結合從中間到偏右派的台灣士紳，發起「台灣建設協會」。意圖似乎在於輔佐長官公署的施政，並保持和擴大他們自己的權益。在歡迎活動的幕後，由於個人或群體背景的差異，有各種意願錯綜傾軋。台籍的士紳間的爭執，有密告，有相互中傷，令人側目。

受降典禮後，街頭處處是旗海、舞獅隊、鑼鼓喧天的熱鬧場面。從八月十五日到十月二十五日的兩個多月，因為還有五十萬日軍存在，台灣總督府好歹勉強維持了秩序。等受降典禮完畢，接收正式開始，日軍被解除武裝，警察權力也瓦解了。維持秩序的責任與權力，移交到中國這一方。

陳儀沈仲九的實驗

陳儀從日本留學時代就跟魯迅和許壽裳有深交。魯迅太出名，因此這裏略過不談。許壽裳，字季弗，浙江紹興人。在日本留學時代（一九〇

五—一九〇九年）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編過革命先鋒雜誌《浙江潮》，並在此時期與魯迅、陳儀訂了深交。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回國後，應蔡元培的邀請，和魯迅同就教育部職，並兼任北京大學等的教授。

戰爭結束後，許被陳儀內定為台灣大學校長。可是國府教育部以許為魯迅好友，為魯迅

思想的宣傳者，而拒絕任用。當時的教育部長是 C. C.（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鉅子陳立夫，因此，或可說這是必然收場。許壽裳不得已，只有擔任陳儀創設的台灣省立編譯館館長，並兼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但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夜晚，在台灣大學宿舍被暗殺。此舉被指為政治整肅的恐怖行動的一環，大受國內外的抨擊。

提起《浙江潮》的同仁，就會浮出沈仲九（銘訓）的名字。沈與陳儀有親戚關係（沈為陳

妻之堂弟，陳之第一任夫人為中國人）於日本留學後，再到德國留學，據說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居於領導地位的會員。以智囊地位參與陳儀的福建施政，在同一期間主持行政幹部訓練班，另一方面他又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徵求同好。沈仲九在陳儀的庇護下，戰略上，局外人不易窺知其基本想法，但在戰術方面，則可看出其有志追求與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不同的「第三路線」的濃厚形跡。沈把台灣看成理想的實驗場地，而早在重慶就策定三項「基本施政方針」。

這三項是：①樹立適合台灣實情的行政制度；②實施統一接收；③保持幣制的安定。①是要樹立承襲日本舊總督府體制形式的長官公署體制，謀求如同日本的台灣總督一樣，掌握行政與軍政的一元性權力，陳儀於是兼任台灣省行政長官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②是要完全

掌握「日產」——日本有關機關及其人員所留下的財產，預先阻止針對接收的權益而介入的大陸各勢力，以便確保治台財政基礎。③是要隔絕大陸通貨膨脹的狂潮，意圖禁止大陸的浙江財閥系銀行和 C.C. 掌握的農民銀行等向台灣發展。

沈仲九在表面上高倡「實踐三民主義」和「建設台灣為模範省」，實質上則大舉留用日本人，著著致力於建立體制。接收專賣局與繼續實施專賣制度，為謀求獨佔進出口與移出入而創設貿易局，為建立計畫經濟而整備統計等等，就是著例。

對陳·沈體制的抗拒

對光復的興奮、對新的開幕的期待、歡迎的熱情一天天冷卻下來。通貨膨脹的猛進，由於相繼的復員而更加惡化的失業的痛苦，「雜牌軍」紀律的鬆弛，接收官警的橫暴和貪污，與陳儀、沈仲九體制所自豪的高遠理想和戰略構想正好相反，大陸的陋習也侵入台灣了。台籍的意見領袖們透過大眾傳播而開始批判。不用說，接收官警的作惡成了抨擊的主要目標。不過，他們更憤怒的對象，正是陳、沈體制的中樞本身。

他們把陳儀和沈仲九的各項政策，看成是要侮蔑、剝削台灣本省人，而當作譴責與彈劾的主要目標。以博學多聞場名的沈仲九，竟好像也沒有覺察到：在日本五十年的支配中，台

籍知識分子最敏感的反應或抗拒的是差別待遇。浙江財閥與在C.C.等影響下的大陸系大眾傳播界，外省人的新聞記者，都抨擊陳儀一幫在台灣構築「獨立王國」。因為他們也被排除在台灣的權益圈外，焦躁難忍。

在法制上，陳儀雖然握有相當於舊台灣總督的權力，但權力基礎卻很脆弱，名高實低。軍與黨的實權，陳儀都沒有能夠充分地掌握。國府內的政學系本來就是與軍、黨，更與特務機關——「軍統」和C.C.具有劃清界線，另成一派，試圖造就近代式政治家和行政官的集團。加上陳儀班底的主流，由於沈仲九的影響和人事淵源，從福建主政以來，一直以非國民黨系的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和左傾分子或原為共產黨員等人士為核心。當然，就是在台灣，國民黨黨部與行政部門的不和，也是分明的事實。

人人得面對戰爭後的混亂。儘管利用台灣海峽，制定隔絕、管制與大陸經濟關係的政策，仍然不易產生實效。以「日產」為計畫經濟的基礎，透過專賣局、貿易局的經營，來確保財政收入，使台灣成為模範省的意願，顯然是值得嘉許的。可惜欠缺充分的人材，致不能估量民心，充分地關懷草根性情結，站在更高的見地和更大的格局，來推展接收工作這項秩序的重建。

事態一路惡化。招惹民衆的怨憤，憎恨的「火種」，確實且持續地撒下去。

3 一二一八事件的悲劇與傷痕

事件的發端與擴大

事件從芝麻小事引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比喻亦可適用於此。

時間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地點在台北市北郊大稻埕（現

在的延平北路）以夜市繁榮的「圓環」附近，著名的「天馬茶房」店頭。公賣局查緝私煙的警察隊正要向來不及逃避的女攤販沒收私煙，而扭成一團。

女攤販因爲生活交關，急著討回被扣押的香煙和值錢的東西，拚命拉住警察。面對這種情況，年輕的外省人警察就用槍托毆打她。注視事情發展的群眾越來越多，民衆的憤怒極端尖銳化。警察也許發現形勢危急吧，意圖解圍，而開槍嚇唬。結果，直接打中一位圍看的男人，他中了彈，當場倒下，立刻死亡。激怒的民衆衝到警察逃進去的警察分局前面，要求逮捕肇禍警察，並且要求當局，把他就地槍斃。到了二月二十八日，由於得不到當局有誠意的

回答，民衆的示威隊伍改變箭頭，直衝公賣局的台北分局前去。然而，在這裏也不得要領，於是搬出公賣品，推翻停在分局前面的公用車，將它燒燬。

示威隊伍越來越多，再以長官公署爲目的地，排成隊伍。衛兵感到恐懼，爲了對抗他們，而從公署樓上用機槍掃射。因此，示威群衆有人傷亡。民衆雖然潰散，可是憤怒至極，演爲火上加油的情勢，一看到外省人，就處以私刑，還襲擊外省人經營的店鋪，逞兇施暴。

另一方面，佔據台北廣播電台的群衆透過廣播來報告事件的經過，同時呼籲一致奮起，採取抗議行動。「火種」既已撒下，而米價的暴漲，又越發鼓動眼看就要迎接三、四月青黃不接期的生活不安的都市居民們加入行動。

「反叛」的波濤迅速傳遍全島。興奮的都市群衆與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們，只要看到外省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施以私刑，又襲擊官署和公營機關，耀武揚威，洩憤出氣。

我到過好幾次現場，碰上怪異的情況，感到驚慌失措。曾經是日本人向包括漢族系台民在內的中國人呼喝的「清國奴」的罵聲，如今居然由本省人向應該是同胞的外省人亂罵一通。甚至於還有人揮舞日本軍刀，用布巾纏頭，高唱日本軍歌。我眼看這種人心的荒廢，不由得毛骨悚然。至於爲了辨別本省人和外省人，逼迫別人唱日本國歌，罵可憐的外省籍小孩「

清國奴的忘八蛋」並施以私刑，縱然是在動亂中，也未免過火。即使未曾受到私刑的非外省人，也會心疼。希望變成幻滅，純粹且質樸的愛國心被蹂躪，「美麗島」（福爾摩沙）不久就成爲染血的悲劇島。

國府軍的傲慢

在同一時期，大陸的國共鬥爭已經演變爲激烈的內戰。國府軍當局似乎有倚恃美國的援助，依靠並不紮實而且充滿矯飾的「強勢」，並期待獲得民衆支持的形跡。他們想必是因打勝日本而沖昏了頭，並沒有爭取民心的積極作爲，力圖革新政治的自覺。台灣的局面當然也不例外。

進駐台灣的國府軍當局，大概是被歡迎的龐大群眾的旗海搞糊塗了。再加上，他們大都把台灣看做中共強有力的地下組織和游擊勢力還不存在的唯一「乾淨土」。未嘗不可以說，有足夠使他們夜郎自大的客觀條件存在。以下，稍微把時間往後挪回去看看。

一九四六年秋，蔣介石給陳儀拍了秘密電報。原來是要試探台灣駐軍爲補充大陸的軍事力量而移到大陸的可能性。陳儀以爲正中下懷，而趁機答應把「雜牌軍」撤回大陸。有位老新聞記者對此始末作證：

「接收當初，進入台灣的『第七十軍』於一九四五年底被調到大陸。取代他們而駐防台

灣的『第六十二軍』的士兵也是烏合之衆，還沒有好好接受訓練，就進駐台灣。因此，軍紀紊亂，成爲民衆怨恨的對象。陳儀雖然在形式上兼任台灣警備總司令，可是實質上並沒有掌握到軍事權力。此外，由於拒絕法幣在台灣流通的關係，台灣駐防軍的薪餉等，一律歸台灣長官公署自理。於是變成了『負擔』的『第六十二軍』的撤回，簡直可以說是正中陳的下懷。

無論如何，對台灣民衆歡迎重歸祖國的熱烈與守法精神所得的好印象，加強了陳儀對台灣施政的自信，確屬事實。所以，陳儀不需要大規模的台灣駐防軍。

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台灣駐防軍中，只有隸屬『第二十一師』的『台灣獨立團』是唯一的正規軍，駐防鳳山、嘉義、台中。此外，『憲兵第四團』雖然在形式上駐防台灣，但實際上兼管福建、台灣雙方，而各駐一半。另有擔當管理、運輸從日本接收的武器類的『聯勤總部台灣供應局』與『輜汽第二十一團』的大隊。另外又有從日本接收的高雄和基隆二要塞的留守部隊，與直屬警備總司令部人員微小的衛戍部隊。就算把以上全部合計，能夠擔任實際作戰的，也只有三千五百名左右，而且是以軍械庫和接收自日本的軍事設施的管理爲主要目的的軍隊。因此無法臨機應變地用來鎮壓起事的民衆。

我絲毫無意替鎮壓辯護，不過如替完全明白守備軍人手不足的警備總司令部這一方的將士設想，那麼對憤怒若狂的群眾害怕發抖，希望靠開槍來制止的心情，也未嘗不可以想像。總而言之，實在是愚蠢的舉動，釀成星星之火，燒光草原的結果，着着進展到幾乎不可收拾的局面。」

中共的行動

在當時，有或多或少的政治經驗，稍具組織能力的反體制團體，非中國共產黨（中共）莫屬。中共當局對事件當時所實施的黨的具體方針及實際行動，直到現在都不曾有過正式的發表。

如把片斷的報導和回憶錄等撮合起來，加以整理，可能大致是這樣的：

中共地下組織的要員，已經潛入台灣。光復以來只有不到二年的期間，根本無法充分展開組織的重建與舊台灣共產黨有關人員的歸隊手續等活動。正在展開其活動過程中，二二八事件就突如其來的爆發了。黨的地下組織，當然，沒有意料到事件的發生，更談不上進行配合事件的組織上的有關準備。正確地，或許應該說，既尚未具配合事件進展的條件，也沒有配合的組織力量。

在台中地區，原台灣共產黨幹部謝雪紅一夥人於三月五日組織二七部隊，從事活動。在

嘉義地區，有經中共紅區派回台灣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軍事負責人張志忠（張梗）所領導的襲擊嘉義機場等軍事行動。實際行動的人們，都不是工人、農民階級出身，多為從舊日軍復員的失業青年和熱情奔放的大專中學生等，乘著反政府的興奮漩渦，可以說臨時湊合在一起而已。

台北地區沒有成形的軍事組織，共產黨員和原共產黨有關人士，最多只能躲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委員會於三月二日在台北中山堂組成）背後，充當向「進步人士」獻策的參謀性角色，或從事宣傳工作。

處理委員會

談到處理委員會，原是當局所提議設立的。按，當局起初大概既希望又打算迅速且圓滿地了結事件。到了形勢惡化以後，也許以拖延時間為目的而倡設者。最先成立的，是台北市的處理委員會。會員包括當局方面的代表、省參議員、參政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等本省籍的民意代表。

既然是依政府方面的提案而成立的機構，成員的台省人的想法和政治上的立場，當然從左到右，分歧多端。不過，就以左派來說，也沒有一個是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員。

如果加以冷靜地研判，以台北市處理委員會為中心的政府方與反體制方的攻守或討價還

價，也許如下：

委員會內部勢力，大致由三個集團所構成。首先，第一個可以舉出的是當局，以及跟它貼緊的「半山」集團。「半山」就是抗日戰爭中，在大陸從事抗戰，光復後隨長官公署，以接收要員身分返台的原台省出身者的通稱。他們多冒充「凱旋將軍」，行使特權，接收「日產」，化爲私有，因此頗有惡評。第二，是熱心於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集團。第三，是從中間派到右派的保守系大地主和地方士紳集團。

第一集團在處理委員會中的意圖，前面已經交代了。第二集團，有中共的地下組織在背後擔當參謀的角色。他們一面把談判引導到有利的方向，一面意想亡羊補牢地掌握並組織民衆奮起的能源。此外，也謀求透過談判的過程，推行自己所意圖的政治性的社會教育。被選任爲委員會的「宣傳組」組長，也就是發言人的，是茶業公會理事長、省參議員、進步派民主人士王添燈（三月十二日晚上被暗殺）。第二集團的人一方面支持他，他方面充分運用他開明資本家的資質，挑起合法性鬥爭。成果落實在後來的「處理大綱三十二條」。

從許多非正式的證詞和情況證據研判，當時中共在台灣負責的負責人蔡孝乾（在愛德嘉·史諾的

企圖把台中和嘉義的武裝組織合併，將鬥爭引導到有利的方向。嘉義的張志忠是黨員，但據說因為蔡與台中的謝雪紅之間，自光復前以來的個人對立仍然持續，只好聽任統合失敗，注視事態的演變。

可以當作結論來說的是：以共產黨為首的左派，志氣固然高，可是組織的基礎脆弱，明顯地在白費氣力。幾乎，所有公開活動的幹部，在國府軍支援師抵台（三月八日）之後隨即逃亡到大陸，其餘或被槍斃，或入獄，或潛伏地下，陷入七零八落的苦境。

第三集團，一面冷眼旁觀事態的進展，一面設法防止情勢的惡化，擔當調停的角色。他們雖然希望民主化和台灣的地方自治化，可是擔心被左派掌握領導權。因為他們具有在殖民地時代的抗日運動中抗爭的痛苦經驗，完全明白左派的目標在那裏。

國府增援軍的鎮壓行動

國府增援軍的兩個師，從三月八日到九日，陸續在基隆登陸。肇事方的台省人對外省人所加的私刑、謾罵，尤其是用日語或日式的侮蔑行為，嚴重地刺傷外省人的感情，挑起怨恨。並轉而影響增援師將士，是不難想像的。何況處於抗日戰爭中的反日感情仍舊濃厚留存的時期，台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所造成的隔閡，深刻的程度，超出人們想像之外。

鎮壓軍的鎮壓行動，兇悍地展開了。「近親憎恨」升到頂峰，透過槍枝而進行的悽慘情況展開了。

共產黨人一開始就把自己的政治行動，定位為明確的政治改革，進而當作在大陸進行的壯烈的革命領導權爭奪戰之一環，因而老早知道自身的危險。他們迅速潛入地下，或試圖逃出島外。可以區分為從中間到左派的熱情名士和屬於知識階層的人們，也許受到時代性情況的局限，可以說處於中國革命的圈子之外。他們多半本於樸實的祖國愛，把一縷希望，寄託在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之上。按實情來說，大概一直到最後，都還沒有發覺到自己在事件前後的行爲，將被他人怎樣作「政治上的」利用。

台北市處理委員會委託宣傳組長王添燈起草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大綱」，起初包括三十二條。它的主調在於穩健的事件收拾方策與政治改革。他們所揭示的最高目標，只不過是在台灣實現錄用更多台省人的高度地方自治而已。

然而，在進入討論的三月七日下午的時候，國府支援軍抵達台灣的風聲傳開，衆人心惶欲逃。當局派特務人員潛入會場，在忙亂中，追加新的十條，逼使它通過。在這十條中，「甲、軍事方面」的第五條「撤廢警備司令部，防止軍權之濫用（於未然）」，與「乙、政治方

面」的第二十九條「要求無條件立即釋放以戰犯及漢奸嫌疑受拘禁之本省人」後來被利用為鎮壓的法律上的理由。顯然，這是被套上去的「陷阱」！

受鎮壓而死傷的人，據說在一萬以上，但正確的數字，就是到現在也不明確。從日本殖民地時代以來就活躍的精英分子和士紳，失蹤了不少，被暗殺的事實，直到今天，仍舊銘刻在中上層台省人的心目中。

由於談論和研究二二八事件都是觸犯禁忌，所以它的實情和真相，至今還是根本弄不清楚。儘管鎮壓的機構錯綜複雜，現在大部分的台省人還是只把自己看成受害人，而痛斥國府、國民黨、外省人為加害人，把事情單純化，並加以咒咀。甚至於時常對外省人流露出厭惡的情緒。

當時的國府也罷，國民黨也罷，都絕對不是一個整體。特務機構的軍統也好，C.C.也好，都有台灣人的有力特工，他們簡直是在「趁火打劫」，拿事件做藉口，恐嚇別人，勒索錢財。到了事件後，他們又多半以經濟界的重要人身分，君臨台灣的財界和企業界。據說，有一部分人為了防止自己以對日合作為中心的積惡被揭發，正好利用這次好機會，以密告和假借憲警之手進行暗鬥和暗殺，以「借刀殺人」的方式根除對手。這種案例自屬不少。

無論如何，多半不是公開審判，而是秘密中的逮捕和暗殺。不管兇手是誰，不問鎮壓的方式和內容如何，罪惡元兇的標籤，都要貼在國府、國民黨、外省人的頭上。陳儀被看成他們的代表人物，惡名昭彰地刻在人們的記憶裏。

只留下悲劇的傷痕，繼續疼下去。而日本殖民地時代「共犯結構」中的從犯們，卻趁二二八事件的機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巧妙地從民衆的視野和記憶隱身而去。他們從此一變而挺胸抬頭，以新的「共犯結構」的配角身分，毫不在乎地重新上台。他們自己也是台省人，因此以主張被害人之類的姿態行動。並且看準了民衆在認識上很少覺察政府、政黨、外省人的區別和層次，而巧妙地在民衆面前充分運用政府、政黨、外省人爲擋箭牌。只要擋箭牌存在，政治上的禁忌持續下去，他們就可以在虛構和矯飾的大環境中磨鍊保身術，安享餘生。並且，以現狀來說，他們的後裔也深深套進「共犯結構」中，一直發達到今天。

第五章 國府中央遷台與 國民黨支配的確立

1 台灣的國共鬥爭

大陸的國共鬥爭

從戰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爲止，國共二陣營在大陸的勢力的構圖，大致如下：

獲得美國全面性支持的國府軍，有正規軍約二百萬，總兵力約四百三十萬，裝備也精良。尤其是蔣介石以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象徵性人物，聲望空前高昇，因此在表面上，國府方面似乎佔有壓倒性的優勢。

相形之下，中共方面連八路軍和新四軍合計，約一百三十萬人，從延安以窯洞爲中心的極端樸素生活和草鞋所象徵的簡陋裝備推測，人們頗有判斷他們屈居下風的趨勢。然而鑽過

陶醉在勝利中的國府軍的疏忽和空隙，中共軍向華北和東北地區，逐漸確實地鞏固地位。

國府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從重慶遷都南京。六月三十日，國共停戰會談一決裂，內戰就全面化。國府方面或許以為有必要不計一切地在制度層面與政治形式上趕緊取得優勢，因此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公佈中華民國憲法。接著，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和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分別舉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和第一屆立法委員的選舉。

國府依據選舉的結果，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分別選舉蔣介石為首任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與國民黨所倡導的政治拜拜的盛況正好相反的，是惡性通貨膨脹的猛進。為了因應這個局面，蔣介石締結中美相互協定（七月三日）。此外，又任命其子蔣經國為上海地區經濟副督導員（八月二十一日），實施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以策萬全，但終歸失敗。財政經濟的崩潰，進入讀秒的階段。

在軍事上，國府軍也更加陷入劣勢。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濟南失守；十月二十一日長春，十一月二日瀋陽，十一月三十日徐州，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分別失守，終於導致一月二十三日，聽任中共軍不流血而入北京城的結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因情勢急轉直下，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理總統。惡化的軍事情勢再也無法扼止，四月二十三日南京，二十四日太原，五月十五日武漢，二十五日上海相繼失守。這一來，連長江一線也變得無法防守了。

八月五日，美國判斷大勢已定，公佈了「對華白皮書」，把大陸失敗的一切責任推給蔣介石與他所領導的國府的腐敗和無能，白皮書可以說是美方對蔣的一種斷絕關係宣言。留在蔣介石前面的出路，只有就西南地區的昆明或重慶、華南的廣東，以及離島台灣三者，選擇其一為流亡地而已。前二者已經是中共的地下組織所控制之地，因此不得不趕緊死心斷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以這一天為界線，中國大陸的大部分上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五星紅旗」，取代了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飄揚。

嚴格地說，在這個時候，西南地區的重慶、兩廣（廣東、廣西）地區的廣州、海南島、還有西藏，也都仍在國府手中。國府在形式上雖由李宗仁代理總統指揮，可是實權依舊歸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下野的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名義掌握而遙控。中國大陸全土統歸

中共的支配，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人民解放軍和平進駐拉薩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建黨（一九二一）以來，呈現熾烈進展的針對中國革命領導權的國共在大陸上的鬥爭，到此大致收場。新的鬥爭舞台，從此搬到以台灣為中心的島嶼部。

然而，蔣介石遙控的國府中央正式遷到台灣，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從鎮壓二二八事件，收拾告一段落的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中央政府遷移台北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為止，在大約兩年半期間，台灣決不是處於無風狀態。

國府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任命擁有駐美大使經歷的職業外交官出身的文人政治家魏道明，為台灣省主席，做陳儀的繼任人。魏後來也出任駐日大使（一九六四年六月—六八年八月）。此外，國府把惡名昭彰的長官公署制與警備總司令兼任省主席制，雙雙廢除。這是安撫台灣省民與顧慮對美輿論的人事安排。將這些看成因應美國的反蔣介石勢力的策略之一，想必沒有大過；他們把蔣在大陸的失敗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合併起來，把批判和彈劾蔣介石的聲音提得更高。

台灣省政府的新施政

在新起步的台灣省政府內，可以說相當於不管部閣員的十四名省政府委員中，本省籍改為佔有七名。當局又害怕「半山」的惡名，避

免偏重「半山」，而選任林獻堂、杜聰明（台北帝國大學時代唯一的台灣人教授）、南志信（台東阿美族，但或說係出身卑南族的醫師）、陳啓清（高雄望族出身的原糖業資本家）等人。對省級的正副廳長職位，也謀求錄用本省人和「半山」，致力收攬人心。

受到鎮壓的衝擊而視政治為禁忌的本省籍士紳們沉默下來，通常避免作公開的政治上的批判，而把精力專注在經濟活動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被看成蔣介石在軍事上的心腹而手腕狠辣的陳誠，取代魏道明，就任省主席。國府於二月四日，為避免重蹈在大陸上的錯誤，趕緊宣佈要在台灣實施「三七五減租」，規定佃租不得超過主要作物——習慣上用來支付佃租的作物——全部年產量的三七·五%。藉此在法律上實施減租，也可以說企圖鞏固國府避難基地——台灣——的基礎。終局的目的雖然是要爭取共產黨潛在的社會基礎之一的農民勢力，但當前的緊急課題則在於抑制通貨膨脹與確保移入的大批官軍民的糧食。

得勢的學生運動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秘密展開了「三七五減租」是虛偽的農地改革的一環，不要上當的反宣傳運動。此外，中共看準這簡直是千載難逢的良機，而混進從大陸敗退的初期難民群中，潛入台灣。

另一方面，受到大陸學生運動的刺激，台灣更以響應的方式，發起澎湃的學生運動。本省籍的學生們，被來自大陸的進步作家——魯迅、茅盾他們——的文學作品，與雜誌《觀察》、報紙《大公報》等所吸引。和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小冊子也一直在地下流傳。

受共產黨在大陸所佔優勢的煽動而左傾的學生不斷出現。「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這項在大陸的反體制口號，在不知不覺之間，以台北市為中心而蔓延下去。負有任務的來自大陸的留學生，也混進台灣，企圖為學生運動點火並加以領導，是不難想像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宣佈同意與共產黨在北京舉行和談，任命邵力子等五人為代表。台灣的學生運動越發得勢帶勁。

三月二十九日，在台灣大學的大操場，舉辦營火晚會，慶祝「台北市大中學學生聯合會」的成立。台灣型的「全學連」露面了。這是台灣史上之空前創舉。

面臨四月十二日的「三七五減租」的實施，南京、上海的要衝岌岌告危（四月二十三日棄守）。

四月六日，陳誠下令襲擊台灣學生運動的聖地——台北師範學院（舊台北高等學校，今台灣師範大學）學生宿舍以及有關地點，斷然大舉搜捕。這就是所謂「四·六事件」。

國共在台灣鬥爭，由於這次的「四·六事件」而表面化，憑靠鎮壓該事件的成功而暫

時閉幕。嗣後，情況就演變為地下鬥爭。

2 「三七五減租」與掃紅

三七五減租

台灣的農地改革，通常以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開始的「三七五減租」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為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實施的公地放領；第三階段為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施行的孫文所提倡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研究者多對農地改革的經濟層面詳細注目，加以討論。但，台灣的個案，正以具有特殊的政治性意義，而獨異於眾。

大家都知道，台灣是透過光復，才剛剛重歸祖國的原日本殖民地。從客觀的立場來看，國府政權在中央政府遷移台灣當時，在台灣應該還沒有穩固的民衆基礎。

以國府政權的階級屬性而言，本來由台灣的資產階級和中上層地主階級做它的支持基礎，應該是合理合情的。不過，在光復隨後的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重建，與針對它的支持基礎的新編和整合所作的處理，可以說由於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而徹底挫敗。

對陳誠來說，台灣施政的緊急課題是建構自己權力在台灣的支持基礎。它也具有預防「紅色細菌」滲透的意義。以陳誠當時的處境，台灣農民是唯一存在且最適當的可以說服及可資利用的對象。在國府中央權力內部，還沒有台灣地主階級參加。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傷心的是：二二八事件在意想不到的一面，幫助了國府中央鞏固在台灣의 權力基礎。

林獻堂的流亡

從減少佃租開始，然後，儘管要付出代價，但以廉價徵收的地主的土地，交給佃農。對這種農地改革，地主方面有異議的反應，是不足為奇的。然而，二二八事件的打擊太大，對鎮壓的恐怖，陰雲依然沉重地壓在台灣中上層地主頭上，夾纏在心中深處而不散。

具有象徵意義的事象，是林獻堂逃亡日本。前面已經提過，林是台灣首屈一指的開明大地主，是反抗日本的中間到右派集團的統帥。他於一九三六年六月，結束中國大陸的旅行，在返回台灣後的報告會上，稱呼中國為「祖國」，因而挨過右翼日本浪人的毆打（祖國事件）。另一方面，林在二二八事件中，擔當調停人的角色，被謝雪紅等左派批為與國府當局合作的人物。

在表面上，林獻堂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假借療養疾病的名義，流亡到日本去。

不過，這似乎應當看成他向陳誠對付地主的政策——包括籌措糧食與三七五減租——所作的無言的反抗。一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在東京久我山壽終正寢為止，林始終不肯理會國府的返台勸誘。不但如此，據說在中共政權成立後，還暗中支援邱永漢等的台灣獨立運動。

從國府方面看來，林獻堂的流亡與不合作，表示它沒有充分獲得台灣中上層地主的支持。換句話說，也可以研判：國府未能把台民的中上層資產階級，充分且有效地編入它所倡導的、以台灣為舞台的反中共統一戰線。台灣獨立運動的「根」之一，正可以在這裡尋覓出來。

國府遷移台灣

自從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以來，國府人士越來越心惶意亂。

如今回顧起來，似乎只有以蔣介石、經國父子為核心，圍繞他們的少數中心人物，在冷靜地為策定並實踐從大陸避難到台灣的大計而奔命。但也未嘗不可以說，因為被中共的「戰犯追究」攻勢，逼得無處可逃而不得不改變作風。

蔣介石下野後，對代理總統李宗仁的制止命令充耳不聞，命令陳誠、俞鴻鈞（當時的中央銀行總裁）、蔣經國和徐柏園（當時的中國銀行總裁），把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等為首的有關銀行

所存國庫金、銀、美金等財物、外匯，秘密運入台灣。

據說，單單黃金就有三百九十萬盎司、美金七千萬元、白銀相當於七千萬美元，以當時的價格為準，共計大約有五億美元被運到台灣來（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這些財貨對後來財政金融的安定大有貢獻，自不待言。

在台灣經濟的重建上，不可或忘的是：國府以行政院所轄的資源委員會為中心，把對大陸的美援資金引進台灣，加以運用。國府當局起初試圖在工業部門重建台灣糖業、台灣石油、台灣電力、電信電話，在農業部門則大量輸入肥料，運用肥料換穀制度，以恢復糧食生產並確保食米。

掃紅與陳儀的槍決

抑制住通貨膨脹，使經濟循環稍微開始轉到有利方向時，惡夢再度糾纏台灣的反體制一方。「掃紅」開始了。「四·六事件」因為發生在國共和談中，所以被捕者中有一百多名獲釋，十九名移交審判，數名被認定為首謀的人被執行槍決。據說就國府對中共鎮壓的歷史上，這算是比較溫和了結的。由於中共政權的成立與國府中央的正式遷台，政情的態勢立即一變。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自零時起，實施全省戶口總檢查。這是逼出可疑人物的初期作業

。五月二十日，全省宣告戒嚴令。並且，它居然到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為止，硬是持續了將近四十年。這只能說是名譽掃地的世界紀錄。

一九四九年以來，對岸向台灣所作的廣播，一直高喊「武力解放台灣」。因應緊急情勢而創設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規定①加強台灣入境檢查；②嚴重取締縱火破壞；③舉發與肅清中共間諜；④禁止與中共地區的電信往來等四項緊急措施。

儘管如此，據聞一般人還是把收音機拿進被窩（當時還沒有耳機），蒙在裡面收聽對岸的廣播。或許存心儘快得知中共對台灣的動靜吧。大致在同一時期，台北火車站大門前面經常張貼「匪諜×××業經槍決」的公告。人們只有一面抱著懷疑和不安，一面極力避免表露其心情，皺眉、嘆息而去。

從一九五〇年一月到七月，中共地下組織的舉發與被視為匪諜的人物的槍決，一直持續著。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人物卻獲得釋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事件：

五月十三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宣佈：舉發中共地下組織八十多個單位，逮捕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最高負責人蔡孝乾等。蔡於同月三十一日屈服，向全省人民廣播。他於一九八二年，在台灣病死。

六月十八日，陳儀以叛亂罪被槍決。陳儀於二二八事件後返回大陸，不久就調任為浙江省主席。據傳，陳儀在中共南下時，策畫仿照北京「和平解放」的前例，以不流血方式解放浙江省和上海，可是計畫洩漏，而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以意圖投靠中共的嫌疑被捕。陳於四月二十九日被秘密移送台灣監禁。

緊急狀態持續下去，掃紅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底，頻繁發生。又，根據國府特務機關的內部出版物《台共叛亂史》，在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被舉發後，潛伏的黨員們重建組織，從一九五〇年前後起，在中部山岳地帶建立根據地，但終被一網打盡。

以前，連口裡提起掃紅本身，也是禁忌。到了近年，政情才改變，當年的「掃紅的意義

倖存者」全體從火燒島（今綠島，以收容政治犯為主的流刑的孤島）釋放出來。像要配

合政治氣候的好轉似的，曾經是政治犯的作家陳映真，以獄中的採訪材料做藍本，在《山路》（收載於《陳映真作品集》）這篇小說中，描寫當時恐怖的情形。有人批判史實並不像在這本小說中所描述的那麼輕鬆，不過，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現在仍然處於非法之下。有關人員對當時的事情，依舊保持沉默。國共雙方的有關當局，只要「國共對立」還在激烈持續下去，也極少公開事情的原委，因而學術性的現代史研究遲遲不能推展。

然而，關於這中間的事情，大致可以說明如下：

第一，當局一方面進行掃紅，另一方面同時很巧妙地進行二二八事件的善後，是值得注目的。本省人關連者的相繼獲釋，相關事件審理終結的宣佈，與陳儀——被視為鎮壓二二八事件的元兇——的槍決，可以說是實施絕妙的以本省人為對象的人心收攬政策。當然，陳儀的槍決，在另一方面是針對外省人，尤其是軍政高官而作的警告，自不待論。

第二點可以提出的是：在台灣，抗爭也淡化了地域主義式對立的性質，以「上對付下」的階級鬥爭的冷酷，在民衆面前展開。病態的政治整肅的攻勢，廣泛到波及國府內部的軍、警、政界高官，其至於企業界的重要人、領袖。

在這段期間，假借掃紅名義而排擠對手，報復私怨等等卑鄙的行徑層出不窮，因而造成的冤獄也不少；民間至今仍然存有這種耳語。

掃紅的真相，並不明確。唯一明確的是：人性被扭曲，互不信任的人際關係和陽奉陰違的社會風氣，很快地蔓延到台灣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奉承和追隨得志的權貴的人則越來越多。在少數的知識分子中，也有試圖標榜「君子不近危」，而作沉默與隱遁式的消極抵抗的人士之出現。

姑且把掃紅看成國共兩黨以台灣為舞台的血腥的競賽好了。從四〇年代末期到五〇年代前半，尤其是在韓戰前後，國府權力正處於危機的狀況下。在緊急狀態下的權力，與世上的獨裁權力完全相同，不，應該說因為殘留著濃厚的封建體質，所以無暇注視事件的是非、真偽，只關心對共鬥爭的成敗。

這對懷抱開明心情的人們、無告的百姓來說，是難以忍受的不愉快的政治、精神季節。可是，只有冷酷的政治過程大模大樣地向前推進，而邁入一黨獨裁的道路。學會明哲保身之術的民衆，不知不覺地被迫屈服，新秩序與台灣中上階層的新型「共犯結構」於是慢慢塑造成形。

3 美國對國府的援助

蔣介石復總統職

政治，無論是國際政治也好，國內政治也好，經常在歷史上留下充滿意外的戲劇性痕跡。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的韓戰中，以台灣為中心的局面為之一變，就是很好的例子。

發表「對華白皮書」（一九四九年八月），一度甩開蔣介石的美國，隨著美蘇冷戰的激烈化與韓戰爆發所帶來的遠東情勢的劇變，慢慢轉變對國府的政策。此外，當時的蔣介石有相信以第三次大戰的爆發作賭注，可以趁機重返大陸的跡象。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下野，只不過是爲了重整自己的陣營與台灣的要塞化而爭取緩衝的時間而已。

除了國庫所存的金銀與外匯搬入台灣之外，還有一件值得注目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中能夠移動的文化財寶，幾乎全部都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上旬以前運進台灣。這些文化財寶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底，在台北市近郊興建完成的故宮博物院展示，從此成爲珍貴的觀光資源，是衆所周知的。有一種說法是：從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前半爲止，文化財寶被運用爲美援擔保物的一部分。但，沒有確實證據，真相不明。

兼任台灣省主席與東南軍政長官的陳誠，一手承擔國府中央的大陸撤退業務與在台灣重新、再度部署的指揮，效犬馬之勞。蔣介石重新對陳賞識，在遷台隨後，立即命他組閣，後來還重用爲副總統，由他統攬經濟建設。

取代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下野的蔣介石而就任代理總統的李宗仁，仍舊無法掌握實權，徒然東奔西跑。他也趁中共政權成立與廣州失守（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的機會，逃到香港

，隨後於十二月五日流亡美國。

蔣介石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排除流亡美國的代理總統李宗仁的反對而復職為總統。在這以前，不但遙控撤退的大業，而且也沒有忘記作人事部署，以便再度爭取業經中止的美援。

在「對華白皮書」公佈隨後，派遣唯一美國維基尼亞軍事學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出身的將軍孫立人，以陸軍副總司令帶職赴台，兼任陸軍訓練司令與台灣防衛司令二職。它的目標不外是謀求運用孫和美國的關係，尤其是和盟軍總司令部麥克阿瑟元帥的私交，與美國重歸於好。蔣在復職時，更進一步提拔孫擔任陸軍總司令的要職。

與孫的人事並行，任命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以取代陳誠。時在國府中央剛剛遷台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吳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在美國大眾傳播界素獲好評，這是國府高官中少見的情形。他曾任上海市長，透過其妻子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有深厚交情，是被美國的中國通稱為 K. C. Wu 而親近的文人政治家。

在同一時期，破格任命數學、彈道學專家俞大維為國防部長。俞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原是文人氣質的學者。抗日戰爭前夕，進入軍界，擔任了十二年的軍政部兵工署（兵器廠）

署長。這段期間，接受過英美爲首的聯合國方面的許多勳章。他是很有特色的自由派儒者，一直受到尊重。

以俞大維爲中心的獨特的人事安排，似乎不僅僅是對外而已。通常認爲與國府軍傳統派系的糾葛無關，是被賞識具有文人氣質，通達內外的教養、哲理，淡泊而廉潔的人品而作的任用。他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度離職，但於一九五四年五月再度入閣，擔任國防部長竟達十年七個月。在這段期間，據說以蔣經國「幕後且未被覺察的家庭教師」身分，發揮實質上的功能。他始終堅持超然的處世態度。即使在過了九十歲的最近，還有人評論他仍然在正面的意義上對台灣的政局保持隱然的影響力。

美國的援助與日華和約

「對華白皮書」發佈後，作一連串慘痛的敗退，勉強完成撤退台灣的國府中央，除了仰賴美國，別無他法。韓戰爆發，形勢丕變。美國第七艦隊美其名爲中立化，實質上卻從介入國共關係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起，防禦中共軍進攻國府台灣。

美國已經不能夠忽視支配不沉的航空母艦·台灣，擁有六十萬大軍的蔣介石的存在了。不但如此，就是在美國本身遠東戰略的執行與圍堵中共的作戰上，國府台灣也成爲不可或缺

的海上堡壘的一環。

美國重開援助。此外，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還主張在對日和約交涉（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簽署）中，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國府參加，而向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施加壓力。那時候，在美國參議院，國府遊說團仍然較強，麥卡錫主義的瘋狂整肅風（一九五〇年二月—五四年十二月）正在猛吹。日本如果不選擇國府台灣為講和的對象，美國就不會批准和約的氣氛甚濃。選擇部分性妥協途徑的吉田，向杜勒斯提出「與國府講和，但以國府有效支配地區為限」為宗旨的書簡。它暫時受到接納，日本於是從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開始，在台北與國府從事交涉。

國府台灣與日本雙方，從一開始，意願就不同。國府方面虎視眈眈，打算巧妙地活用美國以韓戰為轉捩點而高漲的反中共大陸趨勢。蔣介石使出渾身解數，把國府代表全中國的立場與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簽訂夾纏，以便透過美日關係，爭取國際上對他的存在的肯定及外交承認。

吉田當然不願意承認國府本身為全中國的代表。因為他預見未來的國際關係，希望先打通與中國大陸的交道。拿與杜勒斯的妥協案做主調，日本方面堅持不讓。美國參議院看到在

台北進入交涉，就放心下來，於三月二十日承認對日和約，並預定四月二十八日生效。國府與日本在台北的折衝，拖延不前。日本方面倚仗四月二十八日這個和約生效預定日而堅持其主張，國府代表則固執自己的立場。最後，國府讓步，而於四月二十八日簽署。對國府而言，這真是一個緊張萬分的交涉場面。

日本與國府的和約，本來是以「局部承認」——也就是不涉及及中共所支配的中國大陸——的形式擬訂的。它漸漸變成似乎也能適用於全中國的形式，乃是透過日本自民黨政府在日本國會的答辯。用簡單的一句話，是以艾森豪、岸信介政權共演的「美日新時代」（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岸信介訪美時的共同聲明）為時代背景而逐漸成形的。

值得記憶的是：岸信介首相在訪美前夕，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啓程訪問東南亞六國，更於六月二日排除中共政權和日本大眾傳播主流的反對，斷然進行首次的訪問台灣。以日本首相地位，在戰後首次訪台，所代表的意義，相當重大。

倚靠韓戰，國府才能以台灣為舞台，抓住重生的契機。假如沒有韓戰，恐怕也不會有美國對台灣海峽的介入，並且也不會把對日和約與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搭配，而那麼匆忙地締結日華和約（以後使用「華」字為國府台灣的簡稱）；這是不難想像的。

歷史是要探究的，「假如」是禁忌；不過，建立假說來馳騁想像力作些遊戲亦未嘗不可，且該是挺有趣的。往往會有人半開玩笑地指摘：「說起來，是毛澤東不好。假如他不在北京宣佈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仍然承繼孫文的中華民國，抑或新稱中華民族共和國的話，海峽兩岸有關國號的爭議也就不致發生或搞得如此混亂了。」

台灣以蔣家為中心的國民黨一黨專制之支配機制，於是添上各種各樣的變化色彩而確立下來。

4 一黨專制的確立

尼克森的回顧

「右也罷左也罷，反正是我的祖國」（喬治·歐威爾）；「北也罷南也罷，反正是我的祖國」（留日朝鮮人作家·李恢成）。外國作家曾作過這種快刀斬亂麻式的表態。做為台灣出身的中國人的一分子，也想依樣畫葫蘆地說「大陸也罷海島也罷，反正是我的祖國」，該是在今天這個時期的氣氛所釀成的。

把中國近現代史比方做一枚銅板好了。起初，正面是國民黨和蔣介石，反面是中共

澤東。以一九四九年爲界線，銅板的正反面被顛倒過來了。原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把這中間的經緯，加以歸納如下：

過去半個世紀間，中國的故事大半是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這三個人物的故事。

當被毛追趕的蔣，跑到台灣，中共制壓在中國本土之後，就把毛蔣的鬥爭說得簡直像上帝與魔鬼的戰爭一樣。毛澤東本身就曾經把自己比方做活在兩千年前的秦始皇。個人崇拜把他捧到接近上帝的地步。在這段時期，周躲在毛的影子背後，忠實地包辦實務。逃到台灣的蔣，雖然採行獨裁，卻不像毛一樣著迷於個人崇拜，一面保持威嚴而致力於實現台灣的經濟奇蹟，一面繼續給國民反攻大陸的希望。（《何謂領袖》，LEADERS By Richard

Nixon, Warner Books, Inc., N. Y. 1982）

讀過該段文字的原國府軍的某將軍說：

尼克森歸納得很好。此外，對毛、周、蔣等中國政治人物的瞭解，也在該書的有關

描述提供值得閱讀的內容。不過，可惜有許多地方簡直不懂得我們中國人的感情。尼克森說「繼續給國民反攻大陸的希望」，但這並不是事實。蔣介石自己沒有放棄反攻大陸的意願，也許是確實的，可是對他在一九五〇年三月總統復職時所標榜的「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認真接納的人幾乎沒有。當時的我們，首先爲了要生存下去，就已耗盡全副精力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一方面用口號虛張聲勢，另一方面還要耍弄權謀術數，在非常綿密的盤算之下，固執地追求家長式個人崇拜的確立。共產主義者的毛，可以用沒有血緣關係的周做好幫手，但蔣介石只肯相信兒子經國。是不是因爲蔣是陽明學的信徒而產生的侷限呢？就像尼克森所批評的，蔣是政治、軍事的戰術上天才，但並沒有具備戰略家的格局與氣度。這且不說，尼克森談到台灣時，曾談及宋美齡，但對蔣經國卻隻字不提，令人費解。

蔣介石的課題

一九二六年開始北伐以後，蔣介石一面逐漸在國民黨內的軍事層面確立權力，一面在短期中贏取盟主的地位。然而，就像許多有識之士所指摘的，那是缺少實質內容的、名義上的地位而已。

毛澤東的確把中國大陸統合爲一。姑不論對還是不對，以毛爲中心的「上帝」式的個人崇拜能夠成立一段時期，似乎正足以證明這一點。相形之下，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意願，雖然強於國民黨內的任何他人，可是並未成功。不要說國民政府，連國民黨，直到遷移台灣時爲止，蔣自己也還無法整合。在中國人社會，這種看法是常識。因此，在遷移台灣時，對蔣以領袖地位被迫面對的國府而言，最大的課題涉及許多方面。

從西安事變的張學良、以中共間諜案被羅織的孫立人（後述）等受三十年以上的軟禁，又前面所提的槍決陳儀的事例等，就可以看出，蔣對政敵，是徹頭徹尾冷酷無情的現實派。連他的反對者都估量：他憑藉在大陸上的失敗和長期的體驗而產生的對自己在權力主體中定位，與配合定位的洞察力，可以說出類拔萃。

復職的蔣介石，連喘一口氣的時間也不曾有。因爲他所倚賴的特務機關「軍統」、「中統」雙方出現不少叛徒，在大陸上根本無法對抗中共。此外，一般將士向中共方面「投靠」，則是舉不勝舉。從一九四八年後半到四九年前半，硬是不得不深深體會慘痛的挫折感與失敗感的，大概只有蔣介石本人吧。

蔣氏父子的專制體制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台北設立了叫反蔣派心寒膽顫的「政治行動委員會」。該委員會是相當於國府中央政治保衛局的秘密組織。

另外，在公開場合，則以「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名義活動。蔣經國起初以一名委員身分，和父親密切聯手而掌握全權，兼辦對來台人物的審核，開始重整國民黨中樞的權力。他當時正值四十歲的壯年。

翌年，經國堂堂就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要職。按照國府傳統式的想法來說，經國輩份太輕，黨歷、軍歷都淺。理所當然的，元老級的前輩們，內心頗有不平，但他們保持了沉默。蔣介石跟毛一樣，畢生徹底認識「槍桿底下出政權」的道理。蔣經國所以要就職為總政治部主任，終局的目的是在於透過「政工」來完全掌握軍隊。第一課題——「整軍」，正式實施了。

其次是「整黨」。大家都知道，蔣介石把大陸時代的黨務，多半付託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所謂 C. C. 強勢派系，在把持黨。然而，在中共的攻勢之下，它竟脆弱地垮掉了；因此對陳氏兄弟的責任，追究得相當嚴厲。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於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成立，經國也名列委員：在一九五二年十

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則升任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在這段時期，C. C. 的勢力被大大削弱；一九五一年八月，陳果夫病死。弟弟立夫留下病危的哥哥，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被委婉地放逐到美國而流亡了。

重整特務機關並完全加以控制，對蔣介石而言，是迫切的課題。透過「整軍」與「整黨」，經國培養了實力，累積了經驗。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蔣介石趁重返總統職位的機會，把前述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升格為總統府資料室，命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兼任該室主任。這是謀求特務情報工作一元化的人事安排。

軍統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中統把一部分劃歸中央黨部第三組（今海外工作委員會），後來又把它的一部分劃歸大陸工作委員會，其餘則編入新設的內政部調查局（後改制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今法務部調查局）。

在最後階段，總統府資料室把與國府中央遷台同時秘密設立的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併入，而成立國家安全局。掌握它的全權的，不用說，是蔣經國本身。經國從一九二五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三月為止，留學蘇聯；他似乎沒有浪費受蘇聯共產黨和史達林的洗禮的經驗。他不但創立組織，而且沒有忘記充實組織，就他而言，裝進新瓶的並不是新酒，而是新血。

覬覦皇位寶座的危險

蔣經國下令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在台北近郊北投的復興崗開辦「政工幹部學校」（今政治作戰學校），謀求培養他所寄望的新血，也就是新人材。或許可以說是在模仿父親介石開辦黃埔軍校以便鞏固權力的故技吧。缺少軍歷的經國，確實透過「政工」來設計掌握軍權的方式，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蔣經國又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掌握中學以上的學生這股新血，控制他們的精力，編進自己的體制，以圖建立經國自己追求的新體制所最需要的人材管道。

這也可以說是看怕大陸時代的學生運動，而設計的搶先制敵的作法。暑假中集合青少年，舉辦軍中生活、營火、體育活動、文藝營、金門馬祖船艦旅行等等。尋求刺激的一般青年，當然喜歡參加。活潑而「腦筋好」的青少年，不分男女，都被發掘並勸導加入國民黨，巧妙地被引進支持體制的預備幹部的道路上。

救國團由於它的不民主的形象，加上它也是法制外的所謂「黑」組織，所以被自由派和擔當財政的行政官僚們不停地提出抨擊和抱怨。然而，大概是因為深知「越能夠控制青年的人，就越能夠控制下一個時代」的原理吧，經國腳踏實地奉行「最後笑的人笑得最精彩」的

格言，完全不把有識之士的批判放在眼中，而在「我的路」上邁進。

與國府中央一起進入台灣的國府元老和將軍們，或許好好讀過宋代的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吧，洞察並預見蔣介石父子意圖的人，深知「覬覦皇位寶座的危險」，因此認為幹好「被安插的」職位，才是唯一且最高的處世要訣，因而克制自己。這樣，以蔣氏父子為中心的國民黨一黨專制機制的基礎，就鞏固起來了。時在五〇年代前半。其中，最克制自己的可以說是陳誠。陳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任行政院院長，從一九五四年三月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病死為止，任副總統等要職。可是，並沒有實權。他深深洞察「覬覦皇位寶座的危險」，於是招集技術官僚與學者們，全力從事經濟發展政策——包括農地改革後的農業開發和工業化政策——的策畫與實施。在這段時期，他以經濟界為中心，與上層的本省人士，也就是台灣人，深相結納。

第六章 「經濟奇蹟」之路和代價

1 經濟奇蹟的實像與虛像

台灣的經濟「奇蹟」

一九七〇年代末，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收場，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經濟的落後也對外彰顯了。與大陸對比起來，人們近年把台灣的經濟成長稱爲「奇蹟」，讚賞爲亞洲 NIES（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地區）群的高材生。

足以證實上述情形的數字如下（金額：美元）：

- (1) 一九五二—八六年的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是八%強。
- (2) 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從一九五〇年的五十美元劇增到一九八七年的約五千美元。美元貶值，新台幣升值的現況，預定還會持續下去，因此換算成美元的金額應當還會更高。

(3) 截至一九八七年底，台灣的貿易總額是八百八十億美元，在世界貿易總額名次中列第十三位。外匯存底超過七百六十億美元，僅次於日本、西德，目前高居第三。

台灣地區以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總人口一千九百五十萬人的規模，而擁有上述的經濟成就，並且能夠保持大幅的貿易順差，因此的確不愧為「奇蹟」。

只知道七〇年代以前的台北的人，假如去訪問最近的台灣，想必會被它的變化幅度弄得眼花繚亂吧。大樓的叢林，汽車的洪流，高級旅館幾乎住滿了以日本人為主的外國顧客，林立的餐廳通宵生意興隆，在鬧區遊逛的年輕婦女時髦而脫「俗」。

五〇年代初，被認為隨時崩潰也不足為奇的國府台灣之社會經濟，居然能夠歌頌這種富裕，誰又能預想得到呢？

台灣經濟的成長與變化，尤其以最近十年間最為明顯。無論古今東西，急劇的變化，總要伴同「虛像」和「陰影」的。台灣自不例外。甚多人士認為台灣在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裏面，該算是國民所得的重新分配最為均衡化，居民各階層間的所得差距最小的。在數字上，確有足以支持接近上述狀態的依據。不過，許多有識之士又表示：在日常生活的實際體驗上，頗有無法適應的感覺。

另一方面，社會問題仍舊很多。在戒嚴令下，麻藥犯罪只有偶爾發生，可是現在，走日台路線的麻藥犯的舉發，為大眾傳播頻添新聞。黑道幫會在這些犯罪的背後撐腰。色情業不在乎羞恥，不顧體面地在街上橫行。娼妓一點也不會減少。也許可以說，在台灣的特殊政治情況下，地下經濟增高比重，因而呈現無果花式的活力吧。看一眼就可以馬上知道，旅館餐廳的僕役、女侍中，青年工人所佔的數目異常地多。是不是現代性的製造業、營造業和服務業無法完全吸收這些青年工人呢？這未嘗不能看做就業結構依然保持舊態的反映。

對美貿易順差

政府當局得意揚揚地發表外匯存底的總數，用來誇示台灣經濟的強勁。可是，關於數字的細節、存款處、運用的具體內容等等，卻始終藏在「黑盒子」裏。這數字對台灣經濟來說，不是太大到超出常識之外嗎？不是不當的數字嗎？看不透的運用方式不是不民主嗎？諸如此類，人們心存疑問。

這裏試舉對美貿易順差，做為典型的最近事例。一九八六年底的一百三十六億，在第二年，一九八七年底，劇增到一百六十億。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以G5（先進五國財長及中央銀行總裁會議）的紐約廣場共同聲明為契機，開始升高新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到一九八七年底為止這段期間，竟升高四一·八%。儘管如此，並沒有牽連到所預期的對美貿易順差的減少

。不可或忘：在這順差的背後，有台灣產品零件的約六成強（包括日本本國或合辦企業的產品與專利使用費給付）靠日本的供給來維持這項事實。在對美出口突增的反面，來自日本的進口與企業投入雙方在同時突增與進行，這或許足以證實而有餘。用淺近的話來說，就是本來應該算進日本的順差帳目的數字，被轉嫁而計入台灣的帳目。有識之士指摘：「奇蹟」的對外性的虛像之一，可以在這裏看出來。

無論如何，具有獨特的政治經濟性質，依舊帶許多不透明部分的台灣經濟，是難以理解的。不過，只有一個沒有疑問的事態，目前正在進行中。光復以來，不管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台灣居民多半一直把收藏「黃金」和美元當做保衛生活妙方的一部分，信而不疑的視它為預防通貨膨脹的自衛手段。面對新台幣一連串的升值，人們驚惶不已。手上的美元一天比一天貶值的事態，在台灣是從未有過的。藉此為轉捩點，台灣中上層的人們重新發現新台幣的價值，開始對台灣經濟的潛力寄予一些信賴，真是饒富趣味。今日台灣經濟這樣的規模和潛力，究竟是在怎樣的過程中形成的？使它變成可能的條件到底是什麼？以下試加簡述。

成長前提的特殊情況

要把台灣經濟的成長過程以及使它變成可能的條件，加以客觀的整理，作合理的說明，未必是容易的事。說起來，要把台灣當作一個國家，來跟第三世界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討論，頗有困難。這不外是由於情況複雜而且特殊。構成經濟成長前提的特殊情況究竟是什麼？

前文已經提過，根據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台灣在政治、經濟兩個層面上，以從中國大陸切斷的形式孤立起來，而就此被日帝殖民地化。殖民地宗主國日本，始終把台灣當做自身資本主義發展的外延性的存在，而加以支配運用。它的基本構圖是「日本的工業，台灣的農業」。

殖民地化的目的，當然在於謀取高度的殖民地利潤和確保台灣為南進基地等等。所有的殖民地政策與在台灣的投资和設施，都是為了孝敬日本帝國主義的需要，而非替居住在台灣的被殖民化的人們，也就是台灣島住民著想，是不證自明的。此外，投資的資金，初期的大約十年間另當別論，到殖民地支配機制上了軌道以後，都在台灣內部籌措。當年的日本當局誇示台灣財政的豐裕而作的發言，記憶猶新。

總之，經過五十年的殖民地支配的結果，留下了不少的基本設施、行政組織、從小學到

中等教育（特別是有關農業的職業教育）等等「成果」。尤其是下列各層面上的殖民的「遺產」，對國府體制在台灣的重建，發揮正面的功能。

農地改革成功的主因

在殖民地化的過程中，經整編而確立的戶籍與地籍，具有重大的意義。國府當局根據明確的人口統計和戶籍制度，印發國民身分證，幾乎以近於完善的形式，掌握住了全體居民。這在大陸時代的國府而言，是根本無法想像的事。這對治安的維持，特別是對中共地下活動相關的來自大陸的滲透，有事前防止與事後舉發的功能，也可以用來實施徵兵制度。事實上，國府當局把它善加運用，提高對本省人治安對策的效果。附隨當局進入台灣的外省人，也編入同一系統，加以管理。

地籍，也就是以土地的所有權關係為核心的土地制度與土地底帳的存在，是使從三七五減租開始的一連串農地改革變成可能的最基本條件。我們不可或忘：以國府政權的階級性來說，能在台灣順利實施農地改革，除了地籍明確存在之外，還要靠下列四個主因：

(1)當時，國府決策中樞的人物中，沒有一個在台灣擁有農地。個別擁有土地的地主，全部都是本省人；因此對國府而言，農地改革可以說是借別人的膝蓋搓繩子——片面包賺的差使。本省人地主階級對它的不滿，後來成爲台灣獨立運動能源的一部分。

(2) 由上而下的農地改革的執行，非靠強有力的權力在背後推動，是不會成功的。我們似乎應該認為：國府中央權力在台灣的重整與一元化，不但在軍事層面，而且也在以農地改革開始的民生層面發生作用（附帶說明，我無意在此全面肯定且辯護國府中央的存在與權力在台灣地區的行使，筆者意在史實過程的客觀描述）。

(3) 台籍地主由於二二八事件所遭受的挫折，與模仿日本而實施農地改革的宣傳，不情不願地被迫同意農地改革。他們縱然有時發牢騷，卻很少公開唱反調。能在不遭受抵抗的情形下實施，對國府當局而言，該是難得的幸運。

(4) 國府當局處於非爭取台灣農民的支持不可的緊急情況。因為他們被迫面臨①確保隨同官民的大量移入所需的糧食；②記取大陸敗退教訓的重要課題。

拉攏農民，透過農村安定的保持，做為對付中共滲透的防波堤——這種農地改革，迅速實施。在這一點上，國府和美國利害相同，意見一致。美國派遣參與過日本農地改革的著名白俄裔美人吳爾夫·拉德辛斯基到台灣來。又透過美援預算，提供實施農地改革所必需的行政費用，加以支援。

農地改革大體上的成功，對日後經濟的安定與成長大有貢獻。解救國府中央遷台時財政

的窮困的，是公賣收入與林務局經手的出售林產物（特別是木材）所得的收入。公賣收入的重要性，是自從後藤新平時代以來，可以透過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全部期間而確認的。事實上，陳儀的政策也要把它連繫到光復後的財政政策，加以運用。在「出口大國」化之前，截至七〇年代前半爲止的台灣財政上，公賣收入所佔的比重，依舊不可輕視。確保與利用林產物的收入變成可能，是因爲台灣的林野隨著殖民地化而幾乎全部收歸國有，光復後可以把它當做國有財產而接收並確保以及運用。對國府當局來說，可以運用的龐大財源已經存在，極爲有利。

此外，在初期外匯收入方面，重心在於台灣糖業。由於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不准許只有台灣籍人士的公司經營，所以儘管糖業關係企業有少數的台民股東，但可以說將近一〇〇%是日本人的企業。因此，在接收後自動地成爲國、公營企業。姑不論經營效率如何，戰爭結束後世界糖價的好景，對國府五〇年代的外匯收入大有貢獻，是統計數字所明示的。

2 原日本軍人對國府的協助

原日本軍人的回想

從殖民地解放後的建國情況，台灣與一般的開發中國家，頗有不同。多半的情形是：原來的被殖民者針對殖民地的遺產，一面夾纏民族的階級的利害和意願，一面互相爭奪領導權。然後一再重覆嘗試與調適，而向建國之路邁進。

從殖民地支配變成自由之後的台灣，是特殊的。向原來的國家也就是中國回歸和同一化，才是當時被意識到的主要課題。本來的被殖民者——本省人，追究起來，從一開始就沒有希求成爲解放後建設主體的明確的問題意識。這也許是由於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得到的解放，所伴隨的脆弱表現吧！

從殖民地獲得解放後，以事後處理的第一階段，進行由國府非當權派陳儀一夥主持的接收，因爲二二八事件而遭受悲劇性的挫折，前文已有交代。在它的創傷還沒有完全癒合的兩年後，第二階段就開始了。當國府中央遷台時，國府人士並不把殖民地解放後的事後處理當做最根本的課題來理解和處理，而寧願把重點放在如何防止在大陸落敗的自己的政權崩潰。在本省人與國府人士之間，這種意識上的隔閡很大。希望預先確認的是：自從光復以來，國府有關人士就掌握台灣殖民地解放後的事務處理的實質領導權，而本省人始終只充任配角。

我們在前一章談到蔣介石父子的整黨與整軍。而在整軍的過程中，借用舊日本軍人的力量的史實，是值得記錄的。其中的一名，原「支那派遣軍」參謀（中校）小笠原清，用後日談名義，在日本的《文藝春秋》雜誌一九七一年八月號留下〈拯救蔣介石的日本軍官團〉一文。

據小笠原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日本人軍事顧問團「白團」的成員，從日本起飛到中國大陸的重慶，面謁已經下野的蔣介石。隨著國府中央遷台，日本人軍事顧問團首次抵達台灣，是在第二年，一九五〇年初春。他們在興建於台北近郊圓山公園附近的圓山訓練所，對一百多名從大陸敗退到台灣的國府軍的指揮官級軍官，重新施以訓練，灌輸自信和信念，試圖賦與再起的力量，好讓他們重新出發。

白團第二期的工作，為新添部隊訓練與野戰兵訓練的業務，而它的人數，到一九五一年夏天前後為止，也成為八十三名的大戶了。在北投前面新設石牌訓練所，做為訓練指揮官的場所；另外，在台北稍南的新竹縣湖口訓練所，成立相當於舊日本軍兵科學校的示範演習師。此地召集中級野戰兵指揮官，訓練野戰兵的指揮，同時製作各兵科的操典，以謀求重新確立部隊鍛鍊的基礎。

一九五二年夏天起，進入第三期。關閉湖口訓練所，集中在石牌，開辦相當於舊日本陸軍大學、海軍大學的長期高級班，以軍長、師長或軍團參謀長級為對象，實施教育。又開辦短期中級班，以軍團的參謀和團（旅）長級為對象，謀求提高作戰能力。這項訓練，持續到一九五三年底光景。此外，這一年創設秘密機關——富士俱樂部，做為白團的後方支援部隊。它配合白團第三期以後的活動，以有關戰史、戰略、戰術的研究與資料的蒐集為主要任務。

日華和約生效後，白團的活動也持續下去，施行正式的高級指揮官訓練，到一九六四年為止，才大致結束。有一部分人員仍舊擔任未了業務的整理與國府軍教官的顧問，在台灣停留到一九六九年。

日華間的「看不見的力量」

我們可以從小笠原的回顧得到許多啓示。當蔣介石重建軍隊時，一方面從美國求得兵器等軍事援助，一方面委任美國留學出身的孫立人將軍統轄一部分以士官和列兵為對象的美式在職訓練。然而，只要從白團的活動來看，顯然，重建的真正內容是日式；而蔣真正信賴的，則為日本的軍事顧問團，而不是美軍顧問團。

由於「對華白皮書」的慘痛經驗，蔣介石認定向美國一面倒的危險而自我戒懼，是可以充分推想的。當然，蔣從日本陸軍士官（士官即軍官）學校留學以來的交往，對原日本軍當局者搭得上人際關係。蔣判斷：當時的日本軍的殘餘勢力也好，日本政府也好，既不可能又沒有能力出賣他，併吞他。

幸虧包括日本的原軍人在內的日本保守系領袖階層，對蔣介石戰後當時「以德報怨」的談話，感恩戴德。加上蔣對白團的受託盡力，經由駐在東京的大使館的管道，支付包括薪資在內的報酬，待以至禮。此外，對白團背後的岡村寧次大將等人——戰敗隨後臉上無光、生活困窮——的生活，從物資層面加以支援。這樣一來，陷入困局的原日本軍人的上層，對蔣介石更深一層地感恩戴德，而滋生向他報恩的意氣；這可以從小笠原的文章的字裏行間充分領會。

共同擁有反共意識型態上的基礎，再靠日本式「義理人情」加強的蔣介石集團與舊日本軍人集團兩者間的關係，這一來，堅固得超出想像，它搭建日後日華關係的大架構，成爲支持日華關係的主要基礎。冷靜地注視白團進入台灣以後日華關係的推展，我們就可以明白：以白團爲核心的日本原軍人和保守系政界、財界領袖階層，一面發揮「看不見的力量」，一

一面很快地形成日本台灣遊說團的一大勢力。

在日華和約的交涉中，以白團為核心的「看不見的力量」究竟有無影響，並不清楚。不過，當日本由於舊金山和約生效而獨立以後，如果聚集在白團和富士俱樂部的人物們在袖手旁觀，到底是叫有識之士無法想像的。特別是在岸信介政權成立（一九五七年二月）後，自民黨內形成台灣遊說團，巧妙地利用美國的「保護傘」，而行使無形的政治力量的軌跡，直到現在，還是明顯的。他們從五〇年代中葉起，漸漸出現，成為日華經濟合作事業初期的主要搭線人。

如上所說，蔣介石原以「整軍」為目的，而借用舊日本軍的力量，但它隨情況的進展，而發生意想不到的政治、經濟上的效果，逐漸鞏固日華關係。還有，蔣在整軍的過程中，漸漸淘汰沒有實力的將軍，起用少壯的彭孟緝為圓山訓練所所長兼連絡負責人，使他威震同儕。

吳國楨與孫立人

另一方面，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艾森豪就任美國總統；次日，杜勒斯就任國務卿。二月二日，艾森豪以國情咨文發表台灣中立化的解除。

隨著美韓協防條約的簽署（一九五三年十月）、美日協防互助協定（安全保障條約）的簽署（一九五四年

三月，美華共同防禦條約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在華盛頓舉行簽署。

杜勒斯等美國當局真正所希求的，並不是由蔣介石一夥繼續支配台灣，而是台灣親美派的抬頭，美式民主在台灣의 實踐，並藉此把台灣要塞化。此際，吳國楨、孫立人等親美派政治家和將領，對美國來說，是難能可貴的橋樑人物。

蔣介石自從國府中央遷台以來，就培養陳誠和彭孟緝爲右車輪，吳國楨和孫立人爲左車輪，來實施重建政策，可是蔣介石和特務機關負責人蔣經國，與這些政治家和將領之間，開始發生矛盾。

據吳自己說，他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起擔任省政府主席，但與蔣經國衝突，以眼看就要被暗殺爲主因，於一九五三年三月辭去省主席，五月二十四日流亡美國。又，孫立人以部下中有共產黨間諜，武力政變計畫在事前遭受舉發的理由，於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被免除總統府參軍長職。此後，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春，被軟禁在台中，行動極端受到限制，竟達三十年以上。然而，什麼武力政變計畫，根本出於憑空捏造，如今已經在台灣成爲常識。

在這樣的過程中，蔣介石集團就驅逐他們認爲可能變成反對勢力的老親信，美國的期望於是落空了。要明究這中間的真相，似乎還需要更多一點時間。無論如何，遷台以來，以邁

向蔣介石一夥一元性權力的統合與集中的熱場戲，因吳、孫事件的了結而暫時閉幕。於是，以蔣家為核心的一黨專制機制，更進一步地固定化了。

3 經濟發展的台灣式特性

農復會與美援會

有關台灣的實證性歷史研究，由於政治上的禁忌甚多，而顯得越發廣泛落後。在對國府蔣政權的在外一般不良形象的影響下，不證自明地把台灣政治單純地解釋為以蔣介石、蔣經國二總統做尖頂的金字塔型的整體性統治結構，這種看法居於優勢。此外，性急的駁斥往往搶先，而冷靜地從社會科學的立場追究國府·蔣政權的實態，與蔣氏父子在台灣戰後四十年的歷史發展中究竟發揮什麼樣的功能，並客觀評估該佔什麼樣的歷史地位的，實在太少。

下面將對隨同國府中央遷台而附加的經濟發展的台灣式特性加以闡明。重新鄭重聲明在前：我無意肯定國府台灣體制的一切，我打算嘗試的是冷靜地、客觀地探究國府中央遷台後有關經濟上的發展的特性以及它的過程和結構，並加以解釋。首先，就國府中央的遷台引起

何種情況試加整理：

包括六十萬大軍在內的大陸外省人的遷台，台民通常多半平板地當作惡劣形象加以觀察。六十萬大軍在台灣民衆的眼中，只顯得是殘兵敗將而已。不過，這支大軍居然以韓戰的爆發爲契機，發揮引進美國軍事、經濟援助的功能。這假如不是歷史的弔詭，又是什麼呢？

從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前半，以接受美援單位大事活躍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農復會）與美援運用委員會（美援會），排除傳統式的牽親引故作風，徹底執行破格高薪的能力本位人事，頗享盛名。還有美方的嚴格要求與疑似夾帶內政干涉的審核，也是遠近皆知的。

話說，靈活運用以農、工業爲對象的美援，從事經濟計畫的執行的，清一色是歐美留學歸來者。他們也爲了工作的一個權宜手段，聲稱是美方的「意向」，而巧妙地使用美國做藉口。這是爲了擺脫軍、黨、政，尤其是以特務機關爲首的保守勢力的負面干涉，而使用的。

經濟政策的變遷

簡單地追溯以美援爲背景而展開的經濟政策，是這樣的：

從一九四九年到五三年之間，以農地改革爲支柱，謀求農村的安定與農業的重建，首先鞏固農業近代化的基礎。其次，以糧食的確保爲主調，靠推廣與輸出商品作物所得的外匯，支援工業化政策。

農地改革與農業生產上了軌道，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也開始發生作用，是從一九五三年前後才開始的。這時候，以美援為強有力的槓桿的四年經濟計畫，相繼移付實施。第一次在一九五三—五六年，第二次在一九五七—六〇年，第三次在一九六一—六四年，始終連續下來。正好以進入第四次四年計畫的一九六五年六月月底為期限，自從一九五〇年以來，一直強有力地支持台灣經濟的美國經濟援助，決定停止了。補償因援助停止而短缺的一部分外匯收入的，是日本政府的一億五千萬美元之日圓貸款。該協定於美國停援預告中——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簽訂。從此以後，日本與台灣經濟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了。

或許是預期到了一九六四年度，工業部門的生產值就會開始超過農業部門吧，當局喊出「在今後十年內，積極將經濟結構，從以農業為主體轉移到以工業為主體」的口號。這樣，「十年長期經濟發展計畫」與第四次四年經濟計畫同時移付實施，而邁向更積極的工業化途徑。

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從五〇年代以來，擔任農地改革與經濟計畫總管的副總統陳誠，因肝癌去世。就像排擠吳國楨和孫立人一樣，蔣介石也一直在奪取陳誠的實權，所以陳並不得志。他是代表被美援所支持的台灣經濟時代的人物，不過，他的死剛巧在援助停止前夕

，令人預感舊時代的收場與新時代的開幕。

蔣介石不僅是從陳誠手裏奪取軍事、政治的實權而已。他也不許陳介入以中央銀行爲核心的金融財政界。軍、特務機關與金融財政是政權的命脈，站在蔣介石的立場，自不能輕易交給自家以外的人。金融財政界始終把持在以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爲首的所謂「官邸派」手裏。

蔣介石對權力的掌握

現在才看得清楚，蔣介石在形式與實際兩面，大致能夠完全掌握一元性的權力，是在一九五四年。

蔣介石就職第二任總統，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陳誠同時就任副總統，行政院即被改組。受命組閣的是對國庫所存金銀和外匯轉運台灣有貢獻的原中央銀行總裁，繼吳國楨之後擔任台灣省主席（一九五三年六月—五四年六月）的俞鴻鈞。蔣介石趁這機會，創設超出憲法規定之外的國防會議，自行統轄，做爲實質上的中央決策機關。他又任命蔣經國爲該會議的副秘書長，一面使他以輔佐職名義揣摩帝王學，一面也讓他兼任實質上的監督職。

蔣介石讓經國掌握軍、特務機構加上青年學生，把金融與財政交給官邸派，經濟計畫和農業問題還有收攬本省人上層資產階級人心的任務則付託陳誠，如此各自分擔，似乎企圖一

面嘗試分割支配，一面收取統合與協力的實效。

有關掌握政權的關鍵範圍內，蔣介石、經國父子是徹底的現實派。他們雖然一直標榜孫文與三民主義的意識型態，但真心且不顧體面而實施的，卻是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成長政策，是以吸收外資爲主調而推行的由上而下的工業化、近代化。

七〇年代的經濟成長

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透過以保證從外國所作的投資爲目的的外國人投資條例（一九五四年公佈，八三年五月、八六年五月修正公佈）與華僑回

國投資條例（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的制定和施行，大幅引進外資（包括華僑投資）和外國技術。進入一九六六年後，爲了有效運用以日本爲中心的各先進國勞力市場結構上的改變，而在高雄設立加工出口區（一九七一年又在高雄的楠梓與台中增設），誘導外資系廠商的投入，以求達成勞務輸出與技術引進移轉的一箭雙鵰的目的。

在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

）這些接踵而來的外交上的挫折與衝擊之下，蔣經國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就任行政院長。他推出「十大設計畫」，做爲經由經濟層面的起死回生策略，從一九七三年度到七八年度之間，不顧一切地實施高達五十億美元以上的大投資計畫。

常聽到目睹計畫的具體實施情形的台灣中上層階級，放下不安的心情，決定留在台灣之類的編造的故事。那且不管，其實使他們留下來的原因之中，中共在大陸的失政該算一個，因為文革的悲慘失敗，人們判斷中共軍隊目前還不可能搞武力解放台灣的行動。

十大設計畫生產層面的兩齣重頭戲——一貫煉鋼工業（中國鋼鐵公司）和石油化學工業（中國石油公司），從一九七〇年代後半起，就能自力供給原料與中間材料，相當了不起。這是由於經過整個七〇年代的出口加工業的快速發展，塑膠、合成纖維用石油化學原料以及機器造船用鋼材的需要大量增加的緣故。

另外，以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而實施的①桃園國際機場（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啓用）；②南北高速公路（基隆——鳳山間的三七·三·四公里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完成）；③基隆——高雄間縱貫鐵路電氣化與雙軌化計畫（一九七九年七月完工）；④北迴鐵路（蘇澳——花蓮間的八八·三公里）的新建（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正式開業）；⑤台中港（將原來的漁港升格，闢為國際港，一九八二年六月完成）；⑥蘇澳港（接近基隆港，擴充整建為其姊妹港，一九七九年六月完工）等的相繼完成與運用，使整個台灣經濟產生活力，變成一個以高效率循環的有機體。

靠穿過美日經濟循環間夾縫的方式穩住地位的台灣出口加工業，以不亞於日本的高明手

腕克服了第一次世界性石油危機（一九七三年十月），推出纖維、電機、化學三部門的各種產品做主力，大量增加出口。

貿易上的出超趨勢，從一九七一年的二億一千六百萬美元開始固定下來。可是，因為第一次世界性石油危機的影響，一九七四、七五兩個年度留下一時性的入超記錄。此外，自一九七六年度的五億六千七百萬美元以後，連續出超，一九八六年度居然出現合計達一百五十六億美元的驚人的貿易順差。

八〇年代的台灣經濟

進入八〇年代以後，台灣除新的四年計畫（一九八二—八五年）外，又同時制訂以一九八〇——八九年為期的十年計畫，做為長期計畫，並交付實施。該計畫打出「引進高度之技術工業與科學人材，獎勵工業技術之研究開發，並促進高度技術之發展」的口號。在新竹，為響應該計畫，已創設科學工業園區，積極謀求振興高科技工業與吸引外資。目標當然在於向節省能源、技術密集型工業轉移。

由於第二次世界性石油危機（一九七九年六月）的影響，一九八一年度和八二年度的經濟成長率分別暫時性地減緩為五·七%和三·三%，但靠美國經濟的景氣恢復而再度轉趨擴大，一九八四年創下一〇·九%的記錄。

到了一九八五年，美國經濟的景氣蕭條所引起的出口停滯，因金融制度的前近代性和疏陋而發生的「十信案」等包庇呆帳的醜聞，信用不穩和政情不安疊合而影響到國內投資的低落，於是台灣經濟瀰漫空前不可測的陰雲，成爲艱苦的一年。經濟成長率再度下跌爲四·七三%。

面對不景氣的台灣經濟，「神風」從日本吹來。自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的G5以後，在日圓升值、美元貶值的主調的進行中，釘緊美元的台幣迅速提高競爭力，借力於對美出口的成長，而逐漸恢復景氣。另外，由於日圓升值的壓力，日本企業對台灣的投資，掀起新的暴發繁榮。不但如此，爲了企圖把日圓升值的損失轉嫁給台灣，向台灣索購的零件（尤其是電子零件）訂單紛至沓來，而一九八六年初以來國際石油價格的下跌，也大大地激發台灣經濟的活力。不用說，它更加提高了台灣的出口競爭力。

不過，並不是只有「神風」和順風向台灣吹來。在內部，日益高漲的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反公害運動以及反核能發電廠運動等等接踵而來。低工資而高品質的勞力，加上沒有勞資糾紛，沒有草根性群眾運動及低廉的電費，可以說是對資方有利的各項條件，眼看就要消失。

從外面來說，一直容許任意出口的美方也改變態度，而要求台幣的升值與開放市場的大幅讓步。出口依存度，從六〇年代的一〇％出頭，到一九八五年以後的超出五〇％，並且對美出口又佔一半，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如何逐漸修正以對美貿易大幅出超與對日大幅入超為主調的台灣貿易基本結構，是迫切的要務。有識之士擔憂：稍稍超出九〇％的過大貿易依存度和外匯存底的急劇增加，還有國內游資的過剩，以及地下經濟的活躍，但願不要變成致命的因素。

台灣社會的近代化，跟其他國家相比，「光彩和陰影」太過清楚，而台灣社會的扭曲一天天變得明顯起來。環境的破壞，公害的連續發生，污染的嚴重化之類的事態，是以前的日本也出現過的情形，因此人們抱著樂觀的看法，認為只要政府和企業肯做，仍舊有改善的希望。

然而，把賺錢幾乎看成唯一的動機的社會風氣，在一天天腐蝕人心。加上犯罪人的年齡急速地降低到二十以下，持槍搶劫殺人變成家常便飯等，引起人們的憂慮。有識之士不禁會問：這種富裕的代價，豈是能單靠我們這一代付清的嗎？

第七章 激變中的社會

1 六〇年代的反體制運動

冷戰結構的變化

通常多從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大會（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上，第一書記赫魯雪夫所發表的史達林批判演說找出美蘇和平共存路線的開端。不過，也許應該說，以史達林的死亡（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為轉捩點，很快就簽訂韓戰停火協定（同年七月二十七日），蘇聯宣佈擁有氫彈（同年八月八日），接著赫魯雪夫就任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同年九月十二日），由上述演變，業已埋下伏筆才對。

美蘇從五〇年代中葉到六〇年代前半，各自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和意願，急於趕往新的和平共存途徑。因此，美蘇的許多方策，就導致逼緊和圍堵革命成功才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結果。

中共政權維護本身的革命政權，尋求確立世界革命領導權和行使影響力，而開始顯示與蘇聯截然不同的途徑和自我主張。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訪問印度和緬甸，與印度首相尼赫魯、緬甸首相宇努分別發表所謂「和平五原則」——①互相尊重領土完整與主權；②互不侵犯；③不干涉內政；④平等互惠；⑤和平共存——的共同聲明。周恩來還攜帶這項「禮物」去訪問莫斯科（七月二十八日），嗣後，把對美蘇的警告也包含在內，發動金門砲戰示威。先是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然後從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二十四日，但自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就一直只挑單日，由中共方面對金門實施砲擊。

赫魯雪夫爲了說服中共，並同時說明今後發動和平共存路線的構想，而伴同副首相布加寧訪中（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發佈徒然粉飾門面的中蘇會談公報（同年十月十二日），可是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爲中心的意見的對立，縱然沒有明顯化，卻已經有根深蒂固的歧異橫互在彼此之間。

中共一方面在台灣海峽演出緊張形勢，一方面與印尼總統蘇卡諾、印度首相尼赫魯等商談，而成功地召開聚集亞、非洲二十九國於一堂的萬隆會議，通過並發表把前述和平五原則

更加擴大、發展的和平十原則（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另一方面，還積極接受印尼的調解，開始並維持中（共）美大使級會談（第一次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日內瓦，以後移到華沙而固定），可謂用心精明周到。

另一方面，美國搭上和平共存路線，接受赫魯雪夫的訪美（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試圖在美國的領導權下，一舉解決台灣問題。甘迺迪新構想下的凸顯政策之一的風味，至為濃厚。

自由中國案

在一九五三年的吳國楨流亡美國案，一九五五年的孫立人案以後發生的最有名的反體制政治案件，是「自由中國案」。

《自由中國》半月刊，是原駐美大使胡適與雷震聯手，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創刊的雜誌。據說，它的背後還有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胞兄宋子文。開辦時，不過是由體制方面的外圍人士充扮「自由的燈塔」的角色，以誇耀國府台灣也有言論自由的存在為目的的雜誌而已。

雜誌的主持人雷震出身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是憲政主義者。一度曾以國民大會副秘書長輔佐蔣介石，但脾胃不合而離去，可見他是有骨氣的自由派。雜誌一天比一天尖銳化，逐漸變成以激烈批判蔣介石父子的獨裁而受注目的政論雜誌。

雷震的周圍開始聚集外省人自由派和國民黨外的台灣人政治家。在同一時期，如前文所述，東西兩陣營的冷戰結構，也開始呈現變化。

六〇年代甘迺迪總統上台前夕浮現於美國的「一個中國、一個台灣」論，與主張中華民國不能代表全中國而只代表台灣、澎湖各島的「中台國」論所醞釀出來的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預兆，可以證實這些。無論如何，日本國內的反新安保（日美相互協助及安全保障條約）鬥爭（一九五九年四月—一九六〇年六月），韓國李承晚的政權的崩潰（一九六〇年四月）等，也開始對台灣的政局產生微妙的影響。

聚集在《自由中國》雜誌的國府批判集團，可能推斷這些是的大好機會，而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七日突破政治上的禁忌，一舉宣佈預定於九月中創立國民黨的反對黨——中國民主黨。可是，九月四日，新黨創立運動的中心人物雷震，以「包庇匪諜」的理由被捕，十月八日被宣判十年有期徒刑而入獄。從而《自由中國》雜誌停刊，新黨創立的氣勢和關係人也雲消霧散了。以上就是所謂「自由中國案」。

新黨創立固然遇挫，但《自由中國》撒下的種子，所鼓吹的憲政主義倒確實在台灣的土地上逐漸生根。新黨創立由外省籍的開明人士與本省籍的國民黨以外（黨外）的人們結合而進

行，意義是深遠的。它可以說是開端的事例，也是新的變化的預兆。

超越省籍矛盾

白色恐怖告一段落之後，有關台灣政局的高階層權力競爭，進入新的局面，它在基本上是國府對美國的暗鬥。環繞蔣介石父子的追求集中一元性權力的競爭，可以說只是「茶杯裡的風波」而已。總之，美國當局始終志在培養有利於其本國遠東政策的政權與政治家。

參加創立新黨的台灣人政治家吳三連（日本一橋大學出身，首任台北民選市長／一九五一年二月—五四年六月）與高玉樹（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第二、第五任台北民選市長／一九五四年六月—五七年六月及六四年六月—六七年六月。順便說明，高在任期中，因台北市依政令改制為行政院直轄市，而仍然被任命為官派市長，至一九七二年六月止），是美國非常中意的政治家。二氏的志向如何，雖然不明，可是美國巧妙地透過經濟援助，幫他們打基礎，給他們鼓舞士氣，是衆所周知的。在那以前，因為與日本的殖民地支配的關係，台籍政治家和美國的連繫甚淺。美方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吳國楨、孫立人的管道被切斷後，吳三連和高玉樹，才以跟雷震等佈置共同戰線的形式下突然高昇彰顯起來。

對自由中國案採取鎮壓時，當局或許也參酌對美權力遊戲和對台灣民衆的顧慮，本省人這一方沒有人被逮捕。可能是網開一面的代價，參與創立新黨的李萬居的《公論報》被霸佔

，而被迫停刊。時在一九六一年三月。顯然，粉碎批判國府的有力民營報紙，並不只是對李個人的懲罰，而是當局也意圖及早摘掉有可能發展成黨外宣傳機關報的嫩芽。

李萬居生於台省雲林縣，從中學時代就赴大陸就學，經留學巴黎，而在大陸參加抗日戰爭，光復後以新聞事業接收要員的地位，與陳儀一行一起返台。夫人為湖南省籍。他只要有意，隨時具有靠攏國民黨以謀「大成」的門路。儘管如此，他卻以報人貫徹一生，是至今仍舊膺得台籍民衆尊敬的台灣人賢達之一。

當時的反體制運動，還是溫和的，充其量透過選舉活動，拐彎抹角地批判、挖苦國府和國民黨。黨外政治家在都市區，偶爾能夠凝聚對國民黨批判的票源而當選。然而，選舉干涉嚴重，選民的意識又低，因此黨外運動並不容易開展。突破干涉而當選的人，又不知道會被如何在雞蛋裡挑骨頭，而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地度日。

以新黨創立為中心，本省籍與外省籍的人士能夠匯合，就結果來說，等於向萬人傳播：有共同的利害和政治理想為中心，人們打破省籍界線的溝通是可能的。在那以前，溝通在兩個層面上有困難。一個是在表達意思的手段——語言——上的隔閡。一般而言，壯年以上的台灣人，由於受到日本統治的影響，明顯地在語言上欠缺北京官話的表達能力。一九六〇年

，說起來是光復後第十五年，是台民逐漸習慣於北京官話的時候。不過，更重要的是：在創立新黨這個情勢中，以前所欠缺的共同的「政治語言」才勉強形成。國府當局嚴厲的鎮壓政治，以「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成爲凝聚本省籍人士與外省籍人士，釀成彼此間的信賴感的媒介。

經濟成長與政治的變化

國府靠農地改革，大致確實地把農民編進體制內。此外，又利用鄉村地主層對「插手政治」的喜好，讓人們爲了掌握縣、市長、鄉鎮長級的地方小權力，與贏得地方議會的議席，而組織派系，熱衷於權力競賽。追求政治的精力獲得發洩的管道，欲望的不滿得以舒洩到某種程度。民衆這一方則拿到一點點金錢或物品，在舞台下觀賞競賽。

一九六四年，工業生產額首次超過農業生產額。工業化的速度越發加快，工業層面的領導權逐漸轉移到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以中小企業居多，幾乎所有的經營者都是本省人。又，工人的意識大爲改變，公務員意識減退，接納競爭原理的新型「公民」的經營者與工人於是誕生。工業化中心的經濟發展，把人們吸引到都市區，一面促成人口集中都市，一面慢慢改變人們的意識。這的確與支持黨外運動的階層加深關係。

這一來，參加政治的機會固然比起日本支配當時，開放度增大，可是卻始終限定在地方政治水平。再說，惡劣的是政治上的禁忌與干涉，再加上貪污腐化，令人不忍卒睹的行爲過多，使人們感到氣憤。另外，教育在入學考試這層面，遵守公開與平等的原則。言論、學術研究的自由雖然受到限制，可是教育層面上的中原中國化卻快速進展。能夠靠標準語也就是北京官話作自我主張的一代，於焉誕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上台後，隨著經濟成長，他確實作到年年調升軍公教有關人員之薪水，對「安定」與「安撫」大有幫助。

2 台灣獨立運動的虛與實

台灣獨立的原點

以台灣人為主體的島內民主化運動的先驅，是居住海外的一部分中國人所進行的反體制運動。其中，有尋求中國統一，與中共保持密切關係的左派運動，這裡不加討論。在日本，特別受到關心的是台灣獨立運動。所謂秘密結社式的政治運動，虛實參半，並不容易闡明和掌握它的實體。台灣獨立運動也不例外，派系林立，錯

綜複雜，無論是主張也罷，運動的形態也罷，都紛歧多端。

台灣獨立運動逐漸確實成形是以中共政權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契機。不過，運動的當事者爲了主張自己的運動的正統性與合法性起見，往往把運動的原點配合自己的方便，而作後設性的解釋。有的把原點放在二二八事件，有的主張以割台時（一八九五年）之台灣民主國爲契機，有的甚至於追溯到鄭成功政權在台成立等等，可謂各出奇招。上述各派中，聲勢最大的，是主張以二二八事件爲契機的；不過，單從事件的有關資料來看，在事件過程中以明確的方式主張台灣獨立的，並不存在。

台灣獨立運動與日本

關鍵不在於台灣獨立運動從何時開始，而可能在於運動本身是否具有影響力，以及假如有，它今後將對當前的台灣政局或台灣的前途發揮何等的力量這個問題。自認且被公認爲台灣獨立運動的祖師而活動的，是廖文毅。他是台灣雲林縣西螺大地主的後代，本身也是大地主。經日本京都的同志社中學，畢業於美國的大學，擁有化學博士學位。夫人是美國人，在舊的世代是少有的與衆不同的人物。二二八事件時，他停留在上海，並沒有直接參與。

廖在二二八事件後遷到香港，與原台共領袖謝雪紅等合作，創立「台灣再解放聯盟」（

一九四八年八月）。並且標榜實現台灣住民的高度自治，從事反國府運動。由於中國大陸情勢劇變，以廖等地主資產階級為核心的右派島外台灣人集團，加強倒向美國，而向聯合國與美國訴求聯合國託管台灣與依據住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地位。在擔任它的關鍵性角色的人物中，邱永漢又可算一個。根據他的回憶錄，當初僅僅從兩三個人做起。當時的島外台灣人左派集團在立場上無法跟廖等採取共同的步伐，又有中共方面的號召，遂進入大陸。

台灣再解放聯盟無疾而終之後，廖於一九五〇年東渡日本，與居留日本的一部分台籍僑界人士在京都創立台灣民主獨立黨，自任主席。一九五五年九月，他更趁台灣海峽風雲告急的機會，創設台灣臨時國民會議。第二年，一九五六年一月，建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總統。後來，他看透運動無進展希望，而歸順國府。時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這個舉動替蔣經國就任國防部長（同年一月，首次現身幕前）和預定明春舉行的蔣介石第四次連任總統錦上添花。

另一方面，一九六〇年四月，當時在明治大學講授中國語的王育德，聚結台灣人留學生，創刊《台灣青年》，雖然進行宣傳啓蒙活動，但與廖等推行不同的獨自的運動。

台灣獨立運動與北美洲

到了六〇年代末，運動的中心從日本轉移到北美洲（美國、加拿大為

主）。這是因為從五〇年代末開始，逐漸增加的當地台籍留學生

開始行動的緣故。美國與加拿大的台灣人社會，由於完成學業的留學生的繼續滯留，與國府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尤其是美國向大陸那一方接近，中（大陸）日恢復邦交等餘波而劇增的移民層趕在一起，階層在大大加厚。目前，以最大的台灣獨立運動組織自居的，是本部設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一九七〇年一月成立）。該組織自我宣傳，是連日本的舊《台灣青年》集團也包含在內的世界性組織。

進入七〇年代後，從邱永漢數起，連一度曾取代王育德成為新一代台灣獨立派統帥的辜寬敏（辜顯榮的幼子）等，也陸續回到台灣。這些一連串的歸順事件，不用說，激起了血氣方剛的台籍青年們的憤慨。然而，假如冷眼旁觀，這不外是台灣獨立派元老們的歸順行為本身，在證明他們所主張的台灣民族論——台灣人已經形成與中國人不同的民族，及以它為基礎的民族自決論，是虛構的，已經自行崩潰。

相反的，美國與加拿大的所謂北美洲的台灣人社會，在迎接新的政治季節。除了台灣獨立聯盟之外，還有主張社會主義式台灣獨立的集團、託身於聯誼團體——台灣同鄉會——以

便發展組織的集團、以台灣長老教會牧師為核心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以在美國國會進行遊說為主旨而活動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等等，真是眼花繚亂。在上述各團體間，領導階層個人間，有競爭，有糾紛，有矛盾，每逢台灣有政治事件或選舉活動，這些團體中的人們就熱血沸騰。不過，某政治犯針對這種情形，作冷淡的批評。他是反抗國府一元性的權力實施專制政治，而曾經入獄達十八年的硬漢。他說：

毛澤東他們在建黨後二十八年建立政權。台灣獨立派卻一直生活在偉大的虛構與矯飾的世界裡。喊了台灣獨立四十年，卻一事無成。到現在還沒有尋找出自己體質的缺陷，對運動也很少作自我反省。只要這種狀態繼續下去，國府大概是安穩的……。

3 七〇——八〇年代的反體制運動

高度經濟成長

一九六五年對台灣地區的社會經濟，是劃時代的一年。美援停止，日本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日圓貸款的提供與高雄加工出口區的開設趕在一起。值得

記憶的是亞洲開發銀行在第二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它表示日本資本主義正式回歸亞洲，日本經濟以越南特殊軍需為跳板，呈現更進一步的飛躍，與台灣經濟也繼續深相牽連。這一來，台灣邁向高度經濟成長的各項條件具備齊全，以後經濟就加速度地膨脹下去。

台灣從進口取代型工業到加工出口型工業的轉移，以日美民間資本正式向台灣的投入為契機，而大步進展。日美系多國籍企業在台灣地區所尋求的，是低工資、高品質的勞力；沒有勞資糾紛而治安良好；法制也漸趨完備的投資環境。

台灣經濟的高度成長政策，從六〇年代末期到七〇年代初期這段期間，開始發揮功效。國府當局全力投入經濟，做為謀求自保政權的最高政策。寬大的外資導入政策，除了追求投資的擴大外，又成爲一種巧妙的政治經濟上的安全保障裝置——把自己投入國際性的保險。

爲了廣泛地、持續地提供品質優良的勞力，自一九六八年九月起，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大學、專科學校的數目，由一九五二年度的一所綜合大學、三所獨立學院、四所專科學校，大量增設到一九七二年度的各九、十四、七十六所。相同的，就學人數在一九五二年度爲研究所（只有碩士班）十三名、大學本科生六千八百五十三名、專科學校學生三千一百七十一名，到了一九七二年度，居然大幅增加到研究所博士班二百二十八名、碩士班二千六百九十

三名、大學本科生十萬九千八百二十七名、專科學校學生十三萬八千三百一十名。

蔣經國對政權的掌握

一九六九年六月內閣改組，蔣經國就任行政院副院長，須知院長由副總統嚴家淦兼任。固然加一「副」字，但顯然他才是實質上的行

政院長。因為無論在形式的層面或實質的層面，權力的轉移都在開始進行。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蔣經國以父親介石的代理人身分第五次訪美。同月二十四日，在紐約迎接剛剛結束六十歲誕辰宴會的他的，是台灣獨立運動家黃文雄和鄭自才。暗殺雖然以未遂收場，但這是象徵台灣獨立運動的中心移到北美洲，世代完全更新的暴力事件。另一方面，這次事件更加提高蔣經國在美國的名氣，大大地引發他對台籍青年更深一層的關心。

七〇年代初，國府與加拿大等西方各有力國家陸續斷絕邦交；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與「上海公報」的發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大陸）日邦交正常化（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等等，國府台灣加深在國際上的孤立。

在這個危急存亡的關頭，蔣介石於一九七二年三月當選第五任總統。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要名副其實地以首相地位面對難局。他不僅歡迎台灣獨立派聞人邱永漢歸順，而且斷然破格提拔本省籍人才，試圖收攬民心。對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長、交通部長、台灣省主

席、台北特別市市長，全部安插本省人，正是破天荒的舉動。現在的總統李登輝就靠這次人事拔擢，以政務委員（不管部部長，負責農業及農村問題）入閣，說起來是他初次投身政界。

蔣經國沒有就此止步，還積極從事青年才俊的提拔，又於一九七三—七八年度開始推展第六章所舉的超出五十億美元的十大建設計劃。憑藉該項投資計劃的推展過程，蔣經國得以向海內外誇耀他堅強的領導能力。結果，有助於穩定因在國際上孤立而動搖的民心。

因十大建設計劃大體上的成功，經濟結構急劇變化，它又反映在就業結構上。一九六五年是農業部門四六·五%、工業部門二二·三%、服務業部門三一·二%，到了一九八〇年，卻各為一九·五%、四二·四%、三八·〇%，就業人口的部門別百分比，呈現明顯的變化。人口的都市集中化趨勢顯著，加上大學畢業生的劇增，民衆的意識也迅速改變下去。

正當國府在國際關係層面逐漸孤立時，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介石總統因衰老而去世。蔣在出馬競選第五任總統的一九七二年三月，早就完成繼任人的安排。副總統讓老好人嚴家淦留任，行政院長則任命兒子蔣經國（一九七二年六月），以策萬全。蔣介石的去世，並沒有引起任何混亂，立即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國民黨總裁，為紀念蔣介石而永久虛懸，另設黨主席職位來代替它。理所當然的，蔣經國就任上述職位。

美麗島事件

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對二二八事件和掃紅的記憶顯著地淡化，因年輕人和都市住民對參與政治的意願；社會正義的主張與人權意識的提高等等，台灣進入炎熱的政治季節。以選舉為中心，在執政黨——國民黨，與黨外之間，再三重覆不斷的摩擦。它的累積，終於爆發為中壢事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針對桃園縣長選舉的舞弊的揭發，民衆情緒激昂，演成暴動。軍隊雖然出動，可是保持自制而撤走。

一九七八年三月，蔣經國當選總統。並推舉「半山」出身的前台灣省主席謝東閔為副總統。外界推斷：這是應付黨外運動的台灣人安撫政策的一環。謝成為第一位台灣人副總統。

黨外運動更加氣勢沖天，把箭頭指向預定於第二年——一九七八年底舉行的台灣地區立法委員及國民大會代表增額選舉，而緊鑼密鼓地活動。然而，也許顧慮迴避中（大陸）美建交宣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可能引起的大混亂吧，上述中央級的選舉停辦了。

美國的斷交與接踵而來的美華共同防禦條約的失效既可預期，人們惶惶不安。也因上述情勢的推波助瀾，台灣的黨外運動越發高漲。黨外人士在進入一九七九年以後，設立「美麗島雜誌社」，自八月起發行《美麗島》雜誌。突破多年來言論禁忌的編輯作風，大受歡迎，銷行份數劇增。黨外運動的主流，不久即以美麗島雜誌集團為中心而形成。全島設立十一處

分社，做爲與讀者溝通的據點。這是因爲新黨創立受到禁止而設計的迂迴戰術，假借雜誌社活動名義推展的群眾運動。不用說，最後的目標在於創立新黨。

美麗島集團意向與美國斷絕邦交而陷入逆境的國府挑戰。由於國府遲遲不宣佈何時恢復中央級選舉。火燒警察局的中壢事件和抗議余登發被捕的橋頭遊行又不曾引起逮捕。美麗島集團就逐漸提升群眾運動的規模，而策畫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節在高雄舉辦火炬大遊行。當局針對此舉，作密切警戒的大部署，調集大量鎮暴憲警，嚴加佈防。遊行演變成流血的騷擾事件，嗣後，黨外人士大量被捕。或由於以美國爲首的國際輿論的批判，才舉行公開審判，並經電視轉播。本來比較保守，而且與政治禁忌保持距離的律師們，以少壯派爲中心，大舉前往擔任美麗島案審判的辯護。事件關係人士固然被科處重刑，但是人權意識和政治自覺也經由這次公開審判而大爲提高，支援者、同情者層出不窮，向民主化踏出大幅的第一步。

民主政治的代價

古今東西的歷史告訴我們：爲了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付出長期的時間與流血的代價。台灣也不例外。光復以來四十年，再把日本的殖民地支配時代合計，居然將近一百年。

進入八〇年代，矛盾激烈化，引發社會與政情的不安。因美麗島案入獄中的林義雄（著名的黨外律師）的母親與學生女兒，於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被暗殺；返回台灣的美國卡乃基美倫大學數理統計學助理教授陳文成離奇橫死案，發生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據美國僑界的傳聞，陳生前對海峽兩岸均甚關懷，但不曾表達過強烈的台獨主張；他對台灣民主運動極力支持，常參加「台灣同鄉會」及「台灣民主支援會」的活動。

正在留美「華人」（包括本省與外省雙方）的台灣民主化支援運動，與台灣獨立運動的「台灣住民自決運動」在互相糾纏而高漲的時候，以《蔣經國傳》的著者而聞名的美籍華人新聞工作者江南，於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被國府情報局關係者暗殺。因為遠渡太平洋，在加州舊金山近郊的大理市暗殺美國籍人士，所以美國的大眾媒體喧騰不已。甚至於連國府的保守派，也不得不因它衝擊的怒潮而轉變態度。人們於是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受一有冬必有春，政治層面上的形勢的轉變也日新又新了。

第八章 強人之死與新時代的開幕

1 蔣經國之死和李登輝的上台

蔣經國之死

從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八點，到第二天上午一點左右爲止，日本・東京寒舍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

起初的電話，來自台北的傳播媒體。「台北發生重大事情，能不能在府上等候連絡？」接著，台灣的大報《聯合報》東京分社打電話過來。「看情形蔣總統好像去世了。等一會兒請發表談話。但是，還沒有正式宣佈，請暫時別向外透露。」

隨後真是天崩地塌。先有證實死亡的電話，正式宣佈後，是陸續不絕的邀約發表談話的電話。

約我發表談話的要點，大致如下：①談蔣經國在歷史上的評估與定位；②台灣會不會發生混亂？③評新總統李登輝的為人與政治上的素養。

以下就一月十三日晚上九點時，筆者試述，並經日本報紙刊登的評論部分，轉錄一二：「蔣經國先生在這一年半中，解除戒嚴令及報禁，也開放訪問大陸等等，陸續採行民主化的政策。他人難以取代的強人意外地早死，是非常可惜的。假如他能再多活幾年，台灣可能更加穩定。」

在這一年半中，他採行的措施，都是無法倒退的。從新總統李登輝算起，司法院長、內政部長、國防部副部長等台灣出身的要員也增加了，今後將會由軍、黨、政的實力派人士採取集體領導，島內想必不致混亂。

本月初，還有台灣的國民黨批判派的雜誌社社長前往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國營通訊社——新華社——的負責人討論統一問題的舉動。我認為中國（大陸）不至於趁這個機會興風作浪。」（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朝刊）

「儘管有街頭示威遊行，民主改革已經走上軌道了。我認為准許街頭示威遊行，是當局研判那是對政權不滿的發洩管道，反而可能緩和極端而偏激的行動。在法制上，應當由副總

統繼承總統職位，相信李登輝先生將順利繼任。李氏雖與軍方沒有淵源，但形象清廉，又是本省人。

假如軍方內部不發生意外，可能順利走上集體領導制，這當然要以國民黨內的開明派與軍方合作為前提。

以對外關係來說，現在大家都知道，美、中（大陸）、日在蜜月狀態，不希望在台灣發生重大的變動，我不認為中國（大陸）會在台灣興風作浪。只要不發生武力政變或台灣獨立的緊急狀態，中國（大陸）想必將冷靜旁觀。台灣的民主改革，大概會與大陸民主化的導向互動進行。經國總統的死衝擊並不太大，外來混亂的因素，看起來並不存在。」（日本《讀賣新聞》一

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朝刊）

依據官方消息，蔣經國於一月十三日下午三點五十五分（台灣時間）去世，七十七歲。嗣後大約四小時，就是八點八分，李登輝依「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就職為繼任總統。

李登輝就任總統

李於一九二三年出生在台灣北部淡水附近的三芝鄉。經日據時代舊制台北高等學校，在京都帝國大學農林經濟學科肄業兩年左右。戰後，一九

四六年返回台灣，轉讀台灣大學，於一九四八年畢業。

一九五三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農業經濟學碩士。一九六八年，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他一面在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服務，一面兼任台灣大學教職。一九七二年，以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而同時掀起的提拔台省籍精英的一環，膺任政務委員（不管部部長，主持農業、農村問題）而就職。從此以後，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到八一年十二月為止，任台北市市長；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到八四年四月為止，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一九八四年五月就任副總統。然後，終於榮獲萬人之上的職位。

一月十四日的早報，台灣自不必說，連平日很少刊登台灣消息的日本各大報，也都載滿了與蔣經國去世有關的報導。

其中，最引起我注目的，是新總統就職宣誓典禮的照片。直挺挺地高舉右手而宣誓的李，所面對的是被國共雙方共尊為近代中國國父的孫文遺像，陪襯的是滿地紅的青天白日旗，也就是中華民國國旗。直立不動的是司法院長林洋港。林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台省出身的政治家之一。

不用多說，列席宣誓典禮的，可能還有許多其他的要人。不過，出現在照片上的，總歸

是已故的孫文與台省人精英李和林，三個人而已。把它看成足夠象徵台灣新時代的開幕而有餘的「時代的肖像」，誰曰不當？

再說，李所朗讀的總統就職誓詞極為簡潔。全文如下：

總統誓詞

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

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謹誓。

宣誓人 李登輝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

過度敏感成習的在台本省朋友，讀了刊登在報上的「總統誓詞」後說道：「沒有主義八股的氣味，相當不錯。」豈料，那是「說溜了嘴」，是「研判過度」。追本溯源，它只是規定在憲法第四十八條的條文，加上宣誓人的簽名和日期而已。

「編造的」遺囑

人們應該注目的，倒是「經國先生遺囑」。在本稿執筆的時候，台灣內外都公認這篇遺囑不是他本人所留下的，而是經過「編造的」東西。從有關當局沒有針對「偽作」發表任何談話來想像，以「遺囑」為中心的「政治花招」似乎非比尋常。

這姑且撇開不提，先把「遺囑」的全文照列：

經國先生遺囑

經國受全國國民之付託，相與努力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業為共同奮鬥之目標。萬一余為天年所限，務望我政府與民衆堅守反共復國決策，並望始終一貫積極推行民主憲政建設。全國軍民，在國父三民主義與先總統遺訓指引之下，務須團結一致，奮鬥到底，加速光復大陸，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大業，是所切囑。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元月五日 王家驊敬謹

記述

如影印本所示（見書前附圖），看不到蔣經國本人的簽名。正式的簽名，是副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院長俞國華、立法院院長倪文亞、司法法院院長林洋港、考試院院長孔德成、監察院院長黃尊秋六人。此外，隔開一行，以再降低一格起寫的形式，由三子蔣孝勇以親屬代表身分附簽。

單從字面來看「遺囑」，可以說毫無新奇的內容。既然如此，它是爲了什麼目的的「偽作」呢？而且，誰是「偽作」的中心人物？還有，爲什麼挑一月二十一日的時機，由反體制週刊《民進廣場》來揭發「偽作」（外洩說比較得勢）？從蒙受「偽作」中心人物嫌疑的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方面，沒有提起任何反駁或否認的說法，那又到底表示什麼呢？疑雲難消。

回顧起來，一九八四年算是國府內部革新劃時期的一年。

蔣經國連任總統即使是必然的趨勢，誰來代替年老的謝東閔（一九〇七年出生的「半山」）就任副總統的職位，還是飽受注目。理由很簡單，不外乎蔣患長年老病——糖尿病，病情相當嚴重，進入八〇年代後，開過好幾次刀；由於這個情況，人們認爲他很難當滿到一九九〇年五月爲止的六年任期。

既然是任期中的合法交接，副總統繼位自有憲法第四十九條的既成規定。因此，姑且不

論能否真正掌握實權，眾人皆知，副總統有十二分可能性升任為總統，卻是千真萬確的事。

李登輝膺選的理由

至於蔣自己挑選李登輝的理由，當時的台灣政界，大致作以下的觀測：

(1) 李沒有兒子。在傳統上，認為沒有兒子的男人權力欲小，沒有野心（中國人社會依然擺脫不掉這種思考框架，著實可悲。事實上，李的獨子憲文於一九八二年三月不幸以癌症早死）。

(2) 具有學者出身、純樸、不要弄權謀術數的清譽。

(3) 不曾受過選舉的洗禮，不具備受到民衆或派系有形支持的明確基礎。他可以說透明而清廉，對絕對性的強人權者而言，是可以放心的人物。

(4) 大學生時代，接受過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一直對農民和勞動階級寄以關心，或許因而與蔣自己在蘇聯西伯利亞的體驗，多少有相通接口，所以對勁投緣也不一定。

(5) 說不定，蔣器重他是位肯讀書的人，且具有邏輯式的思考，對政情善於作原理層面的分析。

(6) 投入政界後，無論在行動或言論上，都極為慎重，隨時保持清譽，可能也受到蔣的賞識。

(7) 李身高一百八十分，體重八十公斤，體格魁偉，具備以留學日本、美國雙方的經驗為基礎的通達國際之感受性。常代理多病的蔣接待外賓，以電視時代的象徵性政治家的形象而言，李被看成最適當的人物，應是衆人可接受的優點之一。

台灣政界的觀測家們，舉出上述理由後，還煞有介事地評論：大概自從一九七二年以來，蔣就親自對政治家李登輝，作慎重且綜合性的觀察，然後決定一切。

無論如何，李登輝是台灣史上，而且是中國史上第一個以台灣人，也就是台灣省籍的人而登上政界最高的地位，這已成爲千真萬確的事實。

2 黨主席推選的攻守與雙李體制

蔣宋王朝的收場

一九七二年五月，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院長。此後，在國府台灣的局面上，權力實際上逐漸從父親介石轉移到刻意栽培成強人的唯一繼任者——

兒子經國——的手中，歸他掌握。

制度層面上的國府，在形式上，總統之下設有行政院（內閣），二者爲上下關係，然而在

實質上採行一黨專制政權制度的國府最高權力機關，不用說，是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宰並代表該常務委員會的職位，在蔣介石死後，即歸蔣經國以黨主席名義一直獨佔下來。他無論擔任行政院院長也好，擔任總統（一九七八年三月當選）也罷，經常與官位的頭銜無關地一直掌握著黨的最高權力。

饒富趣味的是，蔣經國儘管挑選李為副總統，卻沒有設置黨的副主席職位。不但如此，而且不在黨章內明確規定遇到非常情況時，有關推選主席職位繼任人的程序。按理，他在生前，儘有安排這項程序的充分時間和實力。

依照黨政一元式領導，國府台灣向來的慣例，新總統李登輝在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召開的第十三次黨大會以前，被推選為代理黨主席，才是理所當然的趨勢。

當黨內革新派和多半的輿論在逐漸穩定擁護李的態勢中，起了一陣波瀾。以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為首，介石的侍從、秘書出身的現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C.C.鉅子陳立夫這些人們激烈地反擊過來。經過許多迂迴曲折，才在一月二十七日的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正式決定由李代理黨主席。對這幾日間的攻守，人們稱呼為國府台灣內部「小小的不流血革命」。大概是認定中國近代史上的蔣、宋王朝，終於從國民黨內部被

迫收場而說的。

民主化開放政策的推行

從大局的觀點來看，首先要問：如何搭建強人以後的新的政治權力結構？其次要問：如何把支持國府台灣政情與社會安定的最大

因素——台灣經濟的活力與高度成長步伐的良性循環——繼續維持下去？這些正是擺在李總統面前最重大的課題。

試就第一個政治課題加以檢討。如今想來，蔣經國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國民大會代表年度總會會場上所提，有關「總統繼任人問題」的發言，是真心話而且是意義重大的表明。他這樣說：

總統繼任者的問題。這一類的問題，只存在於專制與獨裁的國家。在我們以憲法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根本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立國的基礎是以憲法為依據的，所以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那就是，由貴會代表先生們代表全國國民來選舉產生之。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

從此，蔣經國就以「民主憲政」的旗幟，陸續打出他所認定的民主化政策。從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解除四十年來的戒嚴令。外匯管制的開放，也同時實施。七月二十七日，蔣經國說：「在台灣住了近四十年，我也已經是台灣人。」十一月一日，開放大陸探親。十二月二十五日，經國強調「憲法才是我們的法統」（主張國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正統政權的法理根據），指出實施中央民意代表機關（立法院、國民大會、監察院）的改革，才是合乎憲法的唯一正確途徑。

以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為期，辦報與增頁的限制令，而且是巧妙的言論箝制政策之一環的「報禁」解除了。與這些民主化、開放政策亦步亦趨，以「台灣急進派」為中心的「民主進步黨」和「工黨」等反體制勢力的各項對抗行動也並行推展。民主進步黨（民進黨）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建黨宣言。此外，「工黨」則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創黨、成立。

形形色色的抗議活動

儘管如此，長期的戒嚴令與一黨專制養成的惰性，仍然沈重。多數民眾在表面上享受物質生活，半信半疑地靜觀蔣經國所打出的「民

主憲政」的政治改革和開放政策。

另一方面，由於長期的積弊而一再累積的「民怨」、「民疑」（對政局和前途的不安）、「民慮」（對政治的猜疑感）、「民虞」

擁有牢獄體驗的工人出身作家楊青矗的統計，在一九八七年一年間發生的示威次數，大小通算，竟達一千六百次以上。它的內容，有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反公害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還有農民運動，種類繁多，不一而足。

對急進派來說，逮捕、入獄的鎮壓，已經逐漸不算恐怖的對象，一部分年輕人反倒開始有以逮捕、入獄為提高自己在反體制運動中的名氣，等於獲得勳章，因而採取過激行動的趨向，日益湧現。有位老政治犯對此作如下評估：這是因為當局的鎮壓越來越不好下手，槍決等的極刑幾乎絕跡，對政治思想犯受刑人的支援活動以社會性的規模盛行，牢獄生活也不像往昔那樣艱苦；這些情況鼓舞了急進派的士氣。

再加上蔣氏父子的強人式一黨專制政治制度，隨著經國的死而眼看被迫放鬆和瓦解，是新時代的開端。既存的秩序瓦解，同時帶給全體住民危機感。這是古今東西的通例，台灣政局也無法避免。

國民黨內的情勢

看看國民黨內部的情勢。最近兩年來的各項民主化政策，結果是替反體制派開洩洪道，反過來說，也未嘗不可評估為緩和些許黨內的危機。此外，主張社會主義與標榜與中國進行和平統一的部分急進派組織工黨，再分裂，而組織新的勞動黨，試圖與工人、農民結合，而開始以勞動階級為核心的新形式的島內反體制運動。從海峽的對岸，中共政權的統戰壓力又緊逼過來。在這種情勢下，國民黨內的有關人士，看起來似乎亟於互相自律地抑制危機感的表面化。

其中的一環，是或明或暗地從多方面嘗試以克服危機感為目的的「運動」的推展。前述的蔣宋美齡等官邸保守派針對代理黨主席人事的異議及干預，還有抵制它的「不流血革命」，也不妨說是上述運動的一種顯現。

總之，佔據黨內主流的改革派，扶起能代替強人成為「和」，也就是整合的核心人物，試圖克服當前危機的過渡措施，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如以這個背景來思考，挑選李登輝為繼承人的蔣經國不單可以說是獨具慧眼而且更具「遠謀」。

李的確欠缺強人的條件，也還沒有具備真命天子之類的架勢。正因為如此，反倒具備成爲「和」——整合的核心的象徵性領袖之一切條件。這個既矛盾亦弔詭的道理，人們儘管

事後方知，總能體會。對前述的李被蔣經國選中的各項條件，假如還須要補充，那可能是這樣的：李一方面有客家出身的父親，他方面有閩南出身的母親，這樣兼具客閩雙方的血統，操本省人的強勢方言——閩南語。他以具備一般本省人精英都難得具有的條件，處於勝過一切地容易獲得本省系民衆廣泛支持的立場。

索性先說在前面：已經不是李本人需要國民黨。現在誠然不僅是黨，而且政、軍、警察、情治機構的一切關係者，在無限地需要他做「和」——整合的核心人物、做領袖，處於不能不擁護他的情況。保持「有容」、「無欲」，還有「謙讓」的姿態，「無爲」而代理黨主席，接著又當上黨主席，可能並不太困難，而且也受各方如此的期許。

李煥的課題

問題完全要看掌握操縱國民黨實權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之手腕與姿態如何。李煥，一九一六年出生在湖北省漢口市，抗日戰爭末期以來就追隨蔣經國，是經國之門生，也是智囊之一。國府遷台以後，以經國的得力助手地位，在黨務，尤其是組織部門大顯身手。雖因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中壢事件，暫時離開政治的前台，但一九八四年以教育部長入閣，再度得勢。爲了擔任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解除戒嚴令隨後處理難關的指揮，而於解嚴前夕，被提拔爲秘書長。從此以後，他以經國的心腹地位，承擔黨務改革，

進而推動政治改革的重大任務。

李煥當前的課題，可能在於如何應付過渡期的難局與以民主進步黨、工黨為中心的反體制方面的挑戰。

熟悉國府台灣政情的人，想必明白，國民黨本身在民間的形象並不甚好。而且，黨中央雖然依舊規定自己是「革命民主政黨」，但究其實，連黨的幹部都不認為國民黨在贏得全體黨員積極的支持與參與。國民黨的實態，該說僅是黨幹部與「黨工」（黨務專業人員）的組織相當鬆弛的黨，甚至於跟一般黨員脫節也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國民黨也被看做安躺在戒嚴令下的非常時期的動員體制上，飽含根深蒂固的刻板化舊體質之「充滿煩惱的傳統」的黨。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組織，並不能正確反映台灣社會客觀的各項現實。尤其不能體現並代表一般黨員，特別是台省籍中、下階層黨員的心聲。這種陳年老病相當嚴重，恐怕不易克服。

一九四九年以後到七〇年為止，依靠足夠稱爲絕對性強權的蔣介石、蔣經國體制由上而下的強人控制，來操縱黨。然而，進入七〇年代之後，隨著政治意識的普遍提升與民衆廣泛的人權意識的覺醒，以前的作風已窒礙難行，上意下達頻生分歧，也發生過不少黨員脫黨與

加入反體制運動的例子。

隨同以蔣經國之死與戒嚴令的解除為開端的各種政治性、社會性禁忌的消失，台灣政局呈現新的開展，把人們捲入動盪的漩渦中。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有對改革的渴望與訴求，還有以它為中心的種種意願交織錯雜，充滿活力。哪一個人，和哪一個黨，最能夠凝聚這種能源，把它化為力量，想必是決定今後政局最大的關鍵所在。

「民怨」的能源

在這種情勢中，發生四次大型示威運動：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連火車都被迫停開的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示威；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六日，反對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的示威；五月二十日下午到二十一日清晨之間，連一般民衆和學生也被捲入，而造成小型暴動的農民示威；以及八月二十五日「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聯盟」號召，由先住系各民族在台北斷然實施的「還我土地」大遊行。這些示威遊行，表示在規模與內容上，開始出現新的質變。特別是以農民為中心而舉行的示威，高舉反美標語，和先住系各民族「抗議之聲」大大地引起迴響，是國府中央遷台來不曾有過的情況。

剛巧，台灣原子能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副所長現役上校張憲義，向美國中央情報局密告國

府的原子彈開發計劃，巧妙地利用農曆春節前後的休假，靠中央情報局的援助，秘密飛渡美國的案件發生，輿論對中央情報局抨擊的動向也逐漸高漲。這正是由於大眾媒體報導美國對美元貶值、台幣升值的壓力與美方在台美貿易談判上粗暴態度的消息，而民衆的反美情緒更加升高的時期，因此是值得注目的動向。

四十年來「民怨」的存在，是蔣經國在生前也勇敢地面對並且承認過的事實。假如執政黨不顧「民怨」，不提出方策地拖下去，那麼，國民黨可能就會輸定。另外，假如反體制方能夠以「民怨」為助力，把「怨恨」轉化為能源，而貫注於改革，那麼，就算有多少迂迴曲折，也必然會逐漸引起巨大的變動。又，民主進步黨即使打算依舊採取一味稱頌美國式民主政治的作風敷衍民衆，亦將難免遭遇困難。反正該提、該抗議的事項，假如不能用行動向美國表示，就可能失去民衆的信賴，甚至於遭受唾棄。

我認為蔣經國的民主化和開放政策，誠然是預見前述情況的徵兆，一直加以注目其運作與動向而搶先下手的。李煥以蔣經國鋪下而且已經無法退縮的改革路線為基礎，陷入不得不積極打出黨務的自我革新策略，是很明顯的。

李登輝和李煥的雙李體制所不得不面對的難局，就算說成比國府中央遷台當初——也

就是一九四九年底到五〇年代初期之間——的局面不相上下，也不算誇張。中央委員會委員的核心且掌握實權人士大都屬於外省籍，因此關於改善體質與刷新人事，無論從職務方面，或從出身方面來說，都非由李煥積極擔任不可。

3 李新總統的課題與政治的現實

本土化和民主化

比起黨務革新來，李登輝以總統職位所面對的課題，性質稍異。重點或許反倒在於如何接納黨外，尤其是台籍人士對參加政治的各項積極要求，一面與李煥聯手，一面加快政治上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步伐，並設法如何順利加以推行。

這裏使用「本土化」這句話，但要先說明清楚，它與「台灣化」的概念之間，有微妙的措詞上的差異。按通常說法，台灣化容易被認為與土著化——限定於台灣、澎湖各島和本省人——同義。可是，假如把本土化加以更合邏輯地引申下去，當然可以用作更廣泛的、涵蓋台灣化的概念才對；我認為如此思考，才符合邏輯。「反攻大陸」既然不可能，限定於台灣地區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是再也無法避免的緊急課題。如何盡可能提早，減少摩擦而

實施，不必諱言，已成爲本土化的第一要務。再則，以地理上的空間來說，當然在台灣、澎湖各島之外，還應該加上金門、馬祖地區才符合現實。又，應該當作本土化的對象的住民，我認爲除了居住在上列全部地區的所有省籍漢族系住民，還要更廣泛地把少數民族的成員統括在內。針對這一點的共識，有待確立。

當絕對性強人的政治性權威崩潰時，繼承人不能不起而擔負填補權威空白的任務。前文已經提過，台灣四十年來處於戒嚴令之下，靠許多鎮壓性的各項法規和以警備總司令部爲首的特務、情報、治安機關等鎮壓機構，把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維持下來。在這範圍內，幾乎一切政治參與或對政治領導策劃的參與，只有經由國民黨所提供的管道，才可能實現。

一般民衆更自由而自發性的政治參與，一直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尤其是不能被安插到國民黨體制內的人士，再加上不肯默默聽從而要提出異議的人們，完全受到排除。排除又往往不公正並且帶有政治性迫害，因此成爲怨恨的累積，甚至於化爲憎恨而鬱積的惡果。

新總統的課題

新總統應當接納紓解「民怨」，在統合民衆的同時，配合時代倫理的要求，確立足以因應新政局的政治上的威信爲迫切的課題。預期因反體制勢力的登台，經由言論方面和街頭示威而對當局所作的挑戰，暫時仍然可能激烈地繼續下去。

不問反體制勢力實際的聲勢、挑戰的內容、品質如何，以新總統為核心的新權力，都將被迫重新整合自己所賴以建立的政治支配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國府當局長期以來，拿中共的威脅與非常情勢做藉口，把自己「法統」的主要依據放在遷台（一九四九年底）以前選出而仍舊由不經改選的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及監察院監察委員所組成的中央民意代表機關，即所謂「萬年國會」，將自己的體制正統化的具有一種體系性的意識型態，則由孫文主義，也就是三民主義敷衍過來。

然而，如前章已經交代的，只靠這些，已經無法適應當前激變中的挑戰。好也罷，壞也罷，蔣經國是體現台灣地區的一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他這位強人的死，正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新時代所面對的冷酷的現實，使一直硬靠強橫維持下來的既有秩序，越發加緊崩潰和瓦解。

國民黨一黨專制式的政治制度的權威，如今面臨存亡的危機，是很明顯的。接受時代的挑戰，新總統似應搶先肯定黨政分離的必然，早日擺脫「國民黨∥政府∥國家」的惰性平板式思考和行動的僵化模式。最近的大眾媒體在呼籲「萬年國會」的改組與依多黨競爭式的代議政治的確實實施，把它當做迫在眉睫的政局爭執焦點而加以提示。

其次的政局爭執焦點，而從反體制方面一併提起的，有行政院直轄市台北、高雄的市長恢復民選，及台灣省主席民選之兩項。要求政治參與的全面性開放與自由化的呼聲甚高。

新總統如何嘗試正統性與合法性的重整，克服省籍矛盾，把暫時性的「國民的統合」、「社會的和解與協調」，甚至進一步把「政治的前瞻性穩定」的軌道鋪設成功，衆人都寄以注目及期待。

李個人的領導方式

在以總統職位爲中心的緊急課題的完成上，可能需要確立與過去強人式統御術完全不同的李的個人獨特領導方式(Leadership)。領導方式的首要因素，不用說，是需要台灣地區全體住民與跟台灣關係深厚的海外華僑和華人所信賴，並且可以放心付託國政運作的權威 (authority)。

目前，李總統所具備的權威，可以說是蔣經國生前個人所賦與的延伸而衍生的，很難說完全屬於李個人。要把權威從接受賦與的，轉移並確立爲自己的。只要志在追求應有的合乎理想的總統職位，不論繼任總統職的是不是李登輝，也都必須經歷這樣的過程。

領導方式的第二個因素，可以假設的是台灣地區總體政治的一元性領導方式。它的確立與有效率的運用，也是緊急課題之一。李已經在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八八

年七月七日—十三日) 確保正式主席職位。正因為是在「台灣輪」接受大轉變的波濤沖擊的最近，一元性的領導方式必不可或缺。換句話說，必須設立統合地掌握宏觀的政治經濟，能在最後決定性階段替執政黨和政府擬定政策的統合參謀總部式的機關。李登輝以黨主席和總統地位，今後能否在實質上掌握這種機關，使它發揮高效率的領導力量，看起來似乎即為成敗關鍵。

當然，國府台灣在行政層面，已經有「國家安全會議」(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正式成立) 這個綜合性調整機關。可是由於強人長期以來的控制與獨腳戲演出過久，守舊刻板的惰性嚴重，未嘗沒有僵化的傾向。何況，成員又限於國民黨的元老級，還可不斷地聽到它排除黨內少壯精英與黨外賢達且缺少活力的批判。

眾所周知，台灣的都市生活充滿活力，人們一直向都市一窩蜂地投奔過去。代替既有的「神」而湧起來的是「錢」。拜金主義到處瀾漫，精神上的頹廢和空虛一天天升高，給人們異樣的感覺。再加上，另一位「神」強人」死了。體制方面硬套上而口號化，以致失去效力的意識型態，可以判定大致已經崩潰。

足夠填補它的空虛而有餘的，清新而體現時代精神和倫理的價值體系之開創，以社會性的

規模訴求而顯現。受到期許之開創者，不外是具有新知性的領導才。

整合全體住民的共識，體現其時代精神，要仰賴智慧圓融的領導才（Leadership）。不用說，這只能求之於追尋正確的未來秩序，而又掌握得住思想上、倫理上主導性的，也就是說，關懷台灣並包容全體中華民族的格局的領導才。要形成空前而嶄新的、充滿智慧的、衝勁十足的領導才，斷非易事。不過，爲了要在大轉型的艱危局勢中掌舵領航，這種領導才事實上是絕對不可欠缺的。

在地球上，而且在亞洲太平洋圈，加上在中國大陸的周圍，台灣地區本身所佔座標軸的重估，可能也是迫切的課題。因爲這在構思有關台灣地區新的生存應有機制的戰略上，在當做脫穎而轉變到符合衆人所期許的應有戰術性機制的前提性程序上，都是必須的。

晚年的蔣經國，據說呼籲勉勵自己的同志和幕僚們：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大爲改變，必須趕上情勢。圍繞台灣的時代情勢，還有跟中國大陸的抗爭、對峙的關係也大爲改變，今後恐怕還要繼續改變下去。

做爲「活生生事物」的經濟

在政治的領域中，國界經常會糾纏不清。本來，台灣海峽對中國人而言，並不是國界。儘管如此，只要國共兩黨繼續對

立，它就成爲「擬似國界」而隔斷雙方。然而，經濟是「生物」，係活生生的生物。是國界也好，「擬似國界」也好，經濟都不拿它當一回事。其本性該是企圖相互滲透，且總潛藏有互跨突破、相通有無的特性。

趁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在紐約華爾街發生黑色禮拜一（股市大暴跌）的機會，世界經濟秩序以明確的形式開始重整。這大概是萬人公認而可接受的事態。外匯存底額七百六十億美元，僅次於日本、西德，佔世界第三位（截至一九八七年底爲止）的台灣經濟，已經再也無法擺脫世界經濟之運作而保持孤立。

亞洲新興工業國（地區）的模範生——台灣，目前靠以對美出口爲主調的強勁的出口暢旺，而持續繁榮。不過，有美國國內保護貿易主義的高漲，逐日激烈化的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美元貶值、新台幣升值的壓力，來自各競爭對手國家的追逐又猛烈。

與台灣經濟有密切關係的美國和日本，加上同爲亞洲小龍而站在競爭地位的新加坡和香港，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自由地運用大陸市場，是衆所周知的。最難纏的對手，而且是台灣在亞洲的唯一友邦——韓國，看準漢城世運的成功，開始迅速向大陸接近，對台灣恐怕將成爲政治經濟兩面不穩的因素。台灣經濟界對前途感到嚴重的憂慮，自不難想像。

對東歐共產主義圈各國的直接貿易，與對蘇聯的間接貿易等，已經解禁。如何靠多方面分散出口市場來重整自我保全的貿易結構，國府有關當局正在迅速推展摸索。新聞報導，經由香港的對大陸貿易額，在一九八七年一年間，飛快爬過二十億美元的大關。直接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動向，在大陸探親開放後，更加帶勁起來，再也難以後退。物與人的交流步步推前，意識型態上的隔閡將會隨著逐漸縮小，人們已明確地指出這一點。以台灣海峽兩岸為中心的交流的進展，今後將帶來什麼樣的情況，會激盪出什麼樣的衝擊和刺激，想必值得眾人注目。

新權力在政治上的任務

現在的台灣，以「大陸熱」而充滿活力。從連續四十年間的斷絕到突然而來的開放，有以致之。人們期盼更開放的大陸政策的明確化，以及它的開展。當隔著台灣海峽的限制越來越消除時，要使海峽這一邊的政情與住民的生活如何安定下去，我認為是新權力所應完成的政治上的主要任務之一。只有政治領域恐怕暫時只好繼續保持叫做台灣海峽的「擬似國界」，但在經濟方面，以「國界」稱呼的圍牆將會逐漸拆除，是不難想像的。

以李新總統為中心的新權力集團，要決定台灣地區的航路導向的判斷基準，到底還是在

於如何靈巧地調整經濟這個沒有國界的「生物」，與政治這個「擬似國界」在存續中將引發的問題，把舵操作下去；如此推想，當無大錯。

或許可以說，要把官民的種種希求、意見和主張加以過濾，整合成層次更高的昇華的產物，才是前述新智慧領導才處理萬機的本領及機制。

有識之士相信：由於台灣的官民顧慮政局的混亂，對與眾不同的新領袖——李新總統——多所寄望，所以從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到總統任期屆滿的一九九〇年五月為止，全體官民將會以寬大的心情，多多勻給他充裕的時間去因應、調適並處理萬機。

結語——台灣往何處去？

世界和台灣都在謀變

全世界爲了尋覓新世界秩序而力求大轉變與大調整。不僅是美蘇和解在先，中（大陸）蘇和解的導向性變動也甚爲活潑。蘇聯軍隊從阿

富汗以及越共自高棉撤退，再加上伊朗、伊拉克戰爭進入停戰等，可以說是好預兆。

最近陸續召開的美國雷根總統和蘇聯共產黨戈巴契夫總書記的莫斯科會談（一九八八年五月），與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舉行的第十四屆先進諸國高峰會議（一九八八年六月），向世界各國發出許多訊息。尤其是對國際經濟體制在超越國家、社會體制和意識型態的差異而進入大調整期的提示，筆者認爲比什麼都來得重大。

進入成熟期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目前夾著有史以來最大而且過剩的總生產力，切實需要以中國大陸、西伯利亞爲中心的龐大潛在性大市場和資源，是很明顯的。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則分別提倡「改革和開放」與「重建」，引進資本主義

式的刺激（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制度爲中心）和市場經濟原理，以謀求自己體質的改善與靈活化，顯得在拚命從事自我保存及延續生命的作戰。

國府台灣四十年來，靠美國的保護，在軍事和國際政治上倖存下來。經濟也隸屬於美、日資本，在貿易上則一面擠過兩國的空隙，一面靈活運用美、日、台三角循環結構，確立了今日的國際經濟地位。

截至一九八七年底爲止的台灣貿易總額是八百八十億美元，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排名第十三；外匯存底額是七百六十億，僅次於日本、西德，居第三位，貿易依存度已經高到超過九〇%，總出口額的一半左右由美國、總進口額的三五%左右由日本所佔。這些數字表示台灣經濟偏頗的特殊性質。它也許可以說在徹底暗示國府台灣在國際經濟上被迫所處的不平常的地位。換句話說，台灣也絕對不可能擺脫前述世界性規模且具有結構性質的大調整之動盪。

因此，這等於是說，不但國府台灣內的政治經濟處於轉型期，而且今後在國際性政治經濟機制大調整的大架構中，無論如何，必須構想台灣地區的因應措施以便面對，否則國府台灣就無法倖存。

國民黨第十三次大會

受內外所矚目的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八八年七月七——十三日，在台北舉行。這是蔣經國去世後的首次國民黨大會，又是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戒嚴令解除以來民主化的洪流與政治、社會環境的劇變當中舉行，因此人們投以熱烈注視的眼光。

以下將介紹在當地的事後採訪情形，並加入與內外新聞界人士的暢談：

「代理」經過真除，李登輝終於在大會上被推舉為正式的黨主席。不過，據說直到大會前夕為止，有部分元老保守派直接勸告李辭退黨主席的舉動。他們並不是反對李的人品。無限地拘泥於傳統思考方式的老人們估量李在黨的資歷過淺，在黨內也還沒有充分確立威信，而有所顧慮。因此，有人解釋，他們畏懼假如搞不好，李豈不是會把擁有傳統的中國國民黨矮化成叫做台灣國民黨的小格局。另一方面，也有人斷定是元老保守派為了一心只想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作的最後掙扎。

有識之士這樣告訴我：無論如何，有可以透過大會來領會的「新穎性」，並且另有重大變化的預兆；據說，其中最大的焦點就是李登輝和主宰黨務的李煥之間的矛盾在開始表面化。

大家都知道，李登輝是學者出身，有潔癖，對權謀術數曾表示本能性的厭煩。他在蔣經國死後，一直公開表明：自己有基督和蔣經國兩位老師，只有遵照老師們的教導和指示，完成歷史的使命而已。李登輝可能希望在「天」賜的總統職位上，再加以實質地掌握黨主席的權力，確立自己的領導權，以便在任期中完成國府台灣民主政治的制度化。

能否順利進入雙李體制？

比起李登輝來，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是在傳統式的國府政界中一直浮沉的百鍊成鋼的政治家。我們應該判斷，假如不精通權謀術數，坦白說來，他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總統的寶座固然無從希冀，想獲取擁有實權的行政院院長職位，對李煥來言，似乎不算過分才對。

李煥主持黨務，卻在中央委員選舉的得票數上，佔第一名（黨主席不屬於投票的對象）。傳聞在黨大會前夕發生的激烈的倒閣運動，有李煥在背後支持，但並沒有確實的証據。李煥謀求組閣，試圖透過行政院長職位，讓自己奉為理想的政治改革開花結果，可以說已經成為政界消息方面的常識。一位行家還評論道：年齡已經高達七十二歲的李煥，表現出從來沒有過的急躁，並不是不能理解的。

針對提交黨大會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與大會隨後的內閣改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人

事的決定等等，雙李之間發生衝突的說法，私下喧騰。此外，李煥秘書長在大會上的黨務工作報告，甚少提到代理黨主席一事，也被列為壞預兆之一。

大眾傳播界煞有介事地傳言，李煥一怒而想丟下李登輝，改打林洋港牌。林是現任司法院院長，台灣省南投縣出身。年齡比李登輝少四歲，一九二七年生。戰前的中學時代曾留學日本，戰後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從地方自治機關基層公務員硬熬出身，經過民選縣長，熟練黨務和政務雙方，歷任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內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以至現職。入黨，進入政界，都比李登輝要來得早。近年來，一直被看成李的「勁敵」。

有人觀測，從此以後，國府台灣的總統不會由非台灣省籍人出任，因此，果真李煥與林洋港連手的動向一如傳聞，那麼政局上必定會引起不少的波瀾。

許多人指出：在目前面臨長期繼續的戒嚴令式政治、社會、文化的正常化，與行政、軍憲、警察、情治機構等的現代化這些一大堆迫切課題的台灣政局中，假如有雙李體制的傾軋或瓦解，說不定會造成國府台灣的致命傷。如何確立以雙李和林洋港為首的領導階層，在以後的政治行動上，必須識大體並自行遵守政治家的倫理規範，每個人能否一面嚴格自律，一面合作下去，或許將成為預卜今後政局動向的關鍵。

明朗化的大陸政策

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文化大革命結束和鄧小平掌握實權以後，每有機會，就呼籲要與國府台灣「三通」（通信、通航、通商）、

「四流」（學術、文化、體育、科技的交流），一直訴求和談與統一。它的主調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一九七九年元旦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與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共國慶前夕，該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的「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項提案」。對於這些，中華民國方面一直頑固地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立場。

前文已經交代，蔣經國在生前，從人道的立場著眼，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准許從國府台灣地區到大陸探親。一度打開的門，只會更加拉寬，而不易關閉。據說，連沒有親屬（起初限定三親等以內）的台灣省籍人，如今也佔萬里長城觀光客中的多數了。

由於美方發動的新台幣升值攻勢，開始困窘的中小企業人士對大陸所作的投資，在逐日增加，據說大企業中，已經有利用日本商社或廠家做人頭，進行大陸投資的。最近的台灣，正猛吹著大陸熱。民間企業對政府當局要求開放直接投資的壓力，也日愈增強。

提交國民黨第十三次大會的「中國國民黨現階段的大陸政策」，略經前瞻性的修正，就被正式採用並發表。明確區分政府與民間的立場，意圖公佈大致容許民間作進一步接觸的

希望，似可稱許。此外，以前只准許從台灣片面交流，但新規定准許「對直系親屬和配偶的探病與奔喪，讓大陸同胞入台」。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同月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召集人馬樹禮）分別正式成立。國府當局大陸政策的法制化與明朗化，可望更加進展。

對岸的大陸當局也於九月十日，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負責人丁關根），共產黨中央「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八月十六日，全國規模的「台灣研究會」（會長宦鄉）相繼成立，好不熱鬧。

三黨各自的盤算

到了以大陸中國與島嶼中國為中心的關係進入新的階段後，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三者間，有各自的意願在推來擠去，饒富趣味。中共當局發出微笑：在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統一路上，「燈」終於點亮了。國民黨好像也在高興：可以把以經濟成長為核心的「台灣經驗」帶往大陸，達成多年來的心願——重返大陸——的一部分，終於能夠療治老人們的部分鄉愁。

黨外的統一志向比較強烈的工黨或打算創立新的勞動黨的有關人士，認為只是該來的，

現在來了，還是從事促進台灣內部的民主化來得要緊，而表現得比較冷靜。

內心不平穩的，是民主進步黨內主張台灣住民自決論與台灣獨立論的人們。他們儘管強烈批判中華民國的「虛構性」，其實卻在體質上一直具有寄生於這個「虛構性」上的弔詭性結構屬性。在主張上，不能以黨的立場，採取反對交流的態度。一部分領袖似乎在大為期待：讓民衆經由探訪大陸，而不久就改變為對中國大陸的批判派，轉而贊成自己所主張的自決或獨立。

順便交代，民主進步黨內，還有抱持別的主張的活動家。他們把目前的迫切課題放在民主運動的徹底化，同時認為當前強調「統獨論爭」（統一或獨立的論爭）毫無益處，不但不利於民主運動陣營的大同團結，反而有害。

邁向真正的民主化

此外，針對民主化的好預兆開始出現。許多禁忌消失，蔣氏父子時代的各種事件，可以廣泛地受到議論的條件和氣氛正在齊備，就是其中之一。對二二八事件、台灣獨立，也變得可以相當自由地議論，而與中國大陸的非國府式的統一論也作為它的反彈的一部分而掀起。只是公開主張共產主義或與中共合併的議論，似乎還是忌諱。因此，與五〇年代的「掃紅」有關的議論，當然並沒有完全擺脫禁忌。

一九五〇年以來，與台灣獨立運動直接有關而被處死者只有兩人，而以共產黨關係的嫌疑而被槍決的，據說不止兩千名。那種恐怖感，人們無法輕易忘掉，據聞有關人士仍在觀望之中。

無論如何，隔著台灣海峽的敵意和緊張，正在逐漸緩和。中共政權和國府好像在分別嘗試摸索和試圖擺脫教條式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反共、三民主義。看起來，他們在朝著不談意識型態的對立，而代之以逐漸建立或不得不建立經濟利益，做為共同基礎的方向推進。

判斷在這兩三年間，中共政權和國府政權恐怕不至於有超乎尋常的和解的人居多。不過，同時針對妨礙和解決的外國勢力幾乎全部從雙方的內部消失，而沒有看漏這種環境變化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的有識之士，亦復不少。

反體制方面的虛與實

以前，有不少日本人注目於台灣獨立運動的抬頭，認為不久就可能掀起波瀾。可是，當台灣人就任總統，主要之政治焦點如「黨禁」

、「戒嚴令」、「報禁」等之解除，再加上訴求當局交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對犧牲者慰靈，對冤抑者賠償與道歉等等幾乎都逐漸獲得部分解決和滿足的今天，反體制方面越來越陷入找不到訴求焦點的新境界。

我們不能不說，在體制方面的虛與實完全曝光的同時，反體制方面的虛與實也正在轉移到非自內部有所反省及自我求變不可的局面。我偶然在參加學會的機會，得以參觀蔣經國的「國葬」。一面參觀「國葬」，一面聽入獄體驗達二十年以上的一位老政治犯說：

因為處於蔣氏父子絕對式的威權體制下，我們受刑人近年來才受到社會的同情。並且是在鎮壓之下，所以憑民主進步黨、工黨和台灣獨立運動家身分，在許多方面享受了民衆的同情與期許而獲得了不少的幫助。我想，該面臨慢慢冷靜地從內部凝視這個事實和機轉的時期了。

這兩年來，由於反對黨創立成功，街頭示威沒有引起逮捕，部分青年過於興奮的一面，處處叫我顧慮和難於接受。

在外國待二十年以上的台灣獨立運動家，對實際情形太隔膜。據說多數人很可能仍然深信，只要能進入台灣，喊一聲「台灣獨立萬歲」，所有的人都會追隨過來。是多麼美麗的誤解啊！

因經濟成長而加厚的中產階級，無論是政治意識或人權意識，都提升甚多。加上對

參與政治、參與社會的意願也旺盛。可是假如以為這些力量會直接與他們提倡的台灣獨立運動相結合，也未免太天真了一點。

大多為中產階級的台灣人，所關心的卻是偏重於世俗的舒適和物質上的享樂。他們事實上仍然繼續做反對運動的觀眾，而不願直接做群眾。不明白這個嚴厲的現實，是可悲的。

在國葬中痛哭的平民，多半是台灣人。台灣獨立傾向濃厚的少壯黨員派系「新潮流」所把持的民主進步黨黨刊《民進報》，連黨員都不大看的情況和它的銷行量日趨減少的事實，被眾人認為台灣人裡立場中立、且對體制敢作批判之報紙的《自立晚報》儘管在報禁解除後，趕緊發行《自立早報》（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創刊），卻甚難提高行銷量的事實，當足供參考。可以拿國民黨當替罪的羔羊，或利用為藉口的時代，已經過去大半了。應該開始靠自己的實力面對一切的局面已經來臨。

春節（農曆新年）的年終獎金抗爭，呈現了空前的推展。資方幾乎都是台灣人，勞方的領袖也幾乎都是台灣人的結構，已經很明顯。時代、環境也都在大大地轉變，假如不能夠洞察這些，那就未免落伍了。

假如不能夠正確地認識反體制方面矯飾的結構性體質，而趕快加以克服的話，反體制方面就不可能有所成長。把受壓制的心情的發洩，寄託在反體制運動和它的活動家的時代，很快就將結束。

民衆看透虛與實的嚴厲眼光，不是拋棄過去容忍的雅量而嘲笑反體制冒牌貨，便是對它發怒，表示不信任而要求「真貨」之出現，不顧冒牌貨而離去。我預料，這樣的一天，不久就會來臨吧！

台灣政治其次的論點

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指摘的，台灣政治其次的最大論點，將會隨著充滿虛構和矯飾的既存秩序的全面瓦解而旋即浮現。以前，仰賴一黨專制制度的「賞賜」厚顏度日，只要安穩地混好職位，不久就可以自然調升高職，只會張大嘴巴等待甜餅的人員佔多數的國民黨本省籍中上級幹部，聽說也在面臨新的挑戰。

「炎熱的政治季節」來臨了。不分外省籍、本省籍，進而超越黨籍，在少壯派政治家之間，開始進行合縱連橫，爲的是要因應新的政局。屬於民主進步黨的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更有些黨本部的黨工，開始以突破禁令的方式，訪問大陸。與中共有關人員的各種溝通

，已經在嘗試進行，這些當然是反體制方因應舉動之一環。

台灣應否獨立，似乎已經漸漸變成不是最大的論點了。聽說，如何穩住台灣地區的陣腳，如何在對大陸中國的民主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競爭中一直獲勝，在將來的正式談判的圓桌上佔優勢，才是他們設定的課題，人們專心致志地從事準備。當然，早日累積好充分的資格與實力，以便擔任參加談判的代表，才是年輕的黨外政治家的心願。據一位政治學家私下對我惋惜地說，在他們之中，不是以政客，而是以政治家身分真誠地追求自我實現和提昇的實力取向人士，仍是少數。

採訪了不曾屈服而於一九八七年夏天剛出獄的某政治犯以及許多有識之士（一九八八年七月—八月初），似乎覺得期盼台灣地區光明的未來的一般民心與台灣應有的走向已逐漸浮現。無論如何，此刻可以重新深切體會：危機往往與希望和新的開始緊緊相鄰。

政治犯先生最後這樣補充道：

我厭惡拿物質和金錢當做富裕的唯一尺度而無往不利的台灣社會風氣。並且，也不贊同畫餅充飢、整天作虛偽鬥爭的往日中共政權的作風。如今雖然的確悔恨而且辛酸，

還是希望假託尼克森的言詞。尼克森是我反對過、並且當作鬥爭對象的美帝右派的頭頭。他說：「中國人和美國人，屬於世界上最有才能的國民。雙方都擁有豐富的潛力。當展望二十一世紀時，肥沃的中美關係的土壤和氣候，毫無瑕疵地一切就緒。它說不定將會把我們引導到史無前例的和平與自由的高峯。」但願台灣海峽的「擬似國界」早日開放，共同成爲尼克森所期盼那種類型的「中國人」的一分子。所有的中國人，「左也罷，右也罷」，「大陸也罷，島嶼也罷」，都是同胞呀。希望能對人類作出偉大貢獻的一天快快來臨。

跋

此刻，靜靜地體會終於完成十幾年來的課題的解脫感。把登上歷史舞台以後的台灣（Modern Age）的一部分後，直到今天的整體像，以人的因素為中心，加以綜合地、濃縮地描寫出來，是我多年來的心願。

一九五五年秋天以來，一面停留在日本，一面從所有不同的角度守望台灣的動向。能夠保持距離來觀察、分析、思索台灣，有比漩渦中的人們更佔便宜的一面。不過，並不是沒有陷阱。為了擺脫各種各樣的陷阱，我自信拿——①不要忘記現實感；②要保有彈性的思考；③傾聽他人的意見，不可性急地把自己的邏輯絕對化；④要一面嘗試自我限定，一面嘗試發言——這些當座右銘，一直努力到今天。

當寄情於多事的故鄉而描述時，往往會陷入自憐和地域觀念而作繭自縛。自憐姑且

不論，地域觀念常常是和偏狹相連抑或容易相連的。也不知從哪一天起，經常把自己由衷相對化，一面不斷地追求更正確的自我定位，一面努力克服偏狹和自以為是，然後嘗試與開放性的普遍價值聯繫，就成爲我內心的課題之一。我所以要對包括自己在內的台灣居民的心性加以研究剖析，是由於這是解明事態的方法之一。

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給立教大學的各位同事添了許多麻煩。而且，假如沒有先進的龐大研究業績的恩惠，本書可能就寫不成。在此深致謝忱。儘管自認冒昧，我還是對自己的工作力求加添廣度、深度和光彩，以綜合化爲職志。對這分職志賜予建言和協助，並使它成形的，是岩波書店編輯部的林建朗兄。林兄爲了本書的編輯，曾經兩度陪我赴台作預備調查。至於職志的成功與否，但願等待讀者諸賢的批判。

在問題意識的磨鍊上，承蒙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一九七〇——八七）的同仁；在資料探索方面，則承蒙立教大學史學系研究室的金安榮女士惠予協助。最後，衷心向一直賜教的恩師，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神谷慶治老師，在亞洲經濟研究所援手照顧的小倉武一、渡邊彌榮司、瀧川勉各位先生和親近的朋友們表示感謝。

戴國輝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願台灣史研究的水準不斷提升（譯後記）

去夏返台後，忽然接到台北遠流出版公司的電話，受託趕譯戴國輝教授的新著《台灣》。王榮文社長還特別叮嚀：希望能和日文岩波新書同時出版。第二天，經過著者校對的大樣就送上門了。我且讀且譯，但恨雜務擾人，進度很慢，而暑假轉眼飛逝，只好把頭兩章的譯稿和大樣帶到日本來。幸虧台灣政局多變，著者一直在增刪改寫，並通知我不必趕工，等日文本刊行後再譯不遲，正好解決了我無法如期交差的難題。十二月寄出譯稿後，著者又吩咐我對原著的內容提供意見，以便在出中文本時酌加修訂。可是慚愧得很，我對中國近代史懂得稍多，對台灣史知道得太少，只能就若干細節質疑一二，而不能成全他的美意。不肯配合「打鐵趁熱」的生意經，寧可一再延誤出書時間，傷透出版家的腦筋，也要力求止於至善；著者的敬業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本書在大眾傳播界極端漠視台灣的日本出版後，不到半年，就連出四刷，賣掉六萬本，

替一向以內容嚴謹且正經、銷路比較清淡的岩波新書，激起罕見的高潮。東京、京都、大阪、福岡、仙台的各大書店，先後把它列在每週非小說類暢銷書的前十名排行榜上。五大報——朝日、讀賣、每日、日本經濟、產經新聞，兩大通信社——共同通信、時事通信，以及《週刊朝日》、《東洋經濟》、日文《經濟學人》等雜誌，紛紛刊載了書評。這裏姑且按「報憂不報喜」的原則，扼要介紹其中帶刺的兩篇：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的《產經新聞》（日本·近畿大學教授古屋奎二執筆）評道：

「著者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固然表達了本省人的一部分心聲，但由於過分強調怨恨，似乎在一味吐露被壓迫者屈折的心情。而對國民黨統治積極的一面——例如戰後台灣的現代化、經濟發展的奇蹟、大陸傳統文化的繼承——缺乏肯定性的記述，當然是不公平的。」

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刊行的日文《經濟學人》雜誌的書評欄（日本·津田塾大學教授許世楷執筆）則認為：

- (一) 在記述上問題比較少的，只有第一、第二、第六章。
- (二) 引用文獻太少。引述不確指出處，而且往往失實；如指陳文成爲左派台灣人中國統一運動的支持者。

(三)史實分配不均衡。如詳述羅福星事件，而對台灣文化協會只用六行文字輕輕帶過；又如不談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的台灣獨立運動，不記述民進黨成立的經過，不介紹該黨的人物。

(四)詳細介紹國民黨人物，處處稱讚蔣經國，而忽略台灣人在民主化運動上所做的自主性的鬥爭。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古屋奎二在十幾年前，以《產經新聞》主筆身分撰寫過《蔣介石秘錄》；而許世楷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一個嫌著者沒有肯定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一個卻罵著者從國民黨政權的角度來看台灣。這樣離奇的對比，情緒的成分似乎多於理智，難免令人懷疑他們倆另有用心，志不在論學。

著者在硬碰硬的日本學界、出版界、大眾傳播界早已站穩脚跟，盛名且遍及華語世界，實在輪不到相識不滿兩年的同鄉後進來向讀者推介。不過，目前海峽兩岸不謀而合地流行「統獨兩分法」，極端粗糙地主張「非統即獨，非獨即統」的乖戾之氣，瀰漫著文化界，弄得帽子滿天飛，幾乎有容不得學術中立的趨勢。著者認同中國大陸而批判大陸的政權，反對太褊狹的台灣獨立，拿的是台灣護照，又與國府農林界有關學人專家徐慶鐘、李登輝、沈宗瀚

、蔣彥士等人有過來往，於是動不動就被扣上「統派」、「騎牆派」、「投機派」，甚至於「保皇黨」（如許世楷上述書評中的口氣）的帽子。誠然，「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傳聞十遍假成真」。情況既如此特殊，自當有人挺身而出，說幾句公道話。

著者本籍桃園縣平鎮鄉，是個生長在客家村莊的台灣客家人，自幼受他父親強烈的中原意識的衝擊。他從宋屋國校到州立新竹中學二年級，飽受日本殖民地教育的洗禮，並體驗戰爭和光復的巨變。在台北讀建國中學的四年間，又耳聞目睹二二八事件、國府遷台和「肅謀清共」的恐怖與黑暗。他後來一直小心翼翼，極力跟現實政治保持距離，或許與青年時代這些刻骨銘心的見聞有關。但謹慎未必等於冷漠。他熱心幫助在政治上受過壓迫的前輩（如故吳濁流、楊遠、葉榮鐘、王詩琅諸老）、後進（如康寧祥、陳映真、王曉波）以及一些無名之士，還因此被吊銷護照，飽嘗「父歿喪不臨」的痛苦。

他的本行是農業經濟。在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服完一年的預備軍官役後，於一九五五年秋季赴日，第二年春天考進東京大學大學院，在東畑精一（一九八〇年日本文化勳章得主）的指導下，研究台灣農業史，希望搞通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真相，十年後，以〈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一文，獲得農學博士學位，敲開治學的大門。

儘管擔任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並從事台灣的社會經濟及華僑社會經濟的探索，他始終抱定寫一部新的台灣通史，立不朽之言的宏願，長期不懈地蒐集和保藏史料、出國考察、訪問、錄音、討論、講演、寫作，並扶植同好。十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他轉任立教大學史學科教授，主持過文學部史學科和就任新創立之國際交流中心長，正式把志趣和工作打成一片。

著者是一個身體健壯、生命力旺盛、讀書廣博、工作勤奮、眼光敏銳、志氣豪邁、自信心十足的史學家。他的主要著述如下：

- (一) 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 一九六七 亞洲經濟研究所
- (二) 與日本人的對話 一九七一 社會思想社
- (三) 日本人與亞洲 一九七三 新人物往來社
- (四) 討論——亞洲問題在日本 一九七三 平凡社
- (五) 邊緣人的獨白 一九七六 龍溪書舍
- (六) 新亞洲的構圖 一九七七 社會思想社
- (七) 台灣與台灣人——尋求自我同定(認同)之心路歷程 一九七九 研文出版

(八) 華僑——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苦悶與矛盾 一九八〇 研文出版

(九) 台灣史研究——回顧與探索 一九八五 台北遠流出版社公司

(十) 台灣：住民·歷史·心性 一九八八 岩波書店

此外，他還替亞洲經濟研究所主編了：

(一) 台灣經濟綜合研究上、下與資料編 一九六八

(二) 台灣的農業上、下 一九七二

(三) 華僑文獻目錄（華、日、歐文三部作） 一九七一—七三

(四) 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上、下 一九七四

自一九七〇年主持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匯集同仁之研究成果，編著了：

(五) 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一九八一 社會思想社

又替弘文堂編著了：

(六) 略加詳介：台灣 一九八六

本書由於受到岩波新書袖珍本篇幅的限制，著者不得不忍痛把原稿一再割、剪、刪、削，濃縮到三分之一弱。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以前的部分，更經過大刀闊斧的裁減。不過，讀者

往往可以透過刀跡斧痕，來窺測著者的用心所在。例如：關於當日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營上了軌道以後台灣人的反抗，他只記述了羅福星（客家人）、西來庵（閩南人）、霧社（先住民）三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來畫龍點睛；至於迴避正面衝突的社會文化運動，他就採用輕描淡寫的方式，來節省篇幅。

台灣史的著述，似乎長期停留在「為獨立建國鋪路」、「為回歸統一立功」、「為鞏固國權效命」的政治宣傳階段，而欠缺學術研究的堅實基礎。在這種情形下，那怕筆戰翻天，也無補於提升台灣史研究的水準。更不用說樹立公信力，讓讀者「鑑往知今」、「鑑往知來」了。忙於「創造歷史」的人，永遠沒有餘暇餘力去好好閱讀歷史，但又往往喜歡搬弄歷史來自圓其說；於是研究台灣史，很難躲開隨時飛來的帽子。著者就曾經勸告來訪的若林正丈，不要研究台灣史；因為不但沒飯吃，而且會莫名其妙地被貼上政治標籤。只有像著者那樣充滿熱情、自信、學識、魄力、恒心，住在東京這種人才集中、資訊豐富、言論自由、崇尚學術的社會環境，而又以「台灣出身的獨立自主的中國人」自命的史學家，才能夠堅持三十多年來的宏願，為提升台灣史研究的水準而開山造橋。難怪故吳濁流老先生在訪問過著者的書庫，面對汗牛充棟的典藏後，忍不住要發出「蓬萊第一峯」的驚歎了。

他並不是閉門讀書的舊式腐儒，而是行萬里路、識天下人的現代菁英。他主持過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長期推廣日本崇正公會（日本客家同鄉會）的活動，創辦並主持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一九七〇—八七年），多次訪問東南亞、北美地區華埠，去實地接觸和考察華僑社會，並曾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客座研究一年（一九八三—八四年）。他一面從事道道地地的史料蒐集、收藏、鑑別、考證這些基礎工作，一面嘗試以綜合社會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及精神分析學的方法解釋史實，主張把台灣放在世界史、亞洲史、中國史的有機關聯之結構性位置上加以觀察，免得把政治、法律上一時的認同，與社會、文化上註定的認同混為一談。《台灣》這本小書，只不過是著者在累積三十多年的準備工作後所寫的啓蒙性中間報告，更精詳、更堅實的研究成果，如二二八事件的綜合研究、台灣通史等，即將陸續推出。但願台灣史的研究，能因著者旺盛的工作熱和推動力而不斷提升水準，而引發深入的討論，藉此提供指針，好讓大家一道來尋求共同的、最合情合理的、最富於人道精神的前途。

翻譯本來是技術性的工作，譯者只負責用另一種文字，忠實且清楚地傳述原著的內容，頂多順手介紹一下著者的生平和著述背景就完事了，根本不必囉哩巴嗦的，惹人生厭。可是，由於著者的情況有點特殊，我不知不覺地多說了幾句話；謹向讀者道歉。著者的日文典雅

流暢，譯文最多只夠資格談「信、達」二字而已，不足以言「雅」。如有錯、漏、疏、失，尚請高明指正。

魏廷朝 一九八九、五、二八於日本大阪

簡明台灣史年表

(B. C.)

一三二一 秦漢時代，稱台灣為東鯤。

(A. D.)

二五 東漢、三國時代，吳國稱台灣為夷洲。

二三〇 吳，孫權命衛溫與諸葛直遠征夷洲。

六〇七 隋煬帝派遣朱寬至流求（台灣），探訪異俗。

六〇八 朱寬慰撫流求失敗。

六一〇 煬帝命陳稜與張鎮州率兵，自義安（廣東省潮州）赴流求。

一一七一 南宋，泉州知府汪大猷派兵駐屯平湖（澎湖）。

- 一一七四 台灣的毘舍耶人，襲擊泉州府下。
- 一二九二 元朝世祖派遣楊祥至瑠求（台灣），招撫失敗。
- 一二九七 元朝成宗自福州派兵至瑠求。
- 一三三五 元，大致在此時設立澎湖巡檢司。
- 一三八七 爲因應倭寇，撤廢澎湖巡檢司。
- 一五一七 約在此時，葡萄牙人自海上眺望台灣，喊爲“*Ilha Formosa*”（美麗之島）。
- 一五六三 復設澎湖巡檢司。約在此時，華南系「海盜」（兼具武裝貿易集團性質）在台灣近海活動。
- 一五八〇 西班牙系耶穌會關係人士訪台。
- 一五九三 日本豐臣秀吉試向「高山國」（台灣）呈遞國書。
- 一六〇三 荷蘭佔據澎湖，後來撤退。
- 一六〇九 日本有馬晴信，探察台灣。
- 一六一六 日本村山等安率領十三艘兵船，試圖遠征台灣。萬曆年間，倭寇在台灣近海大肆活動。約在此時，明在澎湖島增兵，加強戒備。閩粵二省省民頻繁介入台灣。魷港（嘉義縣

東石與布袋附近）一帶進行開發。

- 一六二二 荷蘭艦隊再度襲擊澎湖島。後移台灣。
- 一六二四 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安平建熱蘭遮城，在赤崁（台南市）建普洛文西亞城，開始支配台灣。
- 一六二六 西班牙艦隊沿東海岸入台灣北部，在雞籠（基隆）灣社寮島（和平島）築聖·薩爾瓦多城。鄭芝龍接受明室招撫，募福建省民數萬來台，每人付銀三兩，每三人配牛一頭，使進行開拓。
- 一六二九 西班牙在滬尾（淡水）築聖·多明哥堡。
- 一六四二 荷蘭艦隊北上，將西班牙人逐出台灣。
- 一六六一 鄭成功攻擊荷蘭支配下的台灣。
- 一六六二 荷軍向鄭成功投降，結束三十八年間的台灣支配。鄭政權將台灣全區改稱東都，以赤崁為承天府，設一府二縣一司。六月鄭成功病死。子鄭經繼位。改東都為東寧，縣升格為州，整編內閣制度。
- 一六七三 大陸發生三藩之亂。鄭經響應，失敗。
- 一六八一 鄭經病死，經骨肉之爭，次子克塽繼位。清廷攻略澎湖島。

- 一六八三 福建水師提督施琅自澎湖島進兵台灣本島。克塽投降。結束鄭氏二十二年間的治台。
- 一六八四 在福建省下設立一府（台灣）三縣（台灣—台南、鳳山—高雄、諸羅—嘉義）。
- 一七二一 朱一貴等舉兵於羅漢門（高雄縣旗山）。
- 一七二三 鎮壓朱一貴之亂後，因應開拓的進展，增設一縣（彰化）二廳（澎湖、淡水）。
- 一七二九 推行劃定漢蕃界線、禁止漢蕃互相侵犯、推展包括普及清俗等之理蕃政策。
- 一七六六 創設理蕃廳。理蕃事業分南北兩路而實施，設北路理蕃同知於鹿港（彰化縣），南路由台灣府台防同知兼任。
- 一八四〇 英國艦隊因鴉片戰爭，巡戈台灣近海。
- 一八五四 美遠東艦隊司令培理，自日本歸國中途，寄泊雞籠。
- 一八五八 依據天津條約，台灣府（台南、安平）與滬尾開港。
- 一八六〇 普魯士船砲轟南部少數民族的部落。
- 一八六三 增開打狗（高雄）、雞籠為商港。
- 一八六七 美國軍艦砲轟南部少數民族的部落，並加侵犯。
- 一八六九 因英國系商行與官警間發生樟腦紛爭，英國軍艦砲轟安平。

- 一八七四 日本出兵台灣南部（牡丹社事件）。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奉派為欽差大臣，主持台灣防務。
- 一八八四 因中法戰爭，法國艦隊砲轟雞籠、滬尾、澎湖島。劉銘傳奉派為福建巡撫兼督台灣防務。
- 一八八五 慈禧太后下旨籌議台灣建省。劉銘傳以駐台辦防名義籌備建省事宜。
- 一八八六 劉銘傳到任。以洋務運動為中心，推行新政。實施清賦（土地調查）事業，鋪設鐵路，創設樟腦專賣制度、郵政制度等。理蕃事業也以大料坎溪為中心推展。
- 一八八七 台灣脫離福建省而獨立。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以洋務運動為中心……
- 一八九一 劉銘傳離職。新政遇挫。
- 一八九四 八·一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黑旗軍劉永福為台灣防務而入台。
- 一八九五 四·一七簽訂馬關條約。決定「割讓」台灣。五·二五台灣民主國宣佈成立（台灣巡撫唐景崧任總統，劉永福任大將軍，客家系台籍進士丘逢甲被推舉為副總統兼團練使）。五·二九日本近衛師團登陸澳底。六·二李經方與樺山總督在雞籠港外海艦上辦理台灣交接手續。六·三日軍攻佔雞籠。六·四夜，唐景崧逃至滬尾，坐德國船赴廈門。六·七日軍靠臺顯

榮接引，入台北城。抗日游擊隊在各地抵抗。不久，丘逢甲逃到對岸。一〇・一九以台南爲中心，指揮抗日戰鬥的劉永福也撤回廈門。一一・三日本當局確認劉的逃離，宣佈平定全島。

一八九六 台灣民主國崩潰後，抗日游擊隊各自在各地激烈抵抗。日本帝國議會有人提案「賣掉台灣」。

一八九八 三・二八兒玉源太郎就任第四任總督，後藤新平以民政局長到任。九・五土地調查事業開始。一一・三公佈匪徒刑罰令，以極刑對付抗日游擊隊分子。

一九〇五 三・三一土地調查事業完結。

一九一〇 一・一林野調查事業（五年計畫）與國庫支付的「五年計畫討蕃事業」開始。

一九一三 十月受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〇・一〇）影響的羅福星事件被揭發。

一九一四 三月羅福星被處死刑。

一九一五 八・三西來庵事件。九・二三首謀余清芳被處死刑。

一九一九 一一・一一首任文官總督（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到職。

一九二一 二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開始。一〇・一七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 一九二八 四·一五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在上海成立。
- 一九三〇 一〇·二七發生霧社蜂起事件。
- 一九三一 四·二五第二次霧社事件。八·一六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
- 一九三六 六月發生林獻堂的「祖國事件」。一〇·一武官總督制復活（第十七任總督小林躋造到任）。
- 一九三七 四·一正式的皇民化運動開始。限制台灣島民使用母語。廢止報紙漢文欄。
- 一九四〇 二·一一公佈改姓名規則。改姓名（自中式姓名改為日式姓名）運動開始。
- 一九四五 八·一五日本戰敗。一〇·五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在台北成立前進指揮所。一〇·一七第七十軍登陸基隆。一〇·二四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到任，受熱烈歡迎。一〇·二五在台北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中國代表陳儀、日本代表第十九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
- 一九四七 二·二七夜，因取締私烟，警民衝突，擴大為二二八事件。三·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於台北中山堂（王添燈就任該會宣傳組長—發言人）。三·五謝雪紅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進行武力鬥爭。約在同時，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軍事負責人張志忠展開嘉義機場的包圍作戰。三·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大綱」制定。三·八國

府軍的支援部隊登陸基隆，展開鎮壓作戰。四·二二陳儀辭職。廢止長官公署制。魏道明任首任台灣省主席。展開對台灣上層階級的安撫措施。八月台灣再解放聯盟成立。

一九四九

一·五陳誠任省主席。一·二一蔣介石下野。二·二三陳儀在上海被捕。三·二九「台北市大中學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四·六緊急逮捕學生運動領袖（「四·六事件」）。

四·一二「三七五減租」（農地改革第一階段）開始。四·二九陳儀被移送台灣，羈押。

五·一全省戶口總檢查。五·二〇戒嚴令。八·五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八·二

〇「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立。九·二三林獻堂逃奔日本（一九五六·九·八病死東京）。一

〇·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二·七國府中央遷都台北。一二·二一吳國楨就任台灣省主席。從年底到第二年初，國庫所存金、銀、外匯及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國寶」等搬運至台灣。

一九五〇

三·一蔣介石復職為總統。三·八陳誠任行政院長，蔣經國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兼總統府資料組（情治機構的統括主宰機構）組長。約同時，日本人軍事顧問團（白團）在台北

開始活動。五·一三蔣經國揭發中共地下組織八十多單位，宣佈逮捕最高負責人蔡孝

乾（蔡後來變節歸順國府，一九八二年病死於台灣）。六·一八陳儀被槍決。六·二五韓戰爆發。
六·二七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約同時，美國恢復援助國府。八·五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

一九五一 六·二九實施「公地放領」（農地改革第二階段）。

一九五二 四·二八日華和約簽訂（台北）。一〇·一九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蔣經國升任中央委員。一〇·三一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十一月政工幹部學校開辦。

一九五三 一·一第一次四年經濟計畫開始。一·二六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農地改革最後階段）。三月吳國楨辭省主席職（五·二四亡命美國，批判蔣氏父子）。七·二七韓戰簽訂休戰協定。

一九五四 三月蔣介石當選第二任總統，陳誠當選副總統。六月體制批判派的本省人高玉樹當選台北市長。七月制定外國人投資條例。九·三金門砲戰。一二·二美華共同防禦條約簽訂（華盛頓）。

一九五五 四·二四萬隆會議，發表和平十原則。八·一第一次美中（大陸）大使級會談（日內瓦，後遭波蘭·華沙）。八·二〇孫立人案。九月廖文毅等創立流亡組織——台灣臨時國民會議

(東京)。一一·一九制定實施華僑回國投資條例。

一九五六 一月廖文毅等台灣獨立派建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東京)。

一九五七 五·二四台灣民衆抗議美軍法庭裁判不公(殺害國府軍官的美國士官經美軍法庭判決無罪)，襲

擊台北美國大使館。六·二日本首相岸信介首次訪台。

一九五八 八·二三金門發生激烈砲戰(一〇·二四)。

一九五九 九·一五蘇聯首相赫魯雪夫訪美。十一月美國盛行「一個中國·一個台灣」論。

一九六〇 四月，居留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少壯集團創刊《台灣青年》雜誌。美國興起「中台國

」的構想。八·二七《自由中國》雜誌有關人士預告成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

。九·四逮捕創設反對黨運動之中心人物雷震。一〇·八雷震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自由中國》停刊。

一九六一 三月參加籌組反對黨的李萬居所辦的《公論報》被迫停刊。

一九六四 四·二七體制批判派高玉樹第二次當選台北市長，黨外再度得勢。台灣經濟、工業生

產額，首次超過農業生產額。美援減少。預告於明年停止。

一九六五 一·一三蔣經國就任國防部長。三·五陳誠去世。四·二六與日本簽訂一億五千萬美

元的日圓貸款協定。五·一四廖文毅歸順國府。六·三〇美國停止經濟援助。七月設立高雄加工出口區，開始接受投資申請。

一九六七 二·一開設國家安全會議。

一九六八 九·一，九年制義務教育制度開始。

一九六九 六·二五蔣經國就任行政院副院長。

一九七〇 一·一五台灣獨立聯盟成立（本部設在美國）。四·一八蔣經國以父介石代表身分第五次

訪美。四·二四被台灣獨立派的居美台灣青年謀刺，但無恙（紐約）。一〇·一三國府

與加拿大、十一·六與義大利分別斷絕邦交。

一九七一 四·一〇乒乓外交開始，美國桌球隊訪問大陸。七·九美國總統特別助理季辛吉密訪

中國大陸（一）。七·一五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決定訪問中國。一〇·二五中華人

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國府退出聯合國。

一九七二 二·二一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二·二七美國與中國（大陸）發表上海公報

。三·二一蔣介石當選第五任總統。四·二邱永漢歸順返台。六·一蔣經國就任行政

院院長。以台籍政治家為主，提拔青年才俊。李登輝自學界入閣。九·二九日中（大陸

（建交。國府對日斷交。

一九七三 自本會計年度至七十八年度，實施總額五十億美元的「十大建設計畫」。

一九七五 四·五蔣介石去世。四·六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四·二八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

推舉蔣經國為黨主席。

一九七七 一一·一九因桃園縣長選舉，發現舞弊，民衆情緒激昂，演成暴動（中壢事件）。當局彈

性因應。黨外更加得勢。

一九七八 三·二一蔣經國當選總統。三·二二謝東閔當選副總統，為第一位台灣人的副總統。

十月南北高速公路開通。一二·一六華盛頓和北京預告美中（大陸）建交。國府為避免

引起混亂，停辦進行中的台灣地區立法委員及國民大會代表增補選舉。

一九七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二·二六桃園

國際機場啓用。六月蘇澳港啓用。八月《美麗島》雜誌創刊。黨外運動急進派以雜誌

社為中心而形成，逐漸壯大。在各地設立分社，以對讀者的談話會方式推展民主政治

啓蒙運動與黨外運動。一二·一〇美麗島集團在高雄市主辦世界人權日大遊行。警民

衝突，發生流血事件。事件後，黨外運動領袖們大舉被捕（美麗島事件）。

一九八〇 二·一北迴鐵路（蘇澳—花蓮）通車。二·二八因美麗島事件入獄的林義雄（黨外省議員）

之母與雙生女兒被暗殺。

一九八一 七·三美國卡乃基美倫大學助理教授陳文成離奇橫死。九·三〇葉劍英發表「關於台

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項提案」。

一九八二 六月台中港啓用。

一九八四 三·二一蔣經國再度當選總統。三·二二台灣省主席李登輝當選副總統。一〇·一五

美籍華人新聞界人士江南在舊金山市郊被暗殺。

一九八五 一二·二五蔣經國在國民大會代表年會聲明蔣家不推出總統繼任人。

一九八六 九·二八民主進步黨建黨宣言。

一九八七 七·一李煥就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七·一五零時起解除戒嚴令。同時開放外匯管制。

七·二七蔣經國發言「在台灣住了近四十年，我也已經是台灣人」。一一·一開放大

陸探親。同日工黨成立。一二·二五蔣經國指出「憲法才是我們的法統，實施中央民

意代表機關的改革才是合乎憲法的唯一正確途徑」。同日，民進黨人士發起並實施黨

外民衆攔住火車，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示威遊行。

一九八八 一·一「報禁」解除。一·一三蔣經國去世。李副總統繼任總統。一·二七李登輝代理黨主席。三·一六台灣農民舉行反對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的示威遊行。三月台灣原
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所長張憲義上校，經發覺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早已逃
亡美國）。五·二〇農民示威遊行，因複雜分子混入演成暴動，大舉逮捕。七·七國民
黨舉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三）。李登輝當選國民黨主席。八·一六北京設立
「台灣研究會」（會長宦鄉）。八·一八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成立。八·二四國民黨
中央黨部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召集人：馬樹禮）。八·二五台灣原住民族「還我
土地」運動聯盟舉行「還我土地」大遊行。九·一〇中國（大陸）國務院設立「台灣事務
辦公室」（負責人丁關根）。